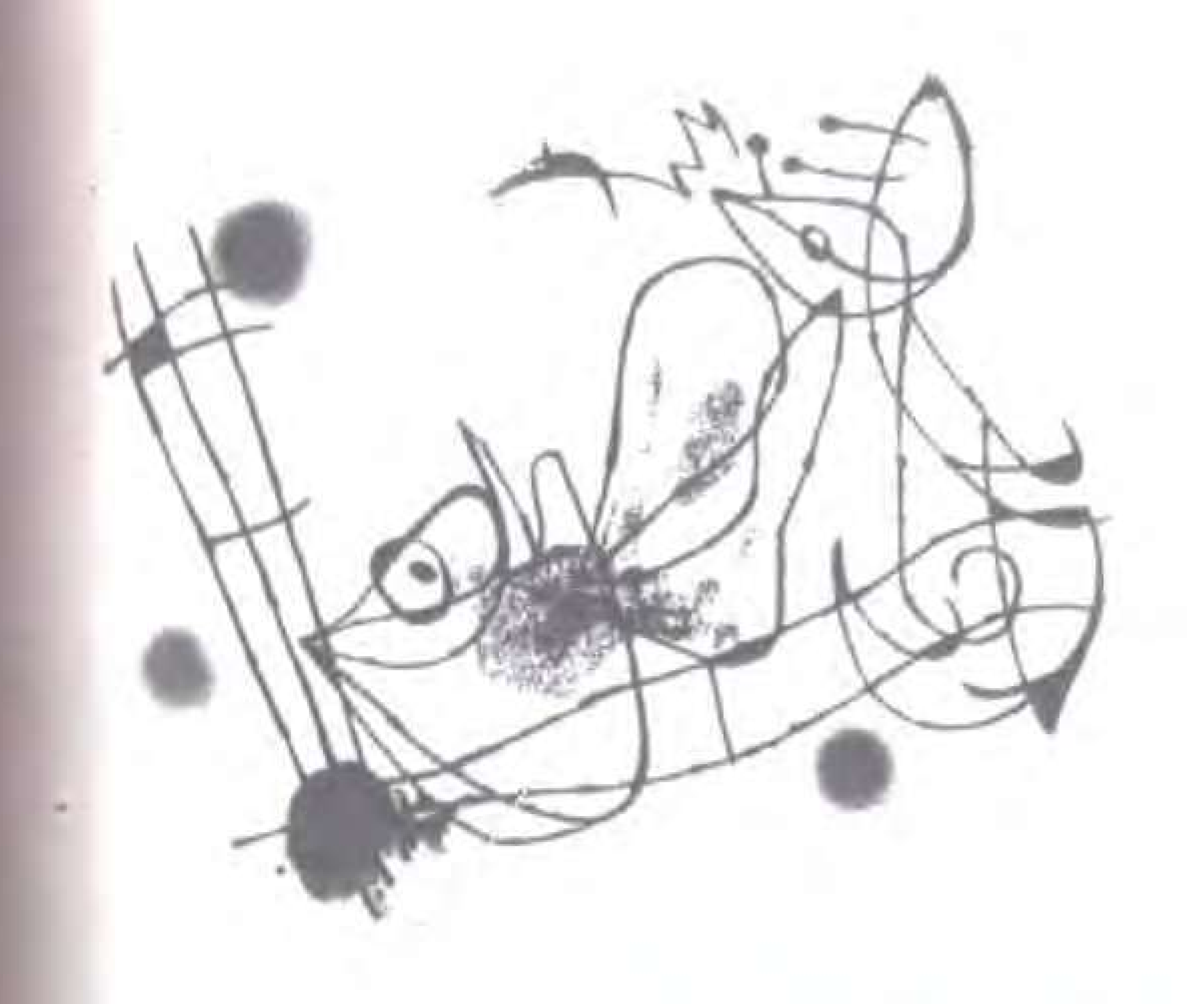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文集】

7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

主编 /车文博



长春出版社

本卷为弗洛伊德关于美学方面的论著。包括7部论著：(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阐释戏剧活动的论著。(2)《作家与白日梦》，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阐释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3)《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是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观点研究达·芬奇心理构成的评传。(4)《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重要论文。(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解析米开朗基罗创造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论著。(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是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是弗洛伊德解释非专业者能否掌握精神分析技艺的论著。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擎



ISBN 7-80604-625-9/B·7　定价(全八卷)：498.00元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文集（7）



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

主编/车文博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文集/（奥）弗洛伊德（Freud，S.）著；车文博主编.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

ISBN 7－80604－625－9

Ⅰ．弗…　Ⅱ．①弗…　②车…　Ⅲ．①弗洛伊德，S.（1856～1939）—文集②精神分析—文集

Ⅳ．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221 号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攀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邮编：130061）

网址：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8563443　发行电话：8561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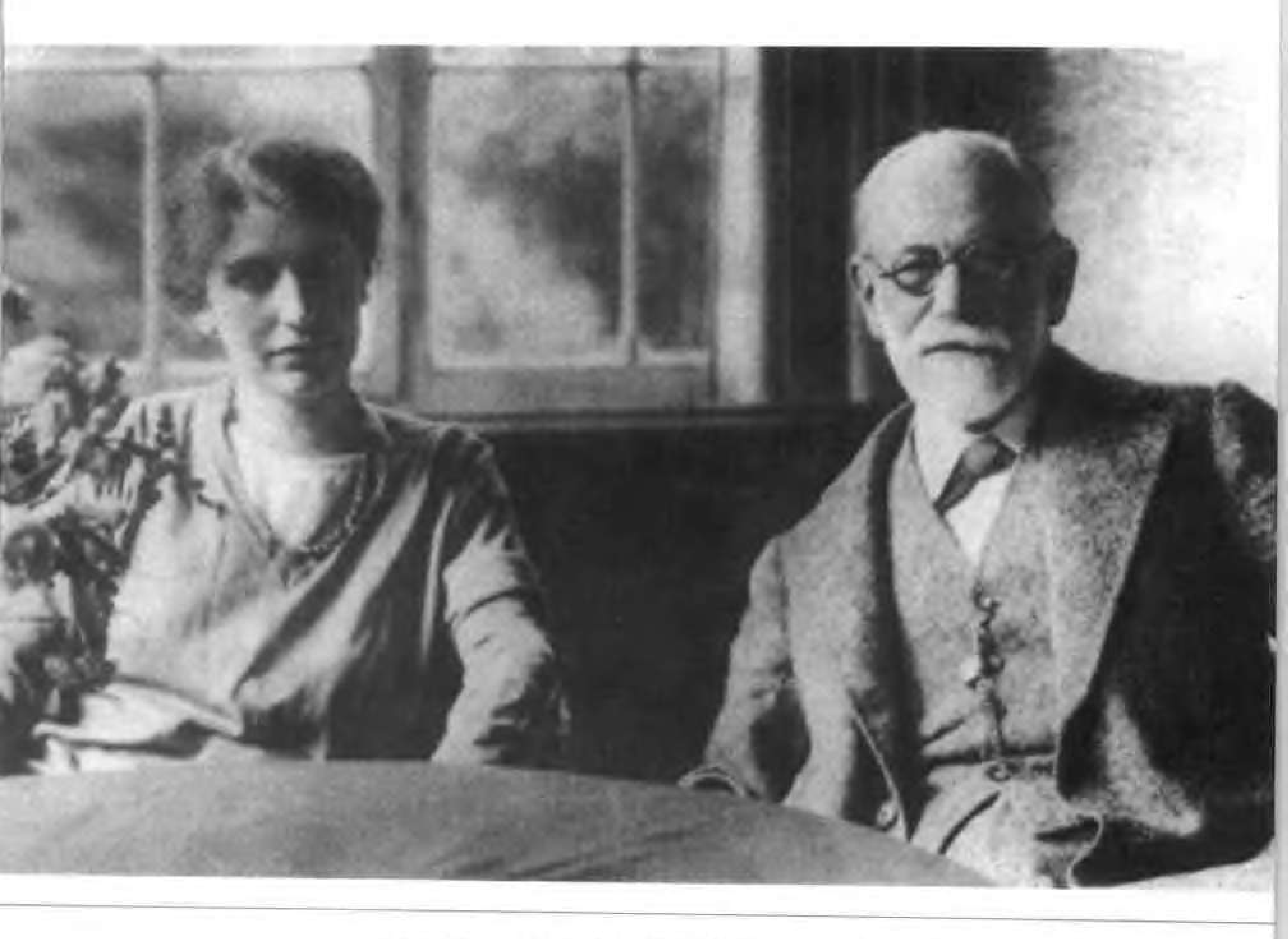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6.75 印张　320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全八卷）：498.00 元



1928 年秋，弗洛伊德与女儿安娜于柏林，他此时镶了一副新的假牙。



圣母、圣婴与圣安娜　达·芬奇　画
1910 年，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中分析了这幅画。



格拉迪沃(行进者)

弗洛伊德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一书中,对詹森小说《格拉迪沃》中的这位少女进行了分析。



独眼巨人的愤怒　卡拉齐　壁画



伊谛普斯与斯芬克司，弗洛伊德在很多书中分析了伊谛普斯情结。



人物速写　帕洛克　画

画家们同样试图探索艺术与潜意识的关系。



目　录



戏剧中的变态人物

（1942[1905或1906]）

孙 庆 民 译
索 宇 环 校
邵 迎 生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主要内容：(1) 戏剧的目的在于挖掘深层的情感渠道，获得某种满足快乐。(2) 戏剧的特点总是把“英雄”置于斗争乃至失败之中，并与痛苦、灾难等联系在一起。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表现的领域不同。(3) 心理剧的痛苦斗争是在心理冲动中进行的。一方面只有观众是一个神经症者，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另一方面惟有神经症者的大脑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当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压抑的冲动之间产生冲突时，心理剧就变成心理变态剧了。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与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决定其在戏剧中使用变态人物的范围。本文对研究精神分析戏剧心理美学有学术价值。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认为，戏剧（drama）的目的是“唤起恐惧和同情”①，从而净化情感。如果是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目的更详细地描述成是一个开发人们情感生活中的快乐或享受源泉的问题，就如同在开玩笑（joking）或幽默（fun）等智力活动中开发相似的源泉一样。但实际上这些活动很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这一方面，关键问题无疑是人们通过“发泄”（blowing off steam）而摆脱自己感情的过程，由此而产生的愉快，一方面是彻底地发泄而带来的放松，另一方面是伴之而来的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我们可以认为，性兴奋是作为情感唤起时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它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心理潜能提高了，而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兴趣盎然的观众去看戏剧或者表演②，给成年人带来的感觉就如同游戏（play）给儿童带来的感觉，他们那潜在的想做成年人所做的事的愿望在游戏中得以实现。观众一般是这样一种人，他阅历不多，经验甚少，感觉自己是个“大事不会降临其身的小人物”。他长期以来被迫压抑或转移其雄踞世界风云浪尖的雄心大志。他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感觉、去行动、去安排事情。一简言之，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hero）。剧作家和演员能够让他以英雄的身份被认同（并且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因而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同时又可以给他省去许多麻烦。观众也十分清楚，在现实中，如果他不经受痛苦、磨难和恐惧，他就不可能完成他所渴望的那些英雄行为，但若要他真的去经历那些磨难、痛苦和恐惧，那是毫无乐趣可言的。他还懂得他只有一次生命，也许在这样一次与逆境抗争中就有可能夭折。所以，他的欢乐是基于幻觉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他清楚地知道在舞台上行动和受苦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时，当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不会实际威胁到他的个人安全时，他的痛苦就被淡化了。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可以尽情享受当“伟人”的乐趣，可以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平时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的方面压抑着的冲动，在舞台上表现的生活中的各个重大场景里任意地“发泄”。

同样，其他几种形式的创作也仰仗该前提条件产生。抒情诗（lyric）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能实现发泄多种强烈情感的目的——就像跳舞也能发泄情感一样。史诗主要是能让人感觉到英雄人物胜利时的喜悦。而戏剧则是试图挖掘更加深层的情感渠道，并使不幸的先兆也能释放快感。正因为如此，戏剧一般总是把英雄置身于斗争甚至（带着受虐狂式的满足）失败中来加以刻画。戏剧这种与痛苦、

① 德语“Mitleid”，具有“令人同情苦难”的意思。

② “Schauspiel”是一个表达“戏剧表演”的普通德语单词。弗洛伊德在此用连字号将其分开“Schau-spiel”，成为两个组成部分：“Schau”意指“表演”；“Spiel”意指“戏剧”。弗洛伊德后来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并且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



灾难的联系或许可以看成是戏剧的特点，不管它是像在严肃剧中那样，只唤起观众的关注，然后又将它平息；还是像在悲剧（tragedy）中那样，痛苦真的发生。戏剧起源于古代对诸神祭祀的仪式（参见关于羊和替罪羊的论述），这一事实与戏剧的特征不无相关[①]。它容许人们对天宇神控的日益不满，这种控制导致了痛苦英雄是最早最强烈地反对上帝或其他神圣的东西的反叛者。快乐似乎来自一个弱者面对神圣力量时的苦痛——这是一种受虐狂满足的快乐，也是一种直接欣赏一个历经千辛万苦不改英雄本色的人物所产生的快乐。这里，我们的心情和普罗米修斯的心情一样，不过多了点用暂时的满足获得自己片刻安慰的愿望。

因此，各种类型的痛苦便成为戏剧的题材，通过这种痛苦它给观众带来快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首要先决条件：戏剧不应该给观众招致痛苦，戏剧应该懂得如何通过创造可能的满足对它给观众带来的同情之苦进行补偿（当代作家常常做到这一点）。但是，舞台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痛苦很快就被局限于心灵的痛苦，没有人想要肉体的痛苦，因为人们懂得肉体的痛苦所引起的躯体感觉（somatic feeling）的变化，将很快淹没所有心灵的快乐。如果我们得了病，惟一的愿望就是：恢复健康，摆脱我们现在的状况。为此，我们去看医生，吃药，破例求助于“幻想游戏”，这种游戏能够使我们获得快乐。如果一个观众把自己置身于躯体疾病（physicalill）的处境，他会发现自己无力享受快乐或无力从事精神活动。因而，一个有躯体疾病的人只能作为戏剧中的一件道具活跃于舞台上，而不是一个英雄，除非他的躯体疾病的特殊方面使他能够进行精神活动。例如，在《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病人处于绝望状态，在有关结核病人的剧中，患者失去希望。

人们主要是通过需要有精神痛苦的环境来认识精神痛苦的，因此，表现精神痛苦的戏剧需要某个会导致躯体疾病的事件，并以表现这个事件开始剧情。至于有一些戏剧如《阿贾克斯》和《菲罗克忒忒斯》，介绍以为观众熟悉了的心理疾病，纯属例外。在希腊悲剧中，由于人们对素材的熟悉，一出剧，有人也这么说，是从中间部分开始演出的。要想对控制那些悬而未决事件的先决条件给予充分的解释是很容易的。这些事件一定包含某种冲突，包含意志力与抵抗力。这一先决条件是在反对神的斗争中完成其首要和崇高的使命的。我已说过，这种悲剧是一种反抗剧，剧作家和观众都站在反抗者的立场上。人们对神的信仰越少，人在控制事物中的作用就变得越重要。人们越来越相信，恰恰是这种对神的反抗导致了心灵的痛苦。因此，英雄的下一次反抗便是指向人类社会。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批社会悲剧。然而，另一个先决条件的实现将出现在个体间的冲突中。这类悲剧是人物的悲剧，它向观众展示了一场“冲突”中所有令人激动的场面。剧情是在

① 有关希腊悲剧中主角，弗洛伊德在其《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四篇第七节中有过专门讨论。



杰出人物之间展开的，他们从人类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这种悲剧中得有两个主角。在以上这两类戏剧中，有一个主角同代表某些制度的强大人物进行斗争，如果将这两类剧进行融合，无疑是可能的。纯粹的人物悲剧缺乏令人满意的反叛性，但是这种悲剧在社会戏剧（例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再现，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希腊古典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剧。

因此，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得以表现的领域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戏剧的线索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便是心理剧（psychological drama）的领域。在心理剧中，引起痛苦的斗争是在人物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在不同的心理冲动之间进行的。只有当一种冲动，而不是主人公，消亡之时，斗争才告结束。就是说，斗争必须在人物的“否定”[①]中结束。这个心理剧的先决条件与前所述的几个类型先决条件的结合都是可能的。所以，如制度之类的因素其本身也可以成为内心冲突的根源。正因如此，我们便拥有了爱情悲剧。因为社会文化、人类习俗对爱情的压抑和“爱与义务”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在歌剧中早已熟知，它构成了几乎无数的冲突情境的根源，事实上，也如同人们的“情欲白日梦”一样亘古不绝。

但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多。当我们身临其境并打算从中获取快乐的痛苦根源，不再是两个同样可以意识到的冲动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时，心理剧就转变成了心理变态剧了。这里，快乐的前提条件是观众本人须是一个神经症者，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而不是反感。对那些非神经症者来说，这种意识所招致的仅仅是反感，而且是可能唤起观众一种重复压抑行为的倾向，该压抑行为以前曾成功地影响过他的冲动。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一个简单的压抑行为就足以完全控制被压抑的冲动。但是对神经症者来说，这种压抑无一例外会处于失败的境地。神经症者的压抑是不稳定的，需要反复不断地释放。如果这种冲动被清晰地意识到了，那么这种努力就无效了。所以惟有在神经症者的头脑里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即使是在这样一群人身上，剧作家所能唤起的，除了一种得到解脱的快乐之外，同时还有对解脱的抵抗。

第一个现代戏剧是《哈姆雷特》[②]。该戏剧主要揭示的是，一名男子先前是正常的，由于他所承受的一项使命的特殊性质，而使他变得神经质。他体会一种压抑许久的冲动现在越来越活跃，眼看就要爆发成为行动了。《哈姆雷特》有三个特点与众不同，它们与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有较重要的关系：（1）剧中主人公本身

① “否认”系精神分析防御机制之一，指自我对本我本能要求的绝弃机制。——中译者

② 弗洛伊德首次发表抨击《哈姆雷特》的观点，是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二），标准版，第4篇，第264页以下）一书中。

并不是心理变态者，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成心理变态者。（2）剧中所表现的被压抑的冲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压抑的冲动之一，而这种冲动的压抑过程构成我们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压抑被打破了。由于上述两个特点，我们这些观众便很容易在主人公身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和剧中主人公一样很容易对这类冲突变得敏感起来，因为"一个在某一特定情境中不失去理智的人没有理由失去理智"[1]。（3）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似乎是，一个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不论它多么容易识别，从未得到过一个确定的名称，结果这一过程在观众眼里出现时也没引起注意，他完全被他的情绪所控制，对剧中发生的事没有留心观察。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少了那么点抵抗成分，我们发现由于抵抗软弱，进入意识的不是被压抑材料本身，而是它们的衍生物。毕竟，《哈姆雷特》中的冲突隐匿得如此巧妙莫测，只好由我来将它们挖掘出来。

或许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戏剧艺术三个前提条件的缘故，众多其他的心理变态人物在舞台上的表现与在实际生活中一样未起到什么作用。神经症者的内心冲突，如果我们第一次是在一个完全既定的状态下与其相遇，那么我们是根本无法洞悉的。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冲突，我们便会忘记他是一个病人；如果他本人也认识到这一冲突的话，他就不再患病。看来似乎是剧作家们在诱发观众产生相同的疾患。如果能够让观众随着受害者的疾病一同发展的话，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观众原来并不存在压抑，现在首先需要建立这种压抑时，上述做法就尤其必要了。这种心理变态剧比《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表现了神经症在舞台上的作用。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陌生的和极端严重的神经症，我们将去请教医生（像在生活中一样），并宣布该患者不适合登台表演。

这最后一个错误似乎在巴尔的戏剧《亲爱的安德列》[2] 中出现过。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戏剧中表现得含糊不清，即我们很难相信会有那个特殊人物，拥有一种合法权利，能够给予那个姑娘完全的满足。因此，她的问题不可能变成我们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错误，即认为没有什么内容可供我们挖掘的了，认为我们全部的抵抗只是为了反对我们无法接受的爱的既定的条件。在我上述讨论过的戏剧艺术的三个有效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注意力转移（diversion of attention）那一条。

总而言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单凭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和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就能决定在戏剧中运用变态人物的范围。

---

① 莱辛：《艾米丽雅·加罗蒂》，第四幕，第七场。

② 此戏的作者是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1863～1934年），1905年首次公演。剧中故事情节描绘的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的女主角。尽管经过百般努力，但她还是难以摆脱一个靠强力占有她的男人的依恋（这种依恋建立在对她肉体的感觉之上）。——1942年英译本删掉了其中的一段。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1907*)

孙 庆 民 译
索 宇 环 校
邵 迎 生 修订

按 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释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该书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一章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本书[1]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梦的本质问题，可是却在某一天对梦的种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又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梦——一些由想像丰富的作家创造并用来在一个故事中塑造人物。如果有人想对梦的种类问题进行研究，这似乎是在浪费精力且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可能也有几分道理。认为梦具有某种意义并且可以做出解释的人寥若晨星。如果让科学家或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一个梦做出解释的话，他们会对此付之一笑。相反，那些偏于迷信和因循守旧的普通人却坚信梦是可以解释的。《释梦》的作者在正统科学的责难面前，甘冒风险充当迷信和复古者的同党。的确，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冲破种种禁忌，试图揭开梦的面纱，只是一无所获。《释梦》的作者并不相信梦境能够预测未来，但他也不完全否定梦境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通过千辛万苦对梦做了一番分解之后，他发现梦本身原是做梦人的某种愿望的反映，而谁能否认人为的愿望不是针对未来的呢？

我刚才讲过梦是愿望的实现。任何一个有胆量来读这本深奥难懂的书的人，任何一个不因贪图省事而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硬说成是深奥复杂，甚至为此目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品格和扭曲真理本来面目的人，都能从我提到的这本书中找出阐述这一论题的详细证据。同时，他也可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反对意见，否认梦就是愿望的实现的说法。

可是这么说，那就把话题扯得太远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梦的意义是否能解释成愿望的实现，也不是要澄清梦的意义是否常常代表着一种渴求、一种意愿或反映等。相反，我们首先要来研究的问题是梦究竟是否具有意义，是否可以把梦看成是意识活动。科学的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将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理过程，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寻什么梦的意义或目的。科学还认为，生理刺激在睡眠的过程中作用于脑的某个部位，因此也就使脑内浮现出这个或那个意念，没有任何精神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好比是大脑的抽搐，根本算不上什么有意义的活动。

---

[1] 见弗洛伊德的《释梦》。

在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梦的争论中，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似乎是站在了古人、笃信迷信的大众和《释梦》的作者一边。因为当一个作家通过他的想像的梦来塑造他的人物时，他所遵循的是一条日常经验，即人们的思想感情会一直延续到睡梦中去。此时作家的目标仅仅是通过主人公的梦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不过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是些可贵的盟友，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应该得到高度的肯定，因为他们知道发生在人与天之间的众多事情，这些事情是单凭传统哲学无法梦想到的。他们对人类意识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为他们的素材来源是正统科学尚未得到的。我们希望承认梦具有某种意义的作家们所提供的这一证据再明确一点。如果读者是一个态度严谨挑剔的人，那么他很可能认为作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特定的梦具有某种心理意义的观点，他们只是想说明沉睡的大脑是如何在清醒意识的残余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作抽搐运动的。

当然，即使是这一保守冷静的观点，也不能降低我们对作家们拿梦做文章的兴趣。即使这一探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梦的本质的内容，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一角度对创作本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的梦已经被人们认为具有自由的和无规则的结构，而现在我们又面对着对梦的大胆模拟。然而，精神活动远不像我们所猜想的那样自由和随意，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和随意性。我们在客观世界中称之为机会的东西可能用精神活动分析成规则。同样，精神生活中的随意也遵循一定的规则，只不过我们现在才开始隐约感觉到。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

我们进行这次探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深入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创造的梦当中去；另一种方法是把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使用梦的例子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对照。后一种方法或许是更加有效和惟一可行的，因为它一下子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不必为难于使用作为一个群体的“作家们”这个人造概念。在考察过程中，这一群体将分化为具有不同特色的个体，其中有一些作家我们一贯敬仰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最深刻的观察家。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拿出一些篇幅来用于第一种方法的研究。最初想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人中有一个人①回忆说，在他刚刚读过的一部小说中，有好几个非常相似的梦，他不禁想用《释梦》介绍的方法去解释。他承认这部小说的题材以及背景在给他带来愉快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庞贝古城，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把自己的兴趣从现世生活转移到经典古迹上来。他沿着一条奇怪的但却合乎逻辑的路线走，结果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在阅读这一充满诗意的故事时，读者头脑中会产生各种各样与小说情节相关的念头。这部作品就是威廉·

① 指荣格。

詹森写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关于"庞贝的幻想"。

现在，我应该要求读者们先把这篇文章置于一边，花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格拉迪沃》这部作品（它最早摆进书店是在1903年）。这样，我在后面再提及该作品的内容时，读者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考虑到有些读者已经读过《格拉迪沃》这部作品了，因此我将只简要介绍一下故事的核心内容。同时，我希望借助读者的记忆力能恢复该作品因被我抽象分析而失去的魅力。

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他在罗马一家文物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件浮雕。他深深地被这件浮雕所吸引，当他终于弄到了一件该浮雕的石膏模型时，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把它带回到他在德国一所大学里的书房中，悬挂在墙上，每天进行观赏。这件雕塑表现的是一位发育成熟的姑娘正在迈步前行，她的裙服随风飘起，露出她的一双穿着凉鞋的脚。一只脚稳稳地踏在地上，另外一只脚从地上抬起正欲前移，只有脚趾头轻触地面，鞋心与脚后跟几乎与地面垂直。或许，正是这个不寻常的有独特魅力的优美步态，引起了雕塑师的兴趣，并在几百年后引起了一位欣赏它的考古学家的注目[1]。

小说叙述的一个基本心理事实是主人公对浮雕发生的兴趣。这一点开始肯定不能为读者接受。"诺伯特·汉诺德博士，一位考古学讲师，从他所研究的学科角度来看，事实上他在这件雕塑身上并未找到任何可以引起他特殊兴趣的东西。"(3)[2]"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知道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他，而且那种作用仍在持续。"但是，他的头脑中却不断地展开对那件雕塑品的想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发现雕塑具有某种"现代"的气息，仿佛艺术家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只朝大街瞥了一眼，便从"生活中"抓住了并雕刻出了它。他给那位以这种姿态走路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向前走去的姑娘[3]。他编造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她肯定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或许她父亲是古罗马一位市政官员，在谷物女神色列斯手下效忠，而这位姑娘正走在去神庙的路上。稍后，他发现这姑娘平静、沉着的天性与一个都市的喧嚣和繁忙格格不入。他觉得她更像旅行到了庞贝城。在那里她沿着挖掘出来的古老的石阶前行，所以她在下雨的天气里从街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而脚却未被打湿，旁边还有四轮马车驶过。她的那张脸让他觉得这姑娘像希腊人，他进而推断她该是海伦的后裔。年轻的考古学家把他所学到的考古学知识，一点一点地运用到对这件浮雕的原型的想像中去。

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看似科学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他要做出判

① 见本卷卷首。

② （ ）括号的数字是该文所引1903年版《格拉迪沃》的页数。

③ 有关格拉迪沃这一名字的解释详见英文版第50页。



断，“格拉迪沃的步态究竟是不是雕塑师依据生活原型复制出来的。”他觉得他自己是无力再现那种步态的。为了验证这种步态的“真实性”，他“亲自在生活中观察，以求清除谜团。”然而，这却使得他进入了一个他从未有过的行为过程。“到目前为止，女性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与大理石或青铜之类无甚大异。他还从未认真地留心过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代表。”对于他来说，社会义务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件令人讨厌而又无法逃避的事情。在社会中，当他遇到一些年轻的女士时，他从来不认真地看她们一眼，以至于下次再与她们相遇，他会无动于衷地与她们擦肩而过。他这样做当然不会给女士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现在，他所承担的科学任务却促使他在晴朗（更多地是在阴雨）的天气里，热忱地观望走在街上的少妇或少女们的脚。这项活动有时会使得那些被他观望的妇人感到生气，当然，有时她们也向他投来严厉的目光，“但他对这两种反应都没注意到。”经过仔细的研究，最后他不得不得出一项结论：格拉迪沃的步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结论令他十分遗憾和苦恼。

此后不久，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古代的庞贝城，那一天正值维苏威火山爆发，他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毁灭。“他正站在靠近丘比特神庙的广场边缘上，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的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但是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并且是那么自然，因为她是庞贝城人，自然是住在自己的家乡了，且与他属同时代人，对此他未曾怀疑过。”（12）他对眼前即将降临的灾难惊恐万分，不由得想提醒她一声。但她还是沉着地向前迈步，并扭头面对他，然后她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阿波罗神庙的门廊。她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然后又慢慢地躺下来，头靠在石阶上。她脸色变得愈来愈苍白，像大理石的颜色一般。他赶紧跟过去，发现她平躺在宽阔的石阶上，表情安详，像睡着了似的，任由倾泻下来的火山灰将其身体掩埋。

他醒来时，庞贝城居民求救的嘈杂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被搅动了的海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随着意识的不断苏醒，他知道他听到的嘈杂声是大城市繁忙、热闹的生活，却仍旧有相当一段时间深信梦中所见确有其事。

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认为自己亲临大约 2000 年前的庞贝城毁灭的现场的念头，却仍然深信格拉迪沃就住在庞贝城并且在公元 79 年与其他人一起被火山灰埋葬在那里。这场梦对他发生的影响是，每逢在幻想中再次出现格拉迪沃时，他就会为失去她而感悲痛，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大脑仍旧陷入沉思。街对面一所房子的窗子是敞开的，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歌唱，歌声引起了他的注意。突然，年轻人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此时他好像尚未完全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他觉得，他看见街上有一



个很像格拉迪沃的女人，甚至认为他认出了她那很有个性的步态。他没有多想，迅速地跑到街上去追赶她，结果只招来过往行人对他身着睡衣跑到街上之举的嘲笑，这才把他又赶回到屋里。进屋后，那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的鸣唱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觉得自己与那只鸟的处境有些相似。他仿佛感觉自己也像被关在笼子里，只不过他更容易逃离这个笼子，似乎是受了那个梦的影响，或许是春天温暖气候的缘故，他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到意大利去做一个春季旅游。表面的理由是去做一次科学考察，但实际上他是"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冲动驱使下做出这个决定的。"(24)

现在让我们停顿一下。暂且不去管这次为着实在难以令人相信的理由而做的旅行，而是先来认真考察一下此君的人格与行为。在我们看来，他这个人还是那么不可思议和愚蠢。我们难以理解他的这种古怪的傻念头与人类情感有什么相关，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当然，作者有权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而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但是作者的语言是优美的，小说的创意别出心裁，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奖赏了，使我们能够对作者产生信任，同时对他所创造的人物表示格外的同情。关于这个人物，作者还告诉我们他从事考古学研究，是在承袭他家族的传统。后来，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的研究中去，以至于完全远离了生活，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对于他来说，大理石和青铜就足以焕发生命力，光凭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表达人类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可是，大自然也许带着种种善意，向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与科学无关的矫正药物——一种极其生动的想像，不仅出现在其睡梦中，而且也出现在其清醒时。想像与理智之间的这种差别，使他注定不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是一名神经症患者。他是属于那种其理想王国远离尘嚣的人。他对一件表现一个姑娘以特殊姿态行走的浮雕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便展开了对这位姑娘的丰富的幻想，猜测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份，想像她可能是生活在1800年前遭到毁灭的庞贝城。最后，在经历了一场奇特的焦虑梦（anxiety-dream）之后，他对这位名字叫格拉迪沃的姑娘的生死想像演变成为一种病态的幻想，以致影响到了他的行为。此种想像的后果，我们也许会感到吃惊，而且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种人，我们会认为他不可理喻。由于我们谈论的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个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所以我们也许敢怯生生地向作者提一个问题：这位年轻人的想像是否由某种有机可缘的因素所致？

刚才，我们谈到故事的主人公在听到金丝雀的鸣唱之后决定到意大利去旅行。其实，他对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还知道他没有制定旅行的明确计划和目标。一种内心的不安和不满足感才驱使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赶往一个目的地。他发现他周围都是一群群做蜜月旅行的情侣，他不

自觉地留心起“埃德温”和“安吉莉娜”的两对情侣[1]。但是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他得出结论，“人类所有的愚蠢行为中当首推结婚一事，结婚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到意大利做蜜月旅行是毫无意义的，是人类荒谬的集中体现。”(27) 在罗马，一次睡觉被一对热烈亲昵的情侣吵醒，便急忙逃到了那不勒斯，结果在那里又遇到了其他的情侣，从那些成双作对的情侣交谈中，他了解到他们大多数人无意到庞贝城的废墟上逗留，而是要前往卡布里岛。于是，他决定背道而驰，到庞贝古城去。可仅仅几天工夫，他就发现自己在庞贝城的收获“与当初的愿望和意图恰恰相反”。

他在那里没有得到他所追寻的安宁，相反，以前是些情侣们破坏他的情绪，扰乱他的思想，现在是屋子里的苍蝇来捣乱，而且他把苍蝇看做是邪恶和无价值的化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折磨殊途同归：一些苍蝇出双入对使他想起了那些形影不离的情侣们。而且他怀疑苍蝇们之间相互亲昵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亲爱的埃德温”和“安吉莉娜，我的心肝”之类的词语。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不满情绪并不仅仅是由环境引起的，部分原因根源于他自身”，他感觉到“他总也不满足，原因是他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可他又不清楚那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他通过“英格莱索”进入庞贝，甩掉了导游，径自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游。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不起不久前他在梦中还来过的庞贝城。到了“炎热而又神圣”[2]的中午时光，也就是古人看做是幽灵显现的时分，其他的游人都已无影无踪，小山一样的废墟躺在他面前，暴露在阳光下，荒凉而又凄惨。这时，他发现自己能够想像到早已被埋葬的生活中——并非借助科学的力量。“它教会我用无生命的考古学方式观察事物，它所发出的是一种早已废弃了的语言。这一切对于用精神、用情感、用心完成的认识没有任何帮助。谁若渴望认识它，那他就一定要独自一人站在这儿，作为这儿的惟一生命，静听着中午时分的宁静，感受这份炎热，处在一片往日的废墟中，细细地看，但不是用肉眼；细细地听，但不是用耳朵。你会发现，死去的人又苏醒了，庞贝城又复活了。”(55)

当他用丰富的想像力唤醒历史的时候，突然看见那浮雕的原型格拉迪沃从一所屋子里走出来。一点儿没错，就是她。她步履轻快地走上一段熔岩铺成的石阶，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就像那晚他在梦中见到的一样。在那晚的梦中，她躺在阿波罗神庙前的石阶上，似乎是要睡觉。“当他记起这些时，另一种东西第一次浮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体内有某种冲动就已经来到了意大利，来到了

---

① 原文是“奥古斯特”(August) 和“格莱特”(Grete)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语中常有用这两个姓的情侣。

② 见《格拉迪沃》第51页。

庞贝城，在罗马和那不勒斯，未作太多的停留，以便寻找她的踪迹。是严格意义上的‘踪迹’，因为她既有那种特殊的姿态，那么她一定会在火山灰上留下了一个与众不同可以辨认的脚趾印。”(58)

到此为止，作者抓住读者的那种张力，已经变成了一种茫然不解的痛苦感觉。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失去了平衡，就连我们读者也无法再保持清醒，因为格拉迪沃这个形象太神奇了，她先是作为一个大理石雕像，后来成为想像中的一个人物。她难道是考古学家误人歧途后产生的幻觉吗？她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幽灵呢，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提出上述问题时需要相信幽灵的存在。作者把他的故事称做“幻想”，但他迄今为止并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告诉我们他是否也让我们停留在这个被指责的平淡无奇、被科学的规律统治得呆板不堪的另外一个想像的世界中去，在那里精神和幽灵获得了生命。从《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例子中可以知道，我们很可能会沿着作者的思路进入那个世界的。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位想像丰富的考古学家的幻想就得用另外一个尺度来衡量了。的确，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长相与一个古代的浮雕上的形象一模一样，这该有多么难以置信时，我们提出的几种猜测就会缩减为两个：要么她是一个幻觉形象，要么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幽灵。故事中的一个小细节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一只巨大的蜥蜴在阳光下摊开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格拉迪沃的走近惊动了这只蜥蜴，它迅速地沿着熔岩石铺成的台阶逃走了。所以，这一切不可能是幻觉，而是发生在梦幻者大脑之外的事情。难道是幽灵的出现惊动了蜥蜴？

格拉迪沃在麦利戈宫前面消失了。当我们看到诺伯特·汉诺德在他的幻觉驱使下认为在幽灵现身的正午时分庞贝城又复活了，格拉迪沃复活了，并走进了公元 79 年 8 月厄运降临日之前她一直居住的房子里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他在内心里认真审视房间主人的性格，审视格拉迪沃与他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他的科学知识现在是服务于他的想像。他走进房间，突然他又一次发现了格拉迪沃，她就坐在两根黄色柱子之间的低矮石阶上面。“在她的膝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无法认出那是什么，似乎是一张莎草纸……”。他根据自己近来对她出身的判断，用希腊语跟她打招呼。他内心激动地在等待，看着以幽灵面目出现的她，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她没做回答，他又用拉丁语向她问候。这时，她露出微笑，开启芳唇：“如果你想跟我说话，”她说，“你该用德语。”

对于我的读者来说，这是个多大的羞辱啊！看来作者是在拿我们寻开心。他利用庞贝城的阳光，诱骗我们一步步走入一种幻觉，使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小人的评价不至于太苛刻。现在我们已不再迷，我们知道格拉迪沃是一个德国姑娘，有血有肉——这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现在，让我们深怀自信，拭目以待，来看看这位姑娘与那件大理石雕像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是如何产生幻想，虚构出这位姑娘的离奇人格的。

可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迅速地从幻想中摆脱出来。正如作者所说："虽然他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但他不得不接受许许多多的神秘的现象。"（140）或许，这种幻觉的内在根源在他身上，而不在我们身上，因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对他这种情况，若要使他回到现实中来，积极的治疗无疑是必需的。同时，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他的幻觉与他刚刚经历的美好体验统一起来。格拉迪沃早已随着庞贝城的毁灭和其他东西一起死亡了，她只能是幽灵在正午魔鬼出现的时刻重返生活。可是，在听到她要求用德语讲话的回答后，为何他说："我原来就知道你说话的声音是这样的？"不仅是我们，就连那姑娘，恐怕也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汉诺德必须承认他从未听到过那姑娘的声音，虽然在他的梦中她躺在神庙的石阶上睡去时，他向她呼喊后期望听到她的声音。他恳求她再做一遍她以前做过的那个姿势，可是这回她站了起来，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几步就消失在庭院的圆柱之间。在此之前，曾有一只漂亮的蝴蝶围绕着她拍翅振翼，飞了一会儿。他把这解释为是一只来自冥府的信使，提醒这死去的姑娘应该返回去了，因为正午幽灵出现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姑娘消失之前，汉诺德抓紧时间朝她喊道："明天中午你还来这里吗？"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对这一情景做出更加清醒的解释，因为这姑娘似乎感到汉诺德对她讲的话有些不妥，她好像觉得受到了侮辱，故离他而去。她毕竟不知道他做过的梦。难道她没有觉察到在他的请求中隐含有色情意向吗？汉诺德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动机与他的梦境有关。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小说主人公先是赶到狄俄墨得斯德饭店，仔细观察所有去吃午饭的客人；接着他又来到瑞士饭店进行了观察。于是，他确信在庞贝城里他所知道的这两家店里，没有一个人长得与格拉迪沃哪怕是有一点点相似。当然，类似于可能在这两个饭店中实际遇到格拉迪沃这样不现实的念头，他还是有可能放弃的。此时，喝着维苏威火山灰土壤上酿造出来的葡萄美酒，他感到头昏目眩，白天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二天，汉诺德惟一的一项计划好的事情，就是在午间时刻再次赶到麦利戈宫去。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过程中，他没有沿着常规的路线走，而是翻越过古城墙到达庞贝。一枝常春花悬空而吊，花瓣呈白色的喇叭状，在他看来这种发现似有玄机，这朵阴间之花在等着他摘下带走。在他等待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整个考古科学是世界上最无趣、最无聊的东西。因为另外一种兴趣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在思考："像格拉迪沃这种人，她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虽然只在中午时分，那么她具体的出现其本质是什么呢？"（80）同时他也有些担心，担心哪天见不到她，因为或许她返回去以后需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被允许到阳间来。所以当他再次看见她出现在两根柱子之间时，他还以为又是他的幻觉。于是他痛苦地喊道："噢！如果你真的存在且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这一次他显然是过于认真了，那姑娘开口说话了，她问他是否愿意为她摘来一朵白花。接着他俩又前言不搭后语地

做了一次长谈。

格拉迪沃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也开始逐渐表现出对他的兴趣。对此，作者解释说，在前一天她向他投来的讨厌和拒绝的目光，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探索和好奇的表情。现在，她真的开始询问他了。她让他解释前一天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问他：当她躺下要睡觉时他站在她身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这么一问，她知道了他做的那个梦，在梦中她随着她的家乡城市一同被毁灭；她还了解到有关那件大理石雕像和那种步态的事，还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考古学家。现在她又表示乐意表演一遍她的步态，与雕像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雕像上她穿的是凉鞋，今天穿的是一双浅黄色的精制皮鞋。她解释说这是为了符合今日之时代特色。显然，她在逐渐进入他的幻觉之中，她从他嘴里把所有的细节都一点点地套出来，丝毫不做辩驳。只有一次，当他说他第一眼看见她就认出她就是雕像上的人时，她似乎是出于自身的心绪缘故，显得有点不安。他们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她对那件雕像还一无所知，因此她很自然会误解他的话。可是，很快她便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恢复常态。我们可以看出在她的话语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意味，除了在幻觉背景下的意义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现实和现代的意义。例如，当她得知他在大街上的实验中没有能够成功地证实格拉迪沃的姿态时，感叹道："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你就不必长途旅行到这儿来了！"（89）她还得知他给雕像上的她取了个名字叫"格拉迪沃"。她告诉他她的真实名字叫"佐伊"。"这名字配你很合适，可是在我看来它像是一种苦涩的嘲讽，因为佐伊（Zoe）意指生命。"她答道："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不可抗拒的事情，长期以来我已经逐渐习惯了死亡。"她答应他第二天中午还在老地方见面，在与他告别时，她又一次要求他为她摘一枝常春花。她说："对于那些幸运的人，在春天里应送给他们玫瑰花，但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送一束代表遗忘的花是最恰当的。"无疑，对于一个死亡了这么久又重返生活仅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忧郁是很自然的。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并且感觉到有点希望。如果那位年轻小姐使格拉迪沃得以重获生命，而且她又完全相信了汉诺德的幻想，她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要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其他途径，如果反驳他，那就连一点解脱他的希望都没有了。即使是对这类真实病例的严肃治疗，也只能让病人来到产生幻觉的原地并尽可能详尽地研究它，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如果佐伊是从事这一治疗工作的合适人选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治疗一个像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病人应该如何进行。我们也很高兴明白了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对这种幻觉的治疗与我们的分析相一致，如果在对这个病例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对其病因进行准确的解释，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巧合，然而我们确实拥有此等实例。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个病例以这种方法治愈不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爱情故事罢了。不过，作为消除幻觉的爱情这一治愈力量也不应被

忽视。我们这位主人公对格拉迪沃塑像痴迷的爱恋，不就是一个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完整例子吗？只不过他所热恋的是过去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只有一个发自远方的声音，像是一只飞过城市废墟上空的鸟在大笑。这个年轻人现在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从地上拾起格拉迪沃丢下的一件白色的东西，那不是一张莎草纸，而是一个速描本，上面用铅笔画满了庞贝的各种景色。我们应该把她将速描本落在那里这件事理解成她还要回来的一种誓约，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秘密的原因或是隐含的动机，是不会忘记东西的。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汉诺德遇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发现和证据，但他却不能把它们理出头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他看到门廊的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有一个窄缝，一个身体特别纤细的人足能钻过去。他认为佐伊——格拉迪沃无须从这里遁入地下——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十分荒唐，他嘲笑自己曾信以为真。她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缺口作为返回墓穴的一条途径。他仿佛看到一个淡淡的影子消失在墓园街尽头，这街就位于今天的狄俄墨得斯德别墅前。

带着与前一天相同的问题处在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他开始绕着庞贝城郊区徘徊。他弄不懂，佐伊——格拉迪沃的身体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触摸一下她的手会有什么感觉？一种奇怪的冲动驱使他下决心要做一下试验。然而，另外一种同样强烈的相反的抵制心理却使他放弃了这种想法。

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他遇到了一位年长的绅士，从他的服饰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位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他似乎在专注于捕猎。他转向汉诺德说道："你也对法拉格兰尼西斯感兴趣吗？我几乎没有怀疑过，或许它并不仅仅出现在卡布里岛那边的法拉格兰尼群岛上，可能也在大陆上寄生。我的同事艾玛[①]所设计的方法的确不错，我已经使用过多次了，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96）他不再往下说了，把一个用草编成的圈套放在一个岩石缝前面，那里面有一只蜥蜴露出闪亮的蓝色小脑袋在窥视。汉诺德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离开蜥蜴狩猎者。他想像不出是什么愚蠢和不可思议的目的引导人们长途跋涉来到庞贝城。当然，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他本人，他并不责备自己来到庞贝城的灰烬中追寻格拉迪沃的足迹，也不管目的是否荒唐可笑。他感到那位绅士的面孔有些熟悉，似乎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瞥过一眼这张面孔。他那谈吐的方式也好像是在与一位老相识说话。

他继续向前走，经一条便道来到了一所房子前面。这所房子他以前没来过，再细看原来是第三家旅馆，叫"太阳旅馆"[②]。店老板闲来无事，趁机向客人炫耀他的客房，展示他收藏的古董。他告诉客人，有一天他目睹考古学家们在广场旁

① 19世纪后半期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

② Albergo del sole，意为"太阳旅馆"。

边发现了一对相爱的恋人，他们知道难以逃脱厄运，彼此紧紧相拥等待死亡。汉诺德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并且一直认为它不过是一些想像力丰富且喜欢编造故事者的无稽之谈，所以耸了耸肩以示不屑。但是，今天店主的话使他开始有点相信，尤其是当店主拿出一个金属饰针（metal clasp），上面生有绿锈，说这是从姑娘遗体旁边的灰堆中发掘出来的，他就更加相信这是真的了。汉诺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枚金属饰针。当他离开这家旅店时，他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一枝开满了白色花朵的常春花在向他摇曳点头。望着这枝祭祀用的花，他更加深信刚才买到的这件物品真实无疑。

可是有了这枚饰针之后，新的幻想又占据了他的大脑，或者说是原有的幻想又有了新的延续——似乎这对于已经开始的治疗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距广场不远的地方，一对相拥的年轻恋人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他的梦中，格拉迪沃就是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躺下睡去的。事实上，她有没有可能又往前走了几步，经过广场遇到了某个人，后来她们一起死在那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头由这种猜疑而生一种类似忌嫉的痛苦之情。他通过反思这件事情的非确定性成分，慢慢缓和了这种心情，让自己恢复平静，以便能心平气和地在狄俄墨得斯德旅馆吃晚餐。在那里，他的注意力被两位新到的游客所吸引，他们是一男一女。尽管他们的头发颜色不同，但他们的外貌有某种相似，他判断他们多半是兄妹俩。他们是汉诺德踏上旅途以来首次给他留下好感的人。姑娘身上带着一朵红色的苏伦多玫瑰，引起了他的某种回忆，但他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后来，他上床睡觉，又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并无什么意义，但显然是来自白天经历的思想波动。“在某个地方，格拉迪沃坐在阳光底下，用草编制的圈套捉住了一只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个方法的确不错，她用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他摆脱梦境，但还是睡意朦胧。他在寻思，这简直是疯了。这时，一只看不见的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一般的鸣叫，用嘴啄住了那只蜥蜴，飞走了，这才帮他从睡梦中彻底摆脱出来。

尽管有这些混乱，他还是带着一种清新、平和的心情醒过来了。一根玫瑰树枝上开满了玫瑰花，与他前一天在那位年轻姑娘的胸前看到的那朵玫瑰花同属一类。这样他想起好像夜里有人说过人们在春天赠送玫瑰。他不假思索地摘下了几朵玫瑰。这花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使他心理上产生了放松效果。他感到以往那种孤僻的心情不见了，他捧着玫瑰花，带着金属饰针和速描本，脑子里想着与格拉迪沃有关的问题，沿着常规路径朝庞贝城走去。这时，原先的幻觉开始破裂：他开始怀疑格拉迪沃是否真的在庞贝，她是否不仅在正午时间出现，而且在其他时间也出现。这时，他的思考重点已经转移到新近获得的新意识上，由此而产生的忌妒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折磨着他。他甚至希望幽灵能够只让他的眼睛看见，而别人则视而不见。这样，他就可以不顾一切，把她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四

处徘徊，等待着中午时光的到来，这时他看见了他所不希望看见的场面：只见墙角有两个人，他们一定以为没人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彼此相拥，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他很惊讶地认出，他们就是前天晚上曾经给他留下好感的那一对男女。可是，他们现在的行为似乎与兄妹不相符：在他看来，他们拥抱和接吻的时间似乎是太长了点。这么说，他们是一对恋人，或许是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夫妇——另一对爱德温和安吉莉娜。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见到他们却让他感到满足。他感到有些诚惶诚恐，似乎他打扰了某种表现忠诚的秘密行为。他退了回来，不再观察。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已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似乎又找回来了。

当他来到麦利戈宫时，心里又一次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笼罩，他怕看见格拉迪沃有另外一个人陪伴。当她出现时，他所能够想出的惟一的问候语便是："你是独自一人吗?"他好不容易才从她的反应中觉察到自己还为她带来了一朵玫瑰花。他向她坦白了自己刚刚经历的幻觉——在广场上，与恋人相拥，他刚买回来的那枚金属饰针就是她的。她不无嘲讽地问他那件东西是不是在阳光下发现的：阳光（她使用了意大利语"sole"一词）产生了各种各样类似那件物品的东西。他承认他有些头昏脑涨。她提议他应与她一起吃一顿野餐，这样有助于让他大脑放松。她递给他半个用薄纸包着的面包卷，自己吃另外一半。她看上去胃口很好。当她在嚼面包皮的时候，那口漂亮的牙齿闪烁于朱唇之间，并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觉得好像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共进过这样一顿美餐，是在二千年前，难道你记不起来了吗?"（118）她说道。他想不出如何回答。可是，吃了食物以后大脑有些轻松，再加上她所发出的表明她实际存在的许多信息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他开始慢慢恢复理智，并开始怀疑把格拉迪沃当成是白天的一个幽灵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当然啦，她说二千年前与他共同用过餐也未必可信。他想出一个试验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他重鼓勇气，小心谨慎的去实施。她的左手放在膝上，手指柔美纤细。屋里有一只苍蝇飞来飞去，莽撞无礼不合时宜，惹得汉诺德很是恼怒。突然，他举起手掌，用力打在苍蝇身上，同时也打在格拉迪沃的手上。

这个大胆的试验产生了两个效果：首先，他得到一个愉快的发现，那就是他的确碰到了一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温暖的人手。可是，接着从格拉迪沃嘴里发出的责怪却使他惊恐地从石阶上跳起来。她先是吃了一惊，待恢复常态后，便冒出这么一句："你肯定是疯了，诺伯特·汉诺德!"众所周知，叫醒一个沉睡者或梦游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喊他的名字。可是，不幸的是当格拉迪沃叫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是如何反应的（他在庞贝没有将名字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汉诺德曾经遇到的那一对讨人喜欢的恋人出现了。那位年轻的太太用惊喜的腔调喊道："佐伊！你也在这里呀？和我们一样在度蜜月吗？你给我写信时可只字未提呀!"面对证明格拉迪沃确实存在的新证据，汉诺德溜之大

吉。

对于这次不期而遇，佐伊一格拉迪沃也感到意外的不快。显然，她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被打扰。可是，她还是尽快调整好自己、流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向她的朋友——甚至也向我们——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以便能够使她摆脱这一对年轻夫妇。她向他们表示祝贺，但她本人并不是在度蜜月。“刚才走开的那个年轻人，精神有些失常，他好像认为他脑袋里有一只苍蝇在嗡嗡作响。呃，我想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某种昆虫，我该研究研究昆虫学，以便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可以提供点帮助。我父亲和我住在太阳旅店，他的头脑里也进去了某种东西，于是便产生了这个好主意。父亲带我一起来到庞贝，条件是我玩得开心，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我告诫自己，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挖出个好玩的东西。当然，我并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有如此发现，我指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你，吉莎。”她继续说，她现在得走了，去陪伴她父亲在太阳旅馆吃午饭。说完，她就离开了。经过她的介绍，现在我们知道了她就是那位捕捉蜥蜴的动物学家的女儿。她还用她那闪烁其辞的话向我们透露了她的治疗意图和其他秘密想法。

然而，她走的方向却并不是朝向她父亲在那里等她吃饭的太阳旅馆，她似乎也看见一个影子一般的东西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附近寻找它的坟墓，后来便消失在一块墓碑的后面。于是，她朝着墓园街走去，每走一步，脚几乎都是垂直抬起。汉诺德在害羞和慌乱中已逃往这里了。他在花园的门廊里来回不停地踱着步，正在用理智整理他头脑中的遗留问题。有一件事现在变得异常明朗起来。他曾完全丧失理智，竟然相信他在结交一位年轻的庞贝妇女，她重获生命，以一种类似的物质的生理形态出现。无庸置疑，这一幻觉清晰的认识，是他在返回健康认识的路上跨出的关键性一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活生生的妇女在与其他人交往时，似乎她也与他们一样是真实存在着的，她叫格拉迪沃，并且，她知道他的名字。他尚未彻底清醒的理智还不足以解开这个谜。他的情绪也不够平静，感到无力面对如此艰巨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在二千年前与庞贝城里的那些人一起被埋葬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这样，他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佐伊一格拉迪沃了。

然而，一种强烈的想要再见到她的愿望又产生了，抵制着他头脑中残余的想要逃跑的念头。

当他转过柱廊四个转角中的一个时，他突然退了回来。在一块断石壁上，坐着一个当年死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里一批姑娘们中的一个。他又一次企图逃人幻想王国中去，但很快又抑制了这一冲动。不，这是格拉迪沃，她是来给他进行最后一次治疗的。她准确地判断出，他本能地试图要逃离这座建筑物，她向他解释要想离开是不可能，因为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她非常冷静，开始询问他想

把她手上的苍蝇怎么样。他没有胆量使用某个具体的代词[①]，但他却有勇气做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问她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头脑里相当混乱，我为打你的手向你道歉……我不明白我何至于如此疯狂……我也不明白那只手的主人为何能叫着我的名字指出我的失态。”（134）

“这么说，你还是不能明白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可是，我不能说我对这一点会感到惊讶，你已经让我习惯了。其实，我无须来到庞贝才知道这一点，你也可以少跑一百里的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证实这一点。”

“在离更近一百里的地方，”她解释说，因为他还是不明白，“与你住的房间隔街斜线相对的拐角处有一所房子。在我的窗户里挂着一个鸟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金丝雀。”

当他听到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仿佛唤起了遥远的记忆：一定是这一只鸟的歌声使她产生了到意大利来旅行的念头。

“我父亲理查德·伯特冈，一个动物学教授，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原来如此，她是他的邻居，她看到过他并且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感到似乎是被浇了一盆冷水：问题的结局平淡无奇，并不值得我们如此期待。

诺伯特·汉诺德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道：“那么，你是……[②]，你是佐伊·伯特冈小姐？可是她长得另外一副模样啊……”

伯特冈小姐的回答表明，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单纯的邻居关系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关系。她可以使用熟悉的第二人称单数讲话，他中午时分与幽灵讲话时也很自然地使用过这一人称形式，但后来与这个活生生的姑娘讲话时却一直回避不用。她为自己辩护道：“如果你觉得使用正式的称呼更合适，我也可以使用这种称呼。可是，我觉得换种方式讲话会更自然。我不知道我看上去跟以前是否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友好地玩，有时还变着法地玩，你撞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可是，如果你最近这些年来曾经注意观察过我的话，你就会明白我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如此看来，在他们俩之间还有过一段童年的友谊——或许是童年的恋情——这说明她使用第二人称是有道理的。这一结局或许正像我们起初怀疑的那样平淡无奇。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童年的关系意想不到地解释了大量发生于他们现

① 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到目前为止，在汉诺德与格拉迪沃的谈话中，他一直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代词是古典用法。然而，现在他开始发现他与之交谈的是一位现代德国姑娘。他感到第二人称单数似乎显得太熟悉，太亲密了。而格拉迪沃在她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却一直在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② “Sie”，德语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通常用在正式场合来代替第二人称单数 du。

在接触中的细节时，我们的理解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以汉诺德击打佐伊—格拉迪沃的手为例，为了用试验证实幽灵的身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他找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难道这不是正像佐伊所说的他们童年时期经常玩的“打闹”游戏的重现吗？请再想一下，格拉迪沃问考古学家是否记得曾在二千年前共同吃过一顿饭。如果我们再次考察一下他们的童年历史——姑娘还记忆犹新，而小伙子却似乎已经淡忘，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似乎突然具有了某种意义。这一发现让我们有所顿悟，年轻的考古学家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可能是他忘却了的童年记忆的回光返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幻觉就不是想像的随意性产品了，而是受他已经忘却但事实上还发生作用的童年印象所决定的，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应能详细地揭示他产生幻想的根源，虽然我们还只能推测，例如，他想像格拉迪沃一定是希腊血统，或许是某个受人尊敬的名士——比如谷神祭司的女儿。这似乎与他知道她有一个希腊名字佐伊以及来自一个动物教授的家庭这两个事实相吻合。如果汉诺德的幻想是记忆的变体的话，从佐伊·伯特冈提供的情况，我们有望找到那些幻想的根源。让我们来听一听她怎么说吧。她已告诉我们，他们早已在童年时代就有亲密的友好关系，现在我们接着倾听他们这种童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吧。

“那时，事实上直到人们开始把我们称做‘少女’[①] 时，我开始习惯于极度地依赖于你，并相信在世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找不到更加默契的朋友了。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父亲只对蜥蜴感兴趣，而对我则漠不关心。每个人（包括我以及其他姑娘）都会有所牵挂并与之相伴人生。那时，你就是我的惟一牵挂。可是当我发现你被考古学迷住心窍时——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在我看来你这文雅的选择实在太荒唐可笑了，而且，这也不是我想要说的——你[②]开始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脑袋上没长眼睛，嘴巴里没有了舌头，也不再有记忆，而我的记忆却还固着于孩童时期我们的友谊。显然这就是我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原因。每当我在街上遇到你时，——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冬天——你总是对我视而不见，更少听到你说任何话，你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这样，你对待其他人也是这样。我在你眼里就像一缕清风，而你——长着一头稀疏的黄发，过去常常是我给你弄乱的——就像一只制成标本的白鹦一样迟钝、干枯，同时又像只始祖鸟一样自以为是。是的，人们对挖掘出来的大洪水以前的鸟怪就是这样称呼的。只有一件事我没有怀疑到，那就是在你的头脑中同样也潜藏着一个关于我的自以为是的幻想。幻想我住在庞贝，是被挖掘出来的一件文物重又获得了生命。当你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好不容易

---

① 字面的意思是“炸鱼”。德语中的俚语，意指“少女”或“少年”。

② 由此开始，她又恢复使用“你”这个第二人称单数。

才断定你头脑中竟想像出这么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后来，我倒觉得有趣和高兴，尽管这事有点近乎疯癫，因为我曾告诉过你，在这一点上我从未怀疑过你。”

这样，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童年时期的友谊已变成什么样子了。在她那里，这种友谊逐步发展最终使她完全坠人爱河，因为一个姑娘必须有一个能够寄托情思的地方。佐伊小姐，既聪明又清纯，已经把她的思想清澈地暴露给了我们。虽然，对于一个人格健全的姑娘来说，第一次示爱都总是向着她的父亲，佐伊，她的家庭里除了父亲之外别无他人，就更容易这么做了。可是，她的父亲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情感财富，他将其全部兴趣都投人到他的科学事业上。因此，她不得不将其视线投向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尤其依恋于她的年轻伙伴。当他停止对她的关注后，她的爱并未因此而动摇，反而在不断加强，因为他开始变得像她的父亲，专注于他的科学事业并因此而远离生活，远离佐伊。这样，她在她的恋人身上再次发现了她父亲的身影，在两者身上倾注同一种感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她的感情中将二者认同。这就使得她可以做到于不忠之中保持忠实。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心理分析听起来很有点信口开河，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者向我们提供了某种极具代表性的证据。当佐伊形容她的昔日伙伴感情嬗变令她伤心时，骂他是一只始祖鸟，这是动物考古学中的一个术语。仅用这一个具体词汇她就把两个人的身份给概括了。她用相同的措辞来抱怨她所爱的人和她的父亲。我们可以说，始祖鸟是一个折中观念或中介观念①。在这一观念中，包含着她认为她所爱的男子愚钝的想法，而这又恰与她对父亲的类似看法巧合了。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事情的发展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考古学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留给他的仅仅是对用大理石和青铜塑成的女像感兴趣。他童年时期的友谊没有加深演化成为激情，反而被稀释了，他的记忆变成了深沉的遗忘，以致当他再次见他的童年伙伴时，却未能认出她，也没有注意到她。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我们的主人公，我们会怀疑，对于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的记忆缺失，也许“健忘”并非是准确的心理学解释。有一种类型的遗忘，其特点是比较难以唤醒，似乎患者内心深处有一种抵抗，在抗拒记忆的复活，即使遇到强大的外来刺激时也难以苏醒。这种类型的遗忘在心理病理学中被称做“压抑”，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病例好像就是这种压抑。现在，我们在总体上并不知道印象的忘却是否与脑中的记忆痕迹的消失有关，但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压抑”与记忆的消失或消退并非同时出现。事实上，被压抑的内容通常很难轻易地进人记忆中，除非它获得了更多的帮助，但是它却能够引起有效行为的发生，并且在某个外部事件的影响下，有一天它可能带来某种心理后果，这可以被看做是对遗忘记忆被修正或派

① 这类观念在梦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梦中基本的心理过程是主流。参阅《释梦》(1900a)。一些充分证据收在《论梦》的第四章中，(1910a) 同上书，第648页。

生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一切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似乎已经看出，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源自他与佐伊·伯特冈之间的童年友谊的被压抑了的记忆。当一个人的艳情系于某种压抑的印象时，即当他的性生活受到压抑的破坏时，被压抑的印象有希望在某个特殊时候得到恢复。有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对类似这种情况很适用，虽然它最初可能是用来指外部影响的排斥而不是指内心冲突。这句谚语就是："你可以用草叉消除自然，但她会不断地复归。"[①] 当然，这句谚语也不能包罗万象，它只是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本能还会恢复这一事实，却未准确地描述恢复的方式。这种恢复类似一种蓄意的背叛行为。被选作压抑的工具的东西——就像拉丁谚语中的草叉一样——又变成了恢复的工具；隐藏在压抑力量的内部或背后，被压抑的东西最终竟变成了胜利者。这一事实很少引人注意却很值得思考。费利西安·罗普斯所做的一幅著名蚀刻画（etching）比许多其他例证更加生动的阐释了这个事实，这种阐释是通过圣人和忏悔者的生活中一个受压抑的典型案例进行的。一个禁欲的和尚在外界的诱惑下，逃到了受难的救世主的塑像前。而这时，十字架像影子一样掉了下来，一个妖艳赤裸的女人像升到那个明亮的位置，同样做着受难的姿势。另外一些缺乏心理学知识的艺术家在表现类似的诱惑时，在受难的救世主身旁并排安上一个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罪恶"。只有罗普斯把"罪恶"安置在十字架上救世主所在的地方。他似乎已经明白，当被压抑的东西复苏时，它就在压抑力量中诞生。

在此暂做停留很有必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些病理学的案例让自己相信，当人的精神处于压抑状态时，它对于被压抑的某种感觉的任何方式的接触有多么的敏感，相信仅凭少许相似性，被压抑的东西就可以复活于压抑力量之中，并借助它发生效果。在进行治疗时，我曾经为一个年轻患者治过病——他当时几乎还是个孩子——在他初次不自觉地知道了性事之后，便开始逃避体内所产生的每一次性冲动。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压抑的目的。这一压抑，却激发了他的求知激情，增加了他对其母亲的依赖，培养了一种孩子气的性格。这里，我不想再进一步介绍这青年在与他母亲的交往中，他那受压抑的性冲动又如何再次暴发的。我要描述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现象，即在一般人认为很普通的一种情况下，他的另一道防线也崩溃了。数学历来有助人摆脱性纠缠的美誉。这就是当卢梭与一位妇人闹翻之后，他不得不接受来自她的一句劝告："离开女人，去研究数学吧！"[②] 因此，我们的这位逃亡青年便把他的特殊热情投入到他学校里的数学和几何方面。然而，突然有一天他的理解能力在某些异常简单的问题面前丧失殆尽。

---

① 这是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的一句诗（Epistle，I，第10页，第24页）。在德文版里引用有错误。

② 原文为拉丁文：Lascia Le donne e studia La Matematica!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两个物体正在互相接近，其中一个以……速度……""有一个圆筒，横截面的直径是 m，请描述一个圆锥……"。换了别人肯定不会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性的暗示，而他却感到连数字也在诱骗他。于是连数学也放弃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个诺伯特·汉诺德的人，他也借助考古学摆脱爱情和其童年友谊的话，那么，恰恰是那尊古代雕塑唤醒了他对童年时热爱的姑娘的记忆，这才是符合逻辑，符合常规的。他爱上格拉迪沃的大理石塑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似，他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佐伊也对他施加了某种影响。这种相似性暂时还难以解释清楚。

佐伊小姐本人似乎能够同意我们关于年轻的考古学家的幻觉的看法，因为在她结束她那"坦率、详细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批评性讲话时，她所表示出来的满意并不是基于别的什么，而是基于汉诺德对格拉迪沃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与她有关这个发现。这一点，她并没有料想到，但是，尽管有许多幻想性的伪装，她还是领悟了其中的真谛。然而，她对他所实施的精神治疗现在产生了它的行善效果。他感到轻松了，因为他的幻想已经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扭曲了的、不完整的复制品。他不再迟疑，他想起了她，承认她就是当年那个善良的、欢快的、聪明的女孩，而且承认她在本质上并未有多大变化。可是，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姑娘说，"有人为了再生而不得不去死，可这人无疑是考古学家了。"(141) 显然，她对于他没有沿着他们童年的友谊道路来发展他们之间的新关系，而是借助考古学迂回达到目标的做法不能原谅他。

"不，我指的是你的名字……，因为伯特冈与格拉迪沃意思相同，都是描述某人步态优美。"(142)①

我们大家都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放弃他的谦恭，改扮一个活跃的角色。显然，他的幻想症已完全治好了，开始掌握理智了，并通过亲自将自己幻觉之网的最后几根线扯断来证明这一点。这恰恰也是当一个病人在展示被压抑的东西而缓和了幻想的冲动之后的正常表现。一旦病人们醒悟过来，他们会用突然想到的种种说法解释他们幻觉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道谜题，我们已经猜测到想像中的格拉迪沃的希腊血统是希腊名字"佐伊"在他头脑中的模糊作用。但我们尚未触及到"格拉迪沃"这个名字的由来，而只把它作为诺伯特·汉诺德的不着边际的想像而放过去。不过，请注意！且慢！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派生物——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翻译——是那个他试图忘记的童年时他所热爱的姑娘的一直被压抑着的姓的派生或翻译。

现在，对幻觉的过程及其破译到此可以结束了。作者补充的这一段无疑是意

① 德语词根"bert"或"brecht"相当于英语的"明快"，而"gang"相当于英语"走"。

在为他的故事安排一个和谐的结尾。这个年轻人开始一度那样可怜，扮演了一个急需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角色，现在当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康复并能够在她身上唤起曾经折磨过他的情感，我们对这年轻人的前途也就感到放心了。原来，当他提起他们在麦利戈宫谈话时那个曾经打断他们的讨人喜欢的青年女子，并承认那个女子是他第一个认真喜欢的女人时，佐伊产生了妒忌。于是，佐伊准备冷淡地离开他。她说，反正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她本人也十分理智。他可以再去看望吉萨·哈特尔本（不管她现在叫什么名字）并在他来庞贝城的活动中给予他科学上的帮助。而她本人得赶回太阳旅馆去了，她的父亲正在那里等她回去一块吃午饭。他们也许还有机会见面，可能在德国的一个晚会上，也可能是在月球上。可他又故技重演了。他以轰赶那只讨厌的苍蝇为借口，先是接触了她的脸蛋儿，后又接触她的嘴唇，直到尽一个男人在做爱时理所应当的主动义务。有一次一个阴影投在他们的幸福上，那是佐伊坚持说必须回到她父亲那儿去，否则他就会在旅馆里挨饿了。“你父亲？……会怎么样？……”（147）但是聪明的姑娘很快就打消了他的担忧。“或许不会出什么事，我不是他动物收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是的话，我也许就不会这么傻地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你。”然而，当她父亲与她观点一致时，有一个办法可以稳妥地解决。汉诺德只需到卡普里岛上，捕捉一只蜴虎（他可以在她的小手指上练习这种技术），拿到这里来放生，然后当着他父亲的面再把它捉住，让她的父亲在他的女儿和这只大陆上的蜴虎之间进行选择。显然，这一计谋是带有苦涩的嘲讽。它告诫她的未婚夫对她不要太接近她心目中的偶像。各种迹象，表现出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又一次让我们对他安心。他提议他和他的佐伊应该到意大利和庞贝来度蜜月，就好像他从未对处于蜜月中的埃德温和安吉莱纳斯生过气一样。他从记忆中完全抹去了他对那些从德国远行数百里跑到这儿来进行不必要的旅游的幸福情侣们的不满情绪。作者在这里用记忆缺失作为汉诺德态度转变的一种可信的标志，显然是对的。对于“她这位似乎也是被挖掘出来的（150）童年伙伴”提出的蜜月计划，佐伊的反应是，她说她还未完全复活，不能做这种地理环境性的决定。

现在，幻想被美丽的现实所取代，但是，在这对恋人离开庞贝之前，这幻想还要再次演示一遍。他们走向赫拉克勒斯神庙大门，由此通向维亚·康苏列亚的入口处，街道由几块古代石板横向铺成，这时诺伯特·汉诺德停下脚步，他要求姑娘在他前面走。她心领神会，“她用左手把裙子提起一点，佐伊·伯特冈，或者说是格拉迪沃的再生，在他面前走过，他仿佛是在梦中一样注视她。她姿态轻盈，沿着石板道在阳光下走向街道的另一边。”在爱情战胜压抑之后，曾在幻觉中看到的美丽与高贵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他最后的明喻中——“把童年的伙伴比喻为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 作者向我们提示了理解象征的关键，主人公的幻觉就是借助象征而掩饰

他那压抑着的记忆的。事实没有比埋藏更适合与压抑做类比的了。压抑就是某种情感深藏于某人的心里却又无法接近。埋藏是庞贝城遭劫难的根源，借助于铁铲的帮助庞贝城又从埋藏中复出。因此，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其幻想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来到庞贝城，也就是雕像的发源地，而这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恋人。作者以他那灵敏的感觉，捕捉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1]与个体特殊的心理过程之间所具有的某种珍贵的相似。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行为是合理的。

① 弗洛伊德在其以后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借用庞贝城毁灭的例子来比喻“压抑”，例证参见在本篇文章（标准版，第10卷，第196～199页）发表之后不久又写的《对“鼠人”的分析》(1909d)。

第二章

我们原本打算做的事情，仅仅是借助某种分析的方法，对《格拉迪沃》中随便出现的二三个梦进行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竟至于分解了整个故事，并对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实，这并非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某人真实所做的梦时，我们必须像现在一样密切注意这个人的性格和职业，不仅必须了解他在做梦之前的经历，还要掌握他很久以前的经历。我甚至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开始我们的中心工作的条件，我们应该在故事上再做停留，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读者们肯定会困惑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从精神表现和精神活动的各方面来分析诺伯特·汉诺德和佐伊·伯特冈这两个人物，好像他们是现实中的真人，而不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好像作者的内心是透明的，而不是有折射力或挡光的。作者称其故事为“幻想”，从而否认了它的真实性，这样，我的做法似乎更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我们却发现故事中的描述都非常忠实于现实。我们有理由怀疑《格拉迪沃》不是对幻觉的描述，而是一个精神病案例的研究。作者仅两次行使了他当作者的特权，设立了前提，而这些前提又似乎不符合现实规律。第一次是，他让年轻的考古学家遇到一件古代的雕塑，这件雕塑与一位距其创作年代很遥远的一位活人十分相似，不仅是在走路的姿势方面相似，而且在面部表情和身段的特征方面都很相似，以至于他把那个活人的出现当成是雕塑的复活。第二次是，作者安排年轻人在庞贝与生活中的女子会面，因为他想那死去的女子就埋葬在那里，于是到庞贝去旅行，事实上却使他远离了那位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城的街上见到过的女子。当然，作者的第二次情节规定也并非绝对背离现实可能性，它只是在利用机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无疑起到过作用的东西。再说作者是把机遇用于好的目的，这个机遇真实地反映了逃避恰是一种工具，它将一个人送到了他欲逃避的地方。第一个情节规定似乎更倾向于幻觉，好像完全产生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该情节成为以后其他情节的依据。雕塑与活人之间的极其相似性，若是作者严肃地选择的话，将仅仅局限于走路时姿态这一特征。这里，我们或许也想

把我们的幻想与现实做某种联系。或许，“伯特冈”这个名字能提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家族的妇女早在古代就由于其优雅的步态特征而与众不同。我们可以猜想德国的伯特冈家族是罗马家族的延续，其中一名女成员让一位艺术家以雕塑的方式把她的步态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既然人类形体的变化彼此相关，既然事实上古代的形体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在艺术作品集中看到的一样），那么，现代的伯特冈完全有可能全面再现她的古代女祖先的身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不过，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们不在此胡思乱想，而是向作者本人探询这部分创作的源泉是什么。那样，我们将有可能再一次揭示其真相。表面上看来随心所欲的安排，其实建立在生活法则之上。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得知作者心中的有关创作素材的秘密[①]，我们将允许他保留自己在不可能的前提之上建构完全真实的情节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使用过的[②]。

除此之外，要重申的是，作者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参照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对心理运作的理解——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方案可能是设计出来强化某些医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的。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向他提问，而他矢口否认有这种动机，那又该如何？把相关事物进行类比，并赋予其意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会不会也已经把一个背离作者个人意图的思想偷偷地塞进了这个诗一般迷人的故事里呢？有这种可能。

我们过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努力不完全用作者的语言讲述这个故事了，以免对该故事做出任何倾向性的解释。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叙述与《格拉迪沃》的原文比较一下，他就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称作者的作品系一精神病学研究，实在算不得是对作者的恭维。听人们说，一个作者应该避免提及精神病学，应把病理心理状态的描述留给医生去做。然而，事实是凡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不遵从这一忠告。对人类心理的描述也属于他们的领域。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科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科学心理学的先驱。但是，正常心理与病态心理之间的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定的。我们每个人一天之中或许会多次跨越这个界限。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如果多次把自己的研究永远局限于由于精微的精神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严重疾病，那它就进入误区了。较轻的健康失衡可以自愈。今天我们对其病因的探查仅能达到知道它是心理力量的交互作用发生紊乱而引起的，这也同样应该引起精神病学的关注。的确，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理解正常状态或严重疾病现象。

---

① 对照本作品的“后记”第94页。

② 对《李尔王》中“虚无的前提”的进一步论述，见弗洛依德的论文《三个小匣子的主题》的结束部分（1913，标准版，第12卷，第301页）。

因此，创造性的作家不能回避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学家也离不开创造性的作家。对精神病学的题材进行文学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绝不损害它的美[①]。

它的确是正确的——一篇对某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富有想像力的描述。现在，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悬念解开了，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我们将用我们这门学科的技术术语对故事复述一遍。我们不会觉得这么做与前面说过的要重复这个故事存在什么自相矛盾。

作者常把诺伯特·汉诺德的精神状态称为"幻想"，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作者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指出一种幻想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两种特征虽然不是对该幻想的全面描述，却可以把它与其他精神失常明显地区别开来。第一点，它是众多精神病态现象之一，这些病态现象不会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心理迹象（mental indications）表现出来。第二点，它的特点是在幻想中"怪念头"占上风——意即获得某种信念并对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汉诺德的庞贝之旅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格拉迪沃在废墟中留下的独特的脚印，我们就有了一个幻想影响行为的绝好例证。精神病学家或许会把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归到"妄想狂"系列，并可能会把它描述为恋物色情狂（fetishistic erotomania），因为其行为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那件雕塑的狂恋，还因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对脚及脚的姿态的兴趣必然让人想到"恋物癖"（fetishism）。当然，这些对不同种类的幻想根据其内容进行命名与分类的做法，总有些根据不足[②]。

由于我们这位主人公是基于某种奇特的嗜好发生幻想的，所以，一位严肃的精神病学家立即会认定他的行为是一种身心"退化"，并会研究一下他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无情地导致他遭此命运的原因。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并未按照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思路去做，而是自有高见。他希望使这位年轻人更接近我们，以便更容易地激发读者"感情移入"。若诊断为退化，不管正确与否，就会立刻使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与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正常的人，是人性的衡量标准。作者也没有过分关注主人公的遗传特征和先天的生理条件，而是深入到社会的心理素质（mental makeup）中去，因为心理素质是他产生妄想的根源。

在一个重要方面，诺伯特·汉诺德的行为表现大异于正常人。他对活生生的女人没有兴趣，而变成了科学的奴仆。科学剥夺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却让他对用大理石或者铜造就的女人发生兴趣。这不应该被看做是微不足道的特癖，相反，

---

① 弗洛伊德对创造性作家提供的心理病理学材料的分析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文《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中出现的，可能写作时间早于本作品出版一两年。

② 事实上，诺伯特·汉诺德的病态应该被诊断为癔病性幻想，而不是妄想狂。他的病情中没有妄想狂的表现。

它是待描述的整个事件的基本前提。因为曾几何时那样一件特殊的雕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普通人只对活生生的女人才会有，他的幻觉也由此而产生。接着，我们便看到事情出现了转机，他的幻觉通过一次幸福的转机而被治愈，他对大理石塑像的兴趣重新被活生生的女人所取代。作者只是让我们跟踪导致这位年轻人远离女人的种种影响。他只是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态度不能由其先天素质来解释，相反，它包括一定程度的想像的（或许，我们可以加上“色情的”）需要。正如我们在故事后面的情节中所看到的，他在童年并未逃避过其他的孩子：他和一位小姑娘发生了友谊，她成为他难分难舍的伙伴。他们一起分享食品，他常常撞击她，也让她弄乱他的头发。童年未成熟的性冲动正是表现在这种互相依赖、互相爱慕又互相攻击的行为中。性冲动的结果只有在后来才表现出来，但这时自己变得无法抗拒了。童年时期的性冲动通常只有医生和创造性作家才识别得出来。我们的这位作家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因为他让他的主人公突然对女人的脚及其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在科学界以及他居住的小城镇的妇女中招致了恶劣的名声：一个恋脚狂（foot-fetishist）的名声。可是，我们难免要将这种兴趣追溯到他对童年伙伴的记忆，因为这位姑娘在她童年时无疑已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优雅姿态。当她走路时，她的脚趾几乎抬成与地面垂直。正因为这件古代的大理石雕塑表现出了相同的走路姿态，所以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才显得如此重要。这里我们顺便加上一句，作者提出这一突出的恋物现象时，他是非常尊重科学的。自从比纳以来，事实上我们一直试图把恋物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童年时的性印象①。

这种长期逃避女人的状态会导致一个人对妄想的易感性，或者我们习惯称之为“秉性”。精神紊乱发生在一个偶然印象唤起久被忘却的但又至少夹杂有色情成分的童年经历之时。如果我们想想随后发生的事，就会发现“唤起”一词使用不当。我们必须像作者那样使用正确的心理学专业术语，以精确描述。当诺伯特·汉诺德看见这件雕塑时，他并未记起在他童年伙伴那里曾见过相似的步态，他的记忆中一片空白，可是这件雕塑所带来的效果都源于他的童年经历所铸造的这一情结。所以，童年的经历便被搅动了，变得活跃起来，并开始生效。但它还并未进入意识状态，用一个目前心理病理学无法回避的概念来描述，它还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希望这一潜意识的概念不要卷入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的争辩常常仅有词源意义而已。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当事人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时，我们姑且使用

---

① 比纳有关恋物现象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一书中有所介绍。1920年他又给该书加了个脚注，对比纳的恋物现象论提出质疑。弗洛伊德有关恋物现象的其他论述，可参阅同篇的另一脚注。

“潜意识”这一概念。如果某些思想家要对这种潜意识的存在进行质疑，理由是它无法被感知，那么，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从未见识过此等心理现象，他们的思想还僵化于常规经验，以为心理活动一旦活跃起来，一旦十分强烈，就一定是可以被意识到的。我们还猜测到，他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十分了解的），肯定存在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尽管是激烈的，也能产生效果，然而却还是未被意识到。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诺伯特·汉诺德有关与佐伊童年关系的记忆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在这里我们将它们称之为“潜意识”记忆。因此，我们现在得注意一下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意义上似乎有些相似。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并不困难。“潜意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压抑”则是意义狭窄的概念。凡是被压抑的，都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不能断言，凡是意识不到的，都是被压抑的。如果当汉诺德看到雕塑时就忆起以前佐伊的步态，那么他先前潜意识的记忆就会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并被意识到。这就可以表明它先前的记忆并未被压抑。“潜意识”纯粹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静态的。“压抑”是一种动态的表述，它考虑到了心理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暗示有一种力量，在试图造成各种心理效应，包括逐渐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但同时还有一种反对力量，它能阻碍这些心理效应，仍然包括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的出现。某些东西被压抑了，某标志恰恰就是它不能够进入意识，虽然它很强烈。因此，在汉诺德的病例中，从雕塑出现之时起，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某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或者干脆点，就是被压抑的东西。

诺伯特·汉诺德关于童年时与那个走路姿势优美的姑娘的关系的记忆受到了压抑，但这还不是对这一心理情境的正确说法，那么我们就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在心理生活中，惟一有价值的是感情。如果心理力量不具有唤起情感的特征，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意念受到压抑，仅仅是由于它们与不应该发生的情感的释放有关联。说压抑作用于情感，似乎更正确一些，可是只有在情感与意念的联系[1]中，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的情欲受到了压抑，由于他的情欲除了童年时的佐伊·伯特冈之外别无其他对象，所以他有关她的记忆便被忘却。那件古代的雕塑唤起了他身上蛰伏的“性情感”（erotic feelings），使得他的童年记忆活跃起来。由于他身上存在一种对性欲（erotism）的抵制力量，因此这些记忆只能以潜意识的形式发生效力。现在，在他身上性欲的力量与压制它的力量之间正进行一场较量，其表现形式就成为妄想。

作者忘了对导致故事主人公性欲受到压抑的原因进行解释，汉诺德对科学的

[1] 为了与弗洛伊德后期及更详细的有关压抑的论述相一致，有关这一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著述。在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中第三四部分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论述。

痴迷仅仅是压抑发生作用的工具。医生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挖掘得更深一些，但也许不会想到原因问题。然而，我们的作者，正如我们一贯赞赏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被压抑的性欲如何就在压抑手段中产生的过程。一件古董——一个女人的大理石雕像很可能就是阻止考古学家逃避爱情，并警告他偿还人类自出生时起就对生活所欠下的债的力量，这样推理是正确的。

雕塑在汉诺德身上引发的心理过程的第一点表现，就是围绕雕塑上的人像所产生的幻想。在他眼里，塑像似乎有点现代气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艺术家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姑娘走过街道时捕捉到这一形象的。他给古代雕塑中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这一想法来自驰入战场的战神的称号——“战神格拉迪沃”。他赋予她以愈来愈多的人格特征。她可能是一位负责神庙事务的名门贵族的女儿。依据她的特征，他猜测她具有希腊血统，最后，他觉得她不应生活在喧嚣的都市，所以就把她移到了平静的庞贝。在那里，他让她踏着熔岩形成的台阶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向另一边（11）。他这些幻想的内容似乎有些随心所欲，但都是无可怀疑的。的确，当这些内容第一次诱发他的行为时——即当考古学家被她的脚步姿势是否与现实一致这一问题所困惑，开始在生活中观察现世存在的妇女和姑娘们时——就连这一行为也被蒙上了科学的有意识的动机，仿佛他对雕塑格拉迪沃的兴趣完全发源于他对考古学的职业性关注（12）。他选做研究对象的街上的妇女们，一定会以一种赤裸裸的性爱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我们只能认为她们是对的。汉诺德对其研究的动机一无所知，同样他对产生关于格拉迪沃的幻想的原由也无从知晓，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予怀疑。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为和幻想正是他对少年爱情记忆的反映，是那些记忆的派生物、变形和歪曲，因为它们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他的意识领域。这件雕塑具有某些“现代”气息，这一表面的美学判断，使他意识不到那种变态是由一个他曾熟悉的姑娘“此时”走过街道时做出来的。雕塑品“源于生活”这一印象以及关于她的希腊血统的幻想，掩盖了他对佐伊这名字的记忆，因为佐伊在希腊文中意指“生存”。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幻想症被治好之后，我们从主人公口中得知“格拉迪沃”就是“伯特冈”这个姓的准确翻译，意指“某人优雅而漂亮地走路”（第37页）。幻想中有关格拉迪沃父亲的细节，来源于汉诺德的记忆：佐伊·伯特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女儿，这里大学可以用古典术语“神庙事务”加以类比。最后，他在妄想中把她送到了庞贝城，这并非“因为她那恬静、稳重的性格适合这个环境”，而是因为在他的学科里没有其他或更好的情景表现他当时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了。在这一状态中他通过模糊的信息渠道想起了童年的友谊。他一旦把自己的童年与历史的过去放到了一起（他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在庞贝的埋葬——过去连同它的收藏一起消失了——与他通过被称之为“灵魂感知”的手段所觉察到的压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极其的相似。这里，他使用的是作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让那位姑娘有

意识地使用的那种象征手法："我告诉过我自己，我会独自在这里挖掘出有趣的东西来。当然，我并没有想到会出现……"（124［第 28 页］）在故事的结尾她答应汉诺德的蜜月计划时，也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童年朋友也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了"。（150［第 39 页］）

因此，在汉诺德虚妄性幻想和潜意识行为的第一组结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类不同来源的决定因素。

汉诺德本人已十分地清楚，其中一类是我们在考察他的心理过程时发现的，是从汉诺德的角度来看，是他意识到了的。另一类则是未意识到的。一类是来源于考古学的科学概念范围，另一类是滋生于其受压抑但已开始活跃的童年记忆及附着其上的情绪本能。我们可以把一类决定因素描绘成浮于表面，掩盖着另一类的决定因素，所以，第二类藏于第一类之后。科学的动机可以认为是为无意识的色情因素提供了借口，而科学也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为幻觉服务之中。然而，不应忘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能产生任何不能满足意识的科学的因素的效果。妄想症状——幻觉及其潜意识行为——事实上是两股"意识流"（mental currents）之间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妥协中，双方都有要求，但是每一方又必须要放弃它要求的一部分。在妥协达成之前肯定有斗争——在故事里，它是我们假设的受到压制的性欲与压抑它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幻想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无休止的。每一次妥协建立以后，新的攻击与抵抗又产生，如此说来，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安排某种特殊的骚动统治这一时期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失调，并把这种骚动作为故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这些有价值的特征——幻觉与决定的双重动机和以被压抑内容为主要动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借口——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安排很合理，因为这样一来就抓住并表现了精神疾病心理过程的真正的主要特征。

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是随着一个梦展开的。这个梦并非由任何新的事件引起，好像完全产生于他那个充满矛盾的大脑。在我们弄清楚作者在构思汉诺德的梦的时候，是否真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对主人公有着深刻的理解。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幻想起因的假设，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解释的；对压抑和无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对冲突和妥协的形成，精神病学又采取什么态度。简言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篇关于幻想起因的富于想像力的描述，在科学的判断面前能否站得住脚。

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答案。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科学在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出现了破绽。是科学允许在幻想的遗传与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其创造物之间横亘一条沟壑，这沟壑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等待着作者将其填平。科学并不怀疑压抑的重要性，也未意识到为了解释心理病理现象，

无意识概念是非用不可的，它不在心理冲突中寻找幻想的基础，也不把幻想的症状看做是妥协的表现。面对统一的科学，我们的作者是孤立的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算做科学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直到最近，基本上是独自一人——我本人一直支持我从詹森的《格拉迪沃》提炼的全部观点，并用专业的术语将它们表述出来。在涉及到癔病的强迫症时，我曾详细地指出，这些心理失常的个体决定因素是本能生活部分的被克制，以及表现被抑制的本能的观念的被压抑。之后不久，在谈到妄想型的形成时，我又重复了相同的观点。因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本能是总是构成性本能，还是属于别的什么类别，这个问题在分析《格拉迪沃》这个特殊病例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作者所选择的这一情境中，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性感被压制的问题。心理冲突的前提以及以互相冲突的两股心理流间的妥协为手段形成的症状的合理性，我在实际观察和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予以证实，正如我在关于诺伯特·汉诺德这个想像的病例中所证实的那样①。甚至在我之前，皮埃尔·让内，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沙可的学生，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及我本人一起合作，已经探索到神经症，尤其是癔症所带来的后果②。

从1893年开始，当我投身于对心理障碍的起因的研究时，我的确从未想到过在想像题材的作品中来证实我的新发现。因此，当我发现出版于1903年的《格拉迪沃》的作者的创作依据竟是我最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东西，我真有点吃惊了。一位作者是如何获得只有医生才可能拥有的知识——或者至少他表现得似乎已掌握了这一知识？

如我前面所言，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由于一个梦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该梦发生于他试图在他居住的小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像格拉迪沃那样的走路姿态的过程中。简要地叙述这个梦是很容易的。做梦者发现他自己在不幸的庞贝城被毁灭的那一天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己并未遭遇危险，却体验到了那种灾难的恐怖。他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在那边走着。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她是个庞贝城人，她当时正住在她家乡，“他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12）。他为她而感到恐怖并发出了一声警告。她听到呼叫，把脸转向他张望片刻。但她并未注意他，继续前行，躺倒在阿波罗神庙前的台阶上。她的脸色失去红润，似乎是在变成白色的大理石，直至最后变成一件雕塑，被埋葬在倾泻下来的火山灰之中。当他醒过来时，他把传入到他卧室里的大城市的噪音看做绝望的庞贝居民的求救声和波涛翻滚的波浪声。就在他醒来后，还一直相信他梦中所见是他亲身经历。他相信格拉迪沃曾经生活在庞贝城，就死在那个灾难的日子。一场梦留给他的信

① 对照《一个癔症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e）。

② 对照《癔症研究》（1895）（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

念成为他幻想的又一新起点。

我们不敢妄言作者描写此梦并将妄想的展开与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用意。事实上，已有热心的研究者搜集了大量的病例，来说明心理的障碍与梦境有关并产生于梦境。也有情况表明，在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活中，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和做出重大决定的冲动也产生于梦境。但是，这些类比对于我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帮助，因此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这个病例中来，即作者考古学家诺伯特·汉诺德想像出的这个病例。如果此梦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不必要的装饰，我们该从哪人手认识这个梦，才能把它与整个故事统一起来？

我可以想像得出，读者中定会有人对此斗胆直言："这个梦太容易解释了——这是个由城市的噪音引起的简单的焦虑梦：由于考古学家满脑子全是那个庞贝姑娘，因此错将噪音当成庞贝城的毁灭。"多数人对梦的过程的轻视，一般对梦的解释都是肯定有某种外部刺激与梦的内容大体吻合。导致主人公做梦的这一外部刺激，就是吵醒睡眠者的噪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梦的兴趣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真想假设，那天早晨城市的噪音比平时更大一些！我们也真希望作者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汉诺德一反常态，开着窗户睡觉！可是很遗憾，作者没有多动些笔墨告诉我们。要是焦虑梦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可它们不是，所以这个梦激发的兴趣远不止于此。

梦的形成与外部感官刺激并无必然联系。睡眠者可以无视这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无视被这类刺激吵醒而根本不做梦，或者像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由于这种刺激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把它插在梦中。有大量的梦，外部刺激对睡眠者的感官作用不能决定梦的内容①。这个观点讲不通，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或许，我们可以在梦对汉诺德醒来以后的生活产生的效果中找到切人点。在那之前，他就有一种幻想，认为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假设现在被他所肯定，接着另一个假设也被肯定——她与其他人一起于公元 79 年被埋葬了②。忧郁的情绪伴随着妄想的展开而弥漫开来，有点像充斥于梦境的焦虑的回声。源于格拉迪沃的这一新生痛苦，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格拉迪沃即使是在公元 79 年的那次毁灭中幸存下来，到现在也已死去许多世纪了。我们应不应以这种方式与诺伯特·汉诺德或作者争论？这样，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似乎已理解无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梦而生起的幻想的扩张是与一种极其痛苦的情绪同时发生的。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与先前一样一筹莫展。这个梦不会不解自明，我们只好从我的《释梦》中借用几条规则，来解释眼前的这个梦。

---

① 参阅《释梦》，标准板，第 4 卷，第 22 页。

② 参阅《格拉迪沃》正文（15）。

规则这--大意是说一个梦的内容与做梦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他遵循了这一条原则，因此他把梦与汉诺德的“步行者研究”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研究的惟一意义就是他在寻找格拉迪沃，试图认出她那富有特色的姿态。因此，这梦里应含有一个暗示，指点他在哪儿能找到格拉迪沃。的确梦里她出现在庞贝，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另一条规则讲，如果梦者对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信念经久未变，以致自己难以从梦中解脱出来，这说明该信念不是由梦的意象的生动性引起的错觉，而是一种心理行为：它是与梦的内容相关的一种确认，确认某事果如梦中所见，这时梦者应该相信这些保证[1]。如果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我们肯定会得到结论，梦提供了他要寻找的格拉迪沃的去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我们了解了汉诺德的梦，那么，把这两条原则应用于其中能够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吗?

说来也怪，确有此效，只不过这种意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伪装了起来，不易被全部认出来。汉诺德从梦中获悉，他曾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居于一城。这与佐伊·伯特冈来的情况吻合，只是梦中的城市不是德国的大学城，而是庞贝城。时间也不是现在，而是公元79年。看得出来这是由位移而导致的一种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格拉迪沃，而是迁移到过去的梦者。不过，基本的和新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他要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可是，这却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梦者，掩盖了梦的事实含义和内容的位移和伪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这一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作为幻想先兆的各种幻觉的起因和本质（44、55）。它们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替代和衍生，除非被压抑的记忆变形，否则它将受阻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但它又可以通过变化和歪曲抵抗稽查者的许可，有可能进入意识领域。当这种妥协（机制）一经建立，记忆便转为幻想。这很容易被意识所误解，即难以与占主要地位的心理流汇合。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梦的形象是人们的生理，而非病理幻想的产物——是被压抑成分与占优势的成分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这种斗争可能每个人都有，就连那些在白天看来头脑完全正常的人也会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须将梦的意象看做是某种被扭曲的事物，应该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别的东西，某种被歪曲的事物。但这种事物是不易找到的，像汉诺德幻想背后被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我们用这种办法发现的正反两方面表现出来，办法是把梦者初醒时的记忆，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欺骗稽查者歪曲前梦的基础，即隐性梦念区别开来。因此，释梦包括将梦的显性内容解译成隐性梦念，包括把梦念歪曲为从屈从于抵抗稽查者下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解释目前的这个梦，会发现其隐性梦念只能是：“你要寻找的那位具有优雅步态的姑娘的确与你同居一城。”但是这一思想在

[1] 同上书，第四章，第187页；第五章，第372页。

隐性梦念阶段是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的。它为一个稽查者所阻，这个稽查者就是幻想已经规定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规定是在此之前的心理妥协的结果。如果要确认她与诺伯特于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地方这一事实，那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歪曲的信念："你与格拉迪沃在同一时期住在庞贝。"这便是为梦的变性内容所传达的信息，并被表现为一个实际经历着的事件。

一个梦一般很少仅表现或者说表演一种思想，而通常都是表现了一系列的思想，一个思想的网络。汉诺德梦境中的另一构成要素可以被分离的，它的歪曲状态可以很容易被反正，因此它所表现的潜在意念是可以被识别的。这个构成要素就出现在梦的结尾处，它又一次将梦的现实的可能性拓展开来。在梦中，步行中的格拉迪沃被变成了大理石塑像。这只不过是对现实事件具有独创性和富有深意的表现，事实上，汉诺德已经将他对活生生的姑娘的兴趣转移到了雕塑的身上：对于他来说，他所热爱的姑娘已经变成了大理石塑像。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梦念，在努力把雕塑变成活生生的姑娘，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你只是对格拉迪沃的塑像感兴趣，因为它使你想起了佐伊，而她此时此刻还活着，就在此地"。可是，如果这一发现进入意识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幻想要结束了。

我们是否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用潜在意念替换梦的显性内容的每一个片断呢？严格地讲，是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确实做过的梦，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一义务的。即使是那样，梦者也必须向我们做最详尽的解释。显然，我们是不能在作者创作的故事中实现这一要求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解释或破译梦的过程中尚未分析梦的主要内容。

汉诺德的梦是个焦虑梦，它的内容是恐怖的，梦者睡眠时感到了焦虑，之后便产生了痛苦的感觉，这于我们解释梦多有不便，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释梦的理论。该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误入这样的歧途；误把梦中感觉到的焦虑归属于梦的内容，把梦的内容当做是清醒时的意念内容。它还指出，人们会经常在没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梦见可怕的事情。而我们却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易猜测到，却可以证实。焦虑梦中的焦虑像一般情况下的神经性焦虑一样，属性情感和性感觉，都来源于被压抑的力比多①。因此，当我们释梦时，我们须用性兴奋来取代焦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焦虑——并非一成不变，却很频繁地对梦的内容产生有选择的影响并导人意念性因素。这些意念性因素当我们从意识的角度和错误的观点来考察时，似乎与焦虑的情感相适宜。我已讲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许许多多的焦虑梦之内容一点儿也不恐怖，因而也不可能对感受到的焦虑从意识的层次进行解释。

---

① 参阅我的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论文（1895b）和《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60～162页；第5卷，第582页——《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b]。

我知道对梦中焦虑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些怪，也很难让人相信，但我只能奉劝读者姑且接受它。再说，如果诺伯特·汉诺德的梦能与这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相协调，并通过这一方式加以解释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说梦者的性渴望在那天夜里被激发起来了，而且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使他对所热爱的姑娘的记忆形成意识，以便使他脱离幻想。可是，这些渴望遭遇到了新的拒绝并转化为焦虑，把学生时代的记忆中一些情景带入梦中。于是，梦中真正潜意识的内容，即他对他曾经熟悉的佐伊的强烈的渴望，都转变成为庞贝的毁灭和格拉迪沃消失这样的显性内容。

我想这理论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应该坚持一点，即如果性渴望寄予梦的未被歪曲的内容，那么至少应该能够发现这种渴望的某个可识别的残片隐藏在变了形的梦的某处。借助于故事后半部分提供的线索，这一点也是可能做到的。当汉诺德第一次遇见想像中的格拉迪沃时，他回忆起了他的梦，祈求幽灵向他梦中见到的那样躺下①。然而，年轻的女士听了这话愤怒地起身，离开了这个怪人，因为她已觉察出他在幻觉的支配下所说的话背后藏有失常的性渴望。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格拉迪沃的解释，那便是在真实的梦中，我们也不一定总能找到一个有关性冲动的更为恰当的解释。

这几条释梦原则在汉诺德第一个梦中的应用，使我们对故事的重要特征有了认识，并把这些主要特征在故事情节中各就各位，那么，作者在创作故事时肯定也运用了这些原则吗？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梦把幻想推向纵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构想，而且符合实际。我们已经听说过［第55页］，在现实的疾病中，妄想的产生常常与梦想联系。一旦我们知道了梦的实质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另外一个谜了。梦与幻想同出一源——产生于被压抑的情感。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梦是正常人的生理性幻觉［参照第58页］。在被压抑的情感强烈到足以冲破阻碍，以幻觉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之前，它很可能已经在睡眠这一更有利的环境下以梦这种具有长期效果的形式，取得了第一个表现的机会。因为在睡眠过程中，随着大脑活动能力的降低，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力量抵抗被压抑的心理力量的斗争有所缓和。正是这种缓和使得做梦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梦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大脑潜意识部分的最佳途径——除非随着欲力精神能量再度贯注清醒生活，梦再次消失，潜意识将占领的心理领地重又让出来。

① “不，我没有听见你说的话，但当你要躺下睡觉时，我朝你喊叫。当时我就站在你身边，你的面庞如大理石般平静而美丽，我现在恳求你，像那天那样再次躺在石阶上。”

第三章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又出现了一个梦，这个梦可能比前一个梦更有吸引力，让我们将其译释出来并嵌入汉诺德大脑中事件发展的链条中去①。可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撇开作者的叙述而马上转入这第二个梦本身，因为当人们想要分析他人的梦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注意力花在梦者的全部经历上，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紧跟故事的线索，一边阅读，一边点评。

有关格拉迪沃死于公元79年庞贝城毁灭时期的新幻觉的形成，并非是第一个梦的惟一结果，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出现这个幻觉之后，汉诺德立即决定去意大利旅行，很快他来到了庞贝。但是在此之前，他遇到了另外一件事。当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时，他觉得他看到街上有一个人步态和体形很像格拉迪沃。他来不及换衣服，赶紧去追，但没有追上，却被过往行人的嘲笑赶回屋里。当他回到房间时，他听见从街对面房子的窗口挂着的鸟笼子里传出金丝雀的鸣叫声。他心底泛起一丝愁绪，感到他也像是一个渴求自由的囚犯，所以他的春日旅游计划刚决定就实施了。

作者已经把汉诺德的这次旅行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并让他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有所了解。汉诺德自然为自己的这次旅行寻找了个科学借口，但这个借口很快就不成立了。毕竟，他明白，“他做这次旅行的冲动来源于一种莫以名状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使得他对遇见的一切人和事都不满，并把他从罗马驱使到那不勒斯，又从那不勒斯赶往庞贝。但是即使在这旅行的最后一站，他的情绪也还是躁动不安。他对蜜月新人的轻浮行为感到恼火，又对庞贝旅馆里的无礼的苍蝇感到愤怒。可是他后来无法再欺骗自己，“他的不快不会仅仅是由他周围的事物所引发，他自身也有些不对头。”他觉得他有点过于激动了，感到“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缺少点什么，可是他说不清到底缺什么。这种恶劣情绪始终跟随着他。”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甚至对他的情妇——科学都有怒气。在正午时分的阳光之下，

① 本句的最后一个短语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前面的段落中，它与《释梦》开头一句相呼应。

他第一次漫步信游庞贝城，“他的全部科学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没有一丝复归的意思。想起她时，只觉得她很遥远，他感到她已变成一个老朽的、干瘪的和枯燥无味的老大妈，一个世上最愚蠢的、最令人讨厌的尤物。”（第55页）

接着，正当他处于这种不满和混乱的心理状态时，他第一次看到走在庞贝城里的格拉迪沃。旅途中一直萦绕着他的一个问题被解决了——有某种东西“第一次进入他的意识：他不知不觉中已来到意大利，旅行至庞贝，在罗马和那不勒斯都不曾多停留，目的是要寻找她的足迹，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足迹’。因为她走路时既有此特殊姿态，一定在灰烬中留下了能够辨认的脚印。”（58［第16页以下］）

既然作者不惜重墨来描述这次旅行，那么它与汉诺德幻觉的关系以及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也一定值得探讨。这次旅行的实施是有原因的，只是旅行者起初没意识到，后来才予以承认。作者用大量词汇将这一原因描述成是“潜意识的”，这一点肯定是取自生活。一个人不必为了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而去忍受妄想带来的痛苦。相反，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隐瞒自己行为的动机，事过之后才意识到，只要有一个多种情绪之间的冲突为这种行为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汉诺德的旅行从一开始就在为他的幻觉服务，并意在把他带到庞贝，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寻找格拉迪沃。他将会回忆起来，在那次梦前和梦后他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有关寻找的事，而那次梦本身就是对格拉迪沃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尽管答案后来被他的意识所窒息。然而，某种我们尚未鉴别出来的力量也在抑制他对幻觉意图的觉知。结果，他对旅行的有意识的原因找不出足够的借口，而且还得从一地到另一地不断更新。作者又进一步给我们制造谜局，先是描述了这个梦，接着又描述在街上发现想像中的格拉迪沃，再往后又写主人公由于听到金丝雀鸣唱而决定去旅行，这一系列事件无缘无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彼此没有内在联系。

对于故事的这一晦涩部分，我们是通过后来佐伊·伯特冈的话才得以理解的。事实上，格拉迪沃的原型就是佐伊小姐本人，汉诺德从他的窗户看见过她在街上走（第89页），并且几乎追上她。如果那天他真的追上了她，由梦提供给他的信息——她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城市——将会由于一次幸运的巧遇而获得有力的证实，进而平息他的心理斗争。可是，那只用歌声将汉诺德送上长途旅行的金丝雀是属于佐伊的，它的笼子就挂在街对面与汉诺德房子斜对面的她的窗户里。（第135页［第30页］）姑娘责怪汉诺德天生会“假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目视活人而不见、遇熟人而不识的本领。他肯定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得到了我们后来才获得的信息。佐伊就在附近的信息（她在街上出现以及她的鸟在距他窗口很近的地方鸣唱）强化了梦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她威胁着他对自身性感的抵制，于是他逃之夭夭。他的旅行是他的情欲在梦中加强之后又获得了新

的抵制力量的表现，这是一种试图逃避他所爱的姑娘的物质存在的行为。在实际意义上，这意味着压抑获得了胜利，正如他先前对妇女和姑娘进行的“步行研究”行为意味着欲望占上风一样。但是，在这一矛盾波动的每一处都保留着结果的妥协性特征：前往庞贝旅行的本意是让他远离活着的佐伊，却使他接近了她的替身格拉迪沃。这次旅行本是对梦中潜在的思想的挑战，但旅行路线却沿着梦的显性内容所指示的方向到了庞贝城。因此，在情欲与抵制力之间每一次新的冲突中，我们却发现幻觉总是胜利。

汉诺德旅行的意图是要逃避他对自己所热爱的且距他如此近的姑娘的不断觉醒的情欲，惟有这种理解才与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的情绪状态相吻合。拒绝情欲这一主导心理流表现为他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的厌恶。他在罗马住的旅店里做的一个短梦是受了那里巧遇的一对德国情侣“埃德温和安吉琳娜”的亲密的刺激。那天晚上他无意中透过薄薄的隔墙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开始对他在第一个梦里的情欲有所醒悟。在新梦中，他又一次来到庞贝，维苏威火山再次喷发，这便与其早期的那个其效果一直延续到旅行期间的梦联结起来。然而，这一次在遭遇危险的人中——不像前一次只有他本人和格拉迪沃——而且还有阿波罗·贝尔维迪(Appollo Belvedere）和卡匹托尔山的维纳斯（the CapitolineVenus)，这无疑是对隔壁房间的情侣形象的嘲讽性提高。阿波罗将维纳斯举起，举出庞贝城，将她放在黑暗中的某个物体上，好像是马车上，因为它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除此之外，对这个梦的解释无须特殊技术。(31)

我早已看出，作者从不将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随意介绍进故事中来。现在，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无性别意识流的证据，这一无性别意识流控制着整个旅行中的汉诺德。当他在庞贝城里长达数小时漫步时，“奇怪的是，他的记忆中从未再现不久前他梦到的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庞贝城毁灭的情景。”(47）只有当他看到格拉迪沃时，才突然回忆起那个梦，并同时意识到他的这次谜一般旅行的幻觉原因。除非我们假设，旅行不是在梦的直接激发下进行的，而是对梦的抵制，是一股拒绝了解梦的神秘意义的心理力量的释放，还有什么办法能解释这种对梦的遗忘，这个把梦与主人公在旅行中的心理状态分隔开来的压抑呢?

可是，另一方面汉诺德并未从战胜情欲的成功中得到喜悦。被压制的心理冲动拥有巨大的能量，足以用不满和抵制对压制者进行报复。他的渴望转变为不安和失望，使他的旅行变得毫无意义。他对服从幻想的意志而进行旅行的原因的认识受到了限制，他与科学的关系，本应在这里激发起他浓厚的兴趣，却受到了干扰。因此，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在逃避爱情之后遇到的危机，精神错乱和心理烦躁，一种我们通常在发病至巅峰状态时遇到的骚动不安，每逢这时两种矛盾的力量，谁也不能绝对压倒谁，不能在中间地带建立起一个活跃的精神王国。可是，在这里作者及时而有效地介入，澄清了混乱，他让格拉迪沃在这个关

键时刻出现并承担起治疗汉诺德幻想的任务。作者借助他拥有的控制他创造的人物的权利，使之走向幸福的归宿。尽管他也让他们遵守必要的法律，但他巧妙安排，使汉诺德为逃避那个姑娘来到庞贝，又安排姑娘也来到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他修正了那年轻人在幻觉引导下做出的愚蠢行为——用他所热爱的活着的姑娘的家交换想像中的她的替身的家。

佐伊·伯特冈以格拉迪沃的面目出现，标志着故事的紧张气氛也达到高峰，我们的兴趣也随之很快转向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着一个幻想的发展，现在我们将目睹它的治愈。或许我们要问，作者向我们提供的这一治愈过程是否是一个纯粹想像的叙述，抑或他是否是依据现实的可能性创作了这个故事。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使我们相信她有治疗汉诺德幻想症的意图。（124［第27页］）可是，她是如何着手进行的？汉诺德建议她像“那天”一样躺下睡觉，惹得她十分恼怒。待她怒气消散后，她于第二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又来到同一地点，开始诱使他说出所有的隐情。正是由于她不了解那些隐情，所以才在前一天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她知道了他的梦，格拉迪沃的塑像以及与她本人也能表演的那种步态。她暂时接受了复活的幽灵的角色，她感到这一角色是他在幻觉中为她设计的。她接受了他无意中带来的死者的花，她为他没有送她玫瑰花而表示遗憾，通过这些举动，她用含蓄的语言向他暗示他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角色（90［第21页］）。

这个聪明非凡的姑娘在得知那年轻人对她的爱情是他幻觉背后的动力时，便决定赢得她童年时的伙伴作为自己的丈夫。然而，我们对她行为的兴趣，这时或许会让位于我们对幻想本身的惊讶。幻想的最后一幕，是死于公元79年的格拉迪沃，现在却能够以正午幽灵的姿态与他进行长达一小时的交谈，谈完后她必须遁入地下或又寻找她的墓穴去。这一心理情节现在要被他的新发现撕破了，这个新发现就是，幽灵穿的是现代社会的鞋子，她不会古希腊文，却懂德文，而公元79年还没有德文呢。如此说来，作者把他的故事称之为“庞贝幻想”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似乎也排除了用医学标准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然而，进一步考察汉诺德的幻觉，我觉得它大部分是可能的。其实幻想的一部分是作者制造的，因为他给故事设计的前提是佐伊在每一个细小之处都与雕塑极为相似。因此，我们要避免把这一前提不可能性转移到它的结果——汉诺德把那姑娘当成格拉迪沃的再生。作者未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性线索，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幻想中的解释的。另外，作者还借助一系列推动和缓和的环境来表现主人公的失常行为，如荒原烈日的照射和维苏威火山上酿出的葡萄酒的醉人魅力。可是，在所有的解释性的和开脱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心，我们的理智就是在它们的状态下才接受某种荒唐的东西的。假如它能满足某些强烈的感情冲动的话，一个令人震惊、同时也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即使是最

有理智的人也会容易而频繁地表现出弱智。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如果某种心理过程与某些潜意识的或被压抑的动机相联系的话，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写到这儿，我很想引用一位哲学家写给我的几句话："我一直在记录我本人经历过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和未加思考的行为，这些错误行为的动机只在事后才发现（这事非常不合逻辑）。你发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你自己都觉得吃惊，但这事却又十分典型。"还须记住，相信神灵、鬼魂，在我们信仰的各种宗教中都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这种信念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仍可见到，就连那些在其他方面很有理智的人，也相信可以把灵性与理智结合起来。一个申明理性和学会怀疑的人，也可能惭愧地发现自己在强烈情感和理念混乱的冲击下，会在一段时间内很容易地返回到唯灵主义的老路上去。我认识一个医生，有一次他失去了一位患有格雷夫斯氏病[1]的女病人。他怀疑可能是自己某次配方不慎，才导致了这位患者的不幸后果。几年后的一天，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诊室。尽管他努力克制自己，但还是忍不住把她认做已经死去的那个人。他的理论只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复生，这毕竟是事实。"他对自己的判断不觉得羞愧，而是恐怖，直到姑娘介绍说她是那个死于该疾病的人的妹妹，她本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临床观察发现，格雷夫斯氏病的患者面部特征十分相似，而同姓同族更使得这两位女患者酷似一人。遇到上述情况的那个医生不是别人，就是我本人。因此，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复生的幻觉，我凭切身感受怀疑其真实性。最后，每一位精神病学家都熟知，在慢性幻想（妄想狂）的严重病例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出现了编制精巧、证据充分的荒谬情节和情景。

在与格拉迪沃第一次会面之后，诺伯特·汉诺德先后在他知道的庞贝两家餐馆中喝了酒，而其他旅游者都在忙于吃主餐。他这么做是为了搞清楚格拉迪沃在哪个旅馆里吃住用餐，"当然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有此怪念头。"但是，也很难说清他的行为还会有别的动机。他们在麦利戈宫第二次会面后的那一天，他经历了各种奇特的、彼此无关联的事件。他在门廊的墙上发现了一条窄缝，格拉迪沃就是从那里消失的。他遇到了一个呆头呆脑的捕蜥蜴者，那人把他当熟人问候。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第三家旅馆"太阳旅馆"，旅馆的主人硬卖给他一个上面长满了绿锈的金属饰针，说是从一个庞贝姑娘的遗骸边发现的。后来，在他住的旅馆里他注意到一对刚住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以为他们是兄妹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所有这些印象都融入了他后来的"毫无意义"的梦中，情节如下：

"在阳光下，格拉迪沃坐在那里。她用草叶编织了个圈套要用它捕捉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真是个好方法，她用它捕到了很多蜥蜴。"（第25页）

---

① 眼球突出的甲状腺肿症。

他还在睡眠中就赶走了这个梦，他冷静地想："这太疯狂了"，并朝各个方向去想以便摆脱这个梦。他做到了，凭借的是一只隐形鸟，"这鸟发出一声笑一般的鸣叫，用嘴衔着蜥蜴飞走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不要把这个梦也解释一番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用其歪曲形态引发该梦的潜在意念来替代梦本身呢？这样做同梦本身一样无意义。梦的这种荒诞性构成了一个观点的主要之处，该观点是，否认梦是完全合理的心理行为，坚持认为梦来源于对大脑成分的无目的刺激。

我们能够将被认为是释梦的常规程序的技术应用于对该梦的解释。这个技术包括对显梦的显性联系不予注意，而是对每一部分内容分别给予重视，从梦者的印象、记忆及自由联想中寻根溯源[1]。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去询问汉诺德本人，我们只好满足于对其印象的考察，并尝试性地站在他的立场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联想。

"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一边捕捉蜥蜴，一边在说话。"在这一段梦境中，前一天的印象有何表现呢？无疑，汉诺德遇见的捕捉蜥蜴的老先生，在梦中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他坐或躺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并跟汉诺德讲了话。而且，梦中格拉迪沃的话就是这位老先生讲话的翻版。"我们的同事艾莫（Eimer）建议的方法真是好，我已经使用过多次并且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第23页）格拉迪沃在梦中使用的词汇大体与之相同，只是："我们的同事艾莫"被无名的"女同事"所取代；另外，动物学家话中的"多次"在梦中被漏掉，句子的顺序也有些变化。因此，前一天的经历经少许变化和歪曲后进入梦中。为何进入梦中的是这一特殊经历？所发生的变化——老先生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以及令人迷惑的"女同事"的介入是什么意思？

在释梦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这样的"在梦中听到的一句话，肯定是梦者在清醒时听到或说过的。"[2] 这条规则似乎在此得到了运用：格拉迪沃说的话是汉诺德前一天听到的老动物学家说话的近似的翻版。释梦过程中的另一条原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取代时，或当两个人合而为一时（例如，在某一情境中出现其中的一个人却表现出了另一个人的特征），这表明两个人是相等的，他们之间有相似性[3]。如果我们将这一原则也运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译文："格拉迪沃像那位老人一样捕捉蜥蜴，她捕捉蜥蜴的技术像他一样熟练。"很难马上断定这个结果有说服力，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谜要解开。在梦中取代那著名的动物学家艾莫的"女同事"，我们该把她与前一天的什么印象

① 参阅《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03～104页。

② 参见《释梦》。

③ 同上书。

相联系呢？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一个“女同事”只能指另外一个姑娘——即汉诺德误认为是陪她哥哥一道旅行的那个令人同情的年轻女子。“她在裙子上别了一朵索兰托玫瑰花，这使他想起了在餐厅里他从自己所在的那个角落看见的一样东西，但他记不起是什么东西了。”（第24页以下）作者的这一段话，让我们有理由把她当做梦中的“女同事”。汉诺德回忆不起来的内容肯定就是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姑娘说的话。她在向他要死者的白花时曾对他说，在春季里人们给幸福的姑娘送玫瑰花。（第21页）可是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求爱的信息。那么，这位幸福的“女同事”在成功地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蜥蜴捕捉活动呢？

第二天，汉诺德遇到了想像中的兄妹在热烈拥抱，于是修正了他原先的误会。他们事实上是一对恋人，并且在度蜜月，这一点在他们意外出现并打断了汉诺德与佐伊的第三次谈话时，我们也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现在愿意假设，尽管汉诺德在清醒时将他们当成兄妹，但无意识中很快就识别出他们的真正关系（第二天就被明确更正），那么，格拉迪沃在梦中说的话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红色的玫瑰花已经变成了爱的象征。汉诺德知道，那对青年男女已经变成了他与格拉迪沃将要成为的那种关系。捕捉蜥蜴意味着捕捉男人。格拉迪沃说的话大意是说：“别管我，我和其他姑娘一样，懂得如何赢得男人。”

但是佐伊的这一深层次意图在梦中为何一定要以老动物学家的话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佐伊获取男人的技巧要以老先生捕捉蜥蜴的技术来表示？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回答。我们已经猜测到，蜥蜴捕捉者不是别人，正是伯特冈：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教授。他也一定认识汉诺德——这才可以解释他为何把他当做熟人向他问候。让我们再来假设，汉诺德潜意识中一下子就认出了教授。“他有个模糊的印象，他好像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看到了捕捉蜥蜴者的脸。”这便可以解释佐伊的深层动机赖以表现的奇怪假象：“她是捕捉蜥蜴者的女儿，她的手艺是从他那儿学得的。”

在梦中，格拉迪沃取代了蜥蜴捕获者，这代表着汉诺德潜意识中所熟悉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女同事”取代了“我们的共同艾莫”使梦表达了汉诺德希望她在追求男人的愿望。这样看来，该梦将前一天的两种经历联结（“凝缩”）成一个情境，使得两个难以进入意识状态的发现得以表现（当然是以一种十分晦涩的方式）。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分析推进一步，可以进一步削减梦的奇特性，可以揭示主人公前一天的其他经历对他的梦的显性内容的影响。

我们可以声称，自己对作者迄今为止所做的解释并不满意，即为什么偏偏是捕蜥蜴那一幕成了梦的核心部分。我们有理由怀疑，梦的其他成分也在发挥它们的作用，就像是显梦中的“蜥蜴”那样。的确，我们本可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记得，汉诺德曾在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发现一条裂缝——一条“宽得足以让一个十分苗条的人”通过的裂缝。得到这一发现后，他便在大白天开始修改

自己的幻想——修改后的幻想是这样的：格拉迪沃从他的视野中消失时，并不是沉入地下，而是将缝隙作为逃往墓穴的通道。在他的潜意识意念中，他也许告诉了自己他已经找到了关于那姑娘奇怪地消失的自然解释。可是，通过窄缝遁入其中的想法难道不会让人想起蜥蜴的行为吗？格拉迪沃本人的行为不正像一个灵活的小蜥蜴？我们认为，在墙上发现一个缝隙决定了为什么会在显梦的内容中出现一只蜥蜴。梦中关于蜥蜴的情景反映了梦者前一天看见蜥蜴的印象，以及与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相遇的印象。

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试着来寻找一个迄今尚未被发现的前一天的经历被反映到梦中的象征——发现第三家旅馆，反映前一天经历中尚未被作者利用的情节。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这一片段，把许多事情与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它与梦的形成没有关系，定然吃惊匪小。汉诺德走向这家旅店，由于它地处偏僻又距火车站较远，所以他对其并不熟悉。他买了一瓶苏打水来冷却他沸腾的热血。店主人不失时机地向他展示他的古玩。他向他出示了一个饰针，谎称是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庞贝姑娘身边发现的，那姑娘当时正被她的恋人紧紧地拥抱着。汉诺德以往从来不相信这类老掉牙的故事，现在他却在一种无名的力量的驱使下相信这一感人故事的真实性和这件小物品出土的可靠性。他买下了这件饰针（brooch），带着它离开了旅店。正当他向外走的时候，他看到在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一枝白色的常春花在微微摇曳。这一情景使他确认他刚得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现在开始确信，那只长满绿锈的饰针是属于格拉迪沃的，而且她就是那个躺在她恋人的怀里死去的姑娘。他心生一丝妒意，但很快又把它按压下去。他决定第二天把饰针给格拉迪沃本人看一下以验证他的猜测。无可否认，这是一段新的奇特的幻想，可我们能相信在那天晚上他的梦中没留下一丝踪影吗？

解释一下这段妄想新插曲的根源并寻找被新的幻觉所取代的新的潜意识发现，肯定是有必要的。这一幻觉是在“太阳旅馆”老板的影响下出现的。汉诺德在他面前表现得非常轻信，仿佛受到了对方的催眠性暗示一般。老板给他看了一枚别在衣服上的金属饰针，说它是真品，属于那个在恋人怀中死去的姑娘。汉诺德完全有能力怀疑故事的可信性和饰针的真实性，但他却立刻被说服买下了这件很值得怀疑的古文物。他的这种行为令人费解，也没有迹象表明老板的人格能够向我们提供答案。另外，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谜，这两个谜之间相互可以解答。就在离开旅店的时候，他看见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插着一枝常春花，便把它看做是对金属饰针真实性的确认。这是怎么回事？幸运的是，这最后一点很容易解释。无疑，白色的花是他中午送给格拉迪沃的，显然，透过旅馆的窗户看到白花便证实了某件事。这被证实的事情不是金属饰针，而是别的什么事情，这件事在他发现太阳旅馆后已经不言自明了。早在前一天他就到处走动，好像是在庞贝的两家旅馆中寻找那个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人。现在，既然他无意中遇见了第三家旅馆，

他一定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说："这一定就是她住的地方了!"并且，边往外走边说："是的，肯定是这样！那就是我送给她的常春花！那一定是她的窗户了!"这便是被新幻觉所替代的新发现，它不能进入意识，因为它的潜在前提——格拉迪沃是他曾经熟悉的现在仍活着的人不能进入意识。

可是，新幻觉对新发现的替代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替代的原理是与发现相随的信任感，这是能够持续和保留的，发现本身却不允许进入意识，而被通过联想与之相联的另外一种意念内容所替代。这样，信任感便与事实上和它无关的内容相联系了，并以妄想的形式赢得了并不适合于它的认可。汉诺德确信格拉迪沃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将这种感觉移植到他在这所房子所获得的其他印象上去。这导致他轻信旅店店主的话，轻信金属饰针的来源可靠，轻信发现一对情侣拥抱在一起死去的故事的真实性——只是通过他把在旅店里听到的与格拉迪沃相联系。早已潜伏在他心里的忌妒被这一材料牵动了，结果产生了格拉迪沃就是那个死在她情侣怀中的姑娘，他买的那枚饰针属于她的幻觉（虽然这与他的第一个梦相矛盾）。

我们会看到，他与格拉迪沃的谈话及她向他求爱的暗示（她用花进行表达），已经在汉诺德身上引起了重要的变化。男性欲望的特征——力比多的构成要素——在他身上被唤醒。虽然它们并没有摈弃意识借口的伪装，可是，格拉迪沃"身体的本质"问题，整整纠缠了他一天［英文版第22、23页］。这不能不说是年轻男人对女人身体充满性的好奇，尽管它被有关格拉迪沃是生是死的科学问题所伪装。汉诺德的忌妒更是他不断强化的爱的迹象。在第二天他们谈话的一开始他便表示了这种忌妒，并借助某种新的借口，进而触摸了姑娘的身体，就像很久以前拍打她那样。

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像作者那样构造幻觉的方法是否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或者这种方法是否可能？根据已知的医学知识，我们只能说这的确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可能是惟一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幻觉可以得到明确无疑的判断，这是幻想的临床表现之一。如果一个病人对他的幻觉深信不疑，这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判断力，也不是由幻觉中的假象所致。相反，在每一个幻觉中都隐含着一点真事[①]，有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才是病人执著于幻想的真正根源。由此可见，病人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一真实的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着。如果最后它能进入意识的话，那时它已被扭曲，与之伴随的信任感也被过分强化。好像是为了补偿一样，这时它依附的是被压抑着的真相歪曲后的替代物，让人无从对它再做任何评判。这时，信念被从潜意识的事实移到有意识的失误上面并作为转移的

① 弗洛伊德在其作品的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种观点。例如《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第七章第三节，《摩西与一神教》(1939a) 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节里都出现过。

结果固定在那里。汉诺德因第一个梦而产生的幻觉也是这类转移的相似的例子，尽管不完全一致。的确，这里所描述的从幻想中寻找定论的方法，与在正常情况下，即压抑不成图像时信念产生的方法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们能让我们的信念执着于某种真理与谬误混杂的思想内容，并让这种信念从前者延伸至后者。结果，它从事实延到谬误，并保护后者免受应得的批评，虽然不像在妄想中那样不可逆转。在正常心理状态下，联系牢固——也可以说是“会发生影响”——也能替代真正的价值。

现在，我将回到这个梦上来，并指出其中一个小的但并非枯燥的特征，它在两个异常活跃的原因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格拉迪沃曾经在白色的常春花和红色的玫瑰花之间进行了一种比较。在太阳旅馆的窗户里又一次看见常春花成为支持汉诺德潜意识发现的一条重要证据，并在新的幻觉中表现出来。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那个令人同情的姑娘衣服上的红玫瑰帮助汉诺德在潜意识中对她与她伙伴的关系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他能够让她作为“女同事”出现在梦中。

可是，有人会问，在梦的显性内容中，我们是否找到某种迹象显示和替代汉诺德的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汉诺德的新幻觉取代了这一新发现，即发现格拉迪沃与她父亲一起住在庞贝城中较隐蔽的第三家旅店——太阳旅店。然而，这一切都在梦里，并且没有太多的歪曲。我迟迟不愿意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连那些耐着性子随我分析到此者也会开始强烈反对我试图做任何解释。我再重复一遍，汉诺德的发现在梦中已全部显示出来了，但是都被精明地隐藏起来，以致肯定会被忽略。它被隐藏在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后面。“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已经准确地将这一地点与汉诺德遇到她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的地方联系起来。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是指在“太阳”里——即格拉迪沃住在太阳旅馆里（旅馆的全名为：Albergodel sole）？“某个地方”，这与跟她父亲相遇并无关系，听起来似乎有些躲躲闪闪，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格拉迪沃所在地点的准确信息吗？依我自己在别处做梦的真实体验来看，我完全可以肯定应该这样理解这模棱两可的文字。可是，如果不是作者在此为我提供了强有力的援助的话，我是不敢真的把这一解释性文字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的。第二天，当那姑娘看见金属饰针时，作者让她嘴里说出了同样的文字游戏：“你是在阳光下发现它的吗？或许那地方专门制作这类东西。”（第26页）由于汉诺德没有理解她所说的话，她便解释说她指的是太阳旅馆（他们管它叫“sole”），在那里她已经看到过这件假古董。

现在，让我们大胆地将汉诺德的“极度无意义”的梦用它背后的截然相反的潜意识思想来替代。这些思想大概是这样的：“她和她父亲一起住在‘太阳旅馆’里。她为何要与我玩这个游戏？她是想要取笑我吗？或者，她是否可能爱上了我，想让我做她的丈夫？”无疑，当他还睡梦未醒之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答案，把这

最后一种可能性贬斥为“纯属疯话”。这一否定显然是与显梦相违背的。

细心的读者现在要问，在此插入格拉迪沃嘲笑汉诺德这一情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供根据）？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释梦》中已经给出了。它解释说如果在梦中发生了嘲笑、讥讽或恶魔的顶撞，它在显梦中表现为无意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梦[①]。因此，这种无意义并非意指心理活动的停顿，它是梦的形成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正如以往多次遇到困难时那样，作者又一次来帮助我们了。这个无意义的梦有一个简短的尾声，其中描写了一只鸟发出了一声笑声样的鸣叫，并用它的嘴把蜥蜴衔走了。可是，当格拉迪沃消失之后，汉诺德也听到过一声相似的笑声样的喊叫［第22页］。实际上，它来自佐伊，她用这笑声来驱赶她地狱角色的无望和悲惨。格拉迪沃的确曾经嘲笑过他，但是衔走蜥蜴的梦的意象可能是早期梦的重现。在那个梦中，阿波罗·贝尔维迪带走了卡匹托尔·维纳斯。

或许，仍有一些读者会认为用求爱的含义来解释捕捉蜥蜴的情景理由不够充分。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她承认汉诺德对她的怀疑，并对她的朋友说自己在庞贝一定会“挖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她介入了考古学的领地，正像他用捕捉蜥蜴的比喻渗入了动物学的领域一样。他们好像彼此都在努力接近对方，每一方都试着表现对方的特征。

这样，我们似乎也完成了对第二个梦的解释工作。这两次解释都依赖如下这个前提：梦者在潜意识思维中知道他在意识中所遗忘的内容。在潜意识中他判断准确，而在幻觉状态下，他却理解错误。在论述的过程中，无疑我们不得不做出几个论断，读者由于对它们不熟悉也许会感到有些不解。或许我们经常会引起读者的疑虑，怀疑我们佯称是作者的意见，事实上却是我们自己的。我很想尽我所能消除这一疑虑，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很愿意更详细地深入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里——我指的是模棱两可措词的使用，诸如：“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

凡读《格拉迪沃》的人都会注意到，作者多次让他的两个主人公的嘴里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在汉诺德嘴里，这些含糊的本质并非迷惑人，只是女主人公格拉迪沃对它们的第二个意义心领神会。例如，在回答她的第一个问题时，他说道：“我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的。”［第19页］佐伊还是不解，只好再问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以前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在第二次谈话时，当他告诉他一下子就认出她时［第21页］，她一时对他起了疑心，她不禁把这些话理解为（就汉诺德的无意识而言是正确的）他们的相识始于他们的童年，然而，他对自己说的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全然不知，只是根据他的幻觉来加以解释。另一方面，与汉诺德的妄想相比，姑娘所说的话表现出她的大脑十分清醒，她说的话反映出她有意在

① 《释梦》第五章。

制造含糊。其中的一个意义与汉诺德的幻觉是相一致的，所以能够进入他的意识领域，但是其他的意义都超出了妄想之外，通常只让我们得到代表幻觉的潜意识事实。这是机智精巧的安排的结果，它能用相同的词汇同时表达幻觉和事实。

佐伊在向她的朋友解释自己庞贝之行的话的同时，也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打扰（英文版第 27 页以下），这番话就充满了这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实际上，这是由作者编造出来的一番讲话，更多地是针对读者而不是佐伊的新婚的“同事”。在她与汉诺德的谈话中使用的模棱两可的技巧通常是佐伊对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出现的象征手法的借用——压抑与埋葬，庞贝与童年之间的对等。因此，一方面她能够在她的谈话中保持汉诺德在妄想中强加给她的角色；另一方面她还能够与现实环境接触，并在汉诺德的潜意识中唤醒他对事情真相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死亡了。”（90［英文版第 21 页］）“对我来说，你应该送遗忘之花。”（出处同上）在这些话中，已表现出她后来在与他的谈话中所发出的责备的前兆。在后来的责备中她把他比做始祖鸟［32］“某人为了复活而去死，无疑只有考古学家才会这么做。”［37］她最后这一番话是在他的幻觉被澄清之后说出的，仿佛要对她的模棱两可的话提供一个解释。可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中，她又紧接着用了一次象征手法“我感觉我们以前似乎像这样共同用过餐，大约在二千年前，难道你不记得了？”（第 118 页［英文版第 26 页］）这里，佐伊用历史的过去替代童年以便唤醒汉诺德的记忆，这种用意表现得明白无误。

可是，《格拉迪沃》一书中为何对模棱两可的语言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偏好呢？我们觉得这件事绝非偶然，而是该故事所设前提的必然结果。它与妄想的双重决定异曲同工，语言本身也成了症状，产生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妥协。显然，疾病的这种双重原因在言语上比在行为上更容易被觉察。由于言语材料具有柔韧的特点，当言语所包含的两种意图都可以用同样的词汇表达出来时，我们面前便出现了所谓的“模棱两可”。

在对妄想症或类似精神错乱进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的过程中，可见此模棱两可的语言出自病人之口，医生把它视为持续时间最短的新病症。有时医生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使用此种语言。这样一来，医生本想传达给病人意识理解的意义，却被病人用潜意识的方式理解了。根据经验我知道，模棱两可的这种作用很容易引起反应迟钝的人的强烈反感，并造成严重的误解。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这位作者在他的创作中用一定的篇幅对发生在梦和妄想中的典型特征进行描述，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章

佐伊以医生的姿态出现，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引起了我们新的兴趣。我们很想知道，她在汉诺德身上实施的那种治疗方法是否可以想像，是否甚至可能，以及作者对幻觉消失的条件所持的观点是否与他对妄想产生的条件所持的观点一样正确。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疑会遇到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否认作者所提供的病例具有如此普遍的兴趣，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在汉诺德的幻想对象：想像中的格拉迪沃，向他表明他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对他所有感到疑惑的事情进行了最自然的解释——例如，她是如何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汉诺德别无选择只得放弃他的幻觉。这很可能成为故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姑娘既然顺便向他表示了爱，作者为了满足女性读者的愿望，让他的故事以美满婚姻结束，从而让故事增色不少。然而，相反的意见可能继续说，与故事主题更贴近也更有可能性的结局应该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在他的错误被指出以后，友好地道一声谢，然后离开了那位小姐，并提出他拒绝她的爱情的理由是，他感兴趣的是用青铜或大理石制成的古董女人，而且最好是真品，因为他照样可以去抚摸她们，可是要他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的姑娘，他却不知所措。这种意见会坚持认为，作者把一个爱情故事随意地贴到了他的考古幻想故事上。

在否定这一观点的可能性的同时，我们首先注意到汉诺德身上变化的开始，并非仅仅表现在他放弃幻想上。与此同时，或者就在他的幻想消退之前，他身体里一股对爱的明确的渴望已被唤醒。其结果自然是，他向那个他从幻想中摆脱出来的姑娘求爱。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在他被压抑的性欲导致他做了第一个梦后，他曾借用一系列的借口和伪装在幻想中想了解她的“身体本质”，对她与男情人拥抱产生忌妒，同时还涌起一股强烈的男性操纵本能。作为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据，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他与格拉迪沃第二次会面后的那天晚上，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第一次打动了他的恻隐之心，虽然他仍旧囿于先前对那些新婚度蜜月的情侣们的恐惧，没有认出该女子是位新婚娘子。然而，第二天早晨，他偶然目睹了那姑娘与被他当成是她兄弟的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吓得他赶紧退了回来，仿佛打扰了某种神圣的行为。他对“爱德温与安吉琳娜”的嘲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对生

活中色情的一面心生崇敬。

因此，作者将幻想的消除与对爱情的渴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为求爱这一必然结果做了铺垫。他比评论家们更了解幻觉的基本特征。他知道，爱欲的某种成分与抵制爱欲的某种成分相结合，形成幻想。他让那位医治汉诺德疾病的姑娘对汉诺德幻想中的东西十分敏感，并乐于接受。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才使得她决定致力于对他的治疗；只因她确定了自己被他所爱，她才肯承认对他的爱。她的治疗措施包含从外部还给他从内部无法实现的被压抑的记忆。但是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治疗者没有考虑患者的感情，如果她对他的幻想的最终解释不是："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你爱我"的话，那么治疗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作者让佐伊用做治疗她童年朋友的幻想症的方法，与布洛伊尔医生和我本人于 1895 年介绍到医学界的治疗方法十分相似——不，是本质上的完全一致。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这种疗法的完善工作。这种治疗方法，布洛伊尔首先为其取名为"宣泄法"而我则喜欢称之为"分析法"用于治疗患类似于汉诺德幻想性精神紊乱的病人。它包括把因某种情绪被压抑而生病的患者的潜意识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引入意识中来，正如格拉迪沃对汉诺德心中被压抑的他们童年关系的记忆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格拉迪沃比医生更易于完成这一任务：在好几个方面，她都是做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医生对病人的经历一无所知，对病人身上发生作用的潜意识东西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必须动用一种复杂的技术辅助他工作。他必须学会从与病人的有意识交往和沟通中，引导出其潜意识究竟是什么东西，学会发现隐藏在有意识的言语和行为背后的以假象出现的潜意识内容。然后，他才能像汉诺德在故事结尾时，把"格拉迪沃"重又解释为"伯特冈"一样，解开谜团。当根源被找到后，精神错乱也就消失了。"分析"，同时也就是治疗。但是，格拉迪沃的治疗程序与分析心理治疗法的相似之处并不局限于这两点上——调动被压抑的内容进入意识状态及以解释为治疗手段。它还延伸至被证明是整个变化的基础的手段——感情的唤起。类似于汉诺德妄想性错乱，在学术界我们习惯称之为"精神性神经症"。这种病每一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本能生活部分被压抑，或者我们稳妥一点说，是性本能部分被压抑。在每一次试图把潜意识被压抑的病因导入意识的努力中，相关的本能因素便被唤起与压抑的力量产生新的冲突，只是在最后的结果上与他们妥协，并常伴有强烈的反抗。如果我们将众多的性本能因素都归在"爱"的名目下，那么，这一治疗过程是在爱的回归中完成的。这种回归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被治疗的症状就是"压抑"与"返压抑"[1] 的早期冲突的沉淀，它们只能在同一激情的新的潮汐的冲击下才

---

[1] "返压抑"或译"压抑恢复"（return of the repressed），精神分析术语，指被压抑观念又恢复或回归到意识域。——中译者

能得到稀释和洗刷。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都是努力解放被压抑的爱的尝试，这种被压抑的爱在患者生病时仅能从症状中找到一个狭小的发泄口。的确，这种治疗方法和《格拉迪沃》的作者所描述治疗过程的一致性，在下面这个事实上达到高潮，那就是精神分析法唤起的激情，不管是爱还是恨，总是选择医生作为它的宣泄对象。

恰恰是从这里产生了两种疗法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又使格拉迪沃这个例子成为医学技术无法达到的一个理想范例。格拉迪沃能够对患者从潜意识步入意识状态的爱情做出回报，但是医生却做不到这一点。格拉迪沃本人成为早期被压抑的爱的对象，她立刻成为被她解放的爱情的理想目标。医生曾是个陌生人，他必须努力在治疗之后再次成为陌生人。他常常感到为难，不知该怎样劝说被他治愈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已恢复的爱的能力去爱一个人。对照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以爱治病的例子来指出医生在常规行医时所采用的手段和类似的技巧——这些已非我们这里的任务范围。

现在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避开了。[参照第 43 和 54 页）我们对压抑、对幻想和类似的精神错乱的起因、对梦的形成和解释、对情欲生活所起的作用、对治疗精神错乱所使用的方法的观点，与普通的科学观点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那些自信的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有什么相同了。如果使得作者构建了这个我们将其当做一个真实的病史进行分析的"幻想"的洞察力也属于知识的范畴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奇地去了解一下这一知识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的行业里有一个人——我在文章开始时提到过，他对《格拉迪沃》中的梦以及它们的诠释很感兴趣［参照注脚第 9 页］——他向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即他本人是否懂得他书中所包括的这些科学的理论。作者的回答，正如人们预料的，是否定的，并且有些粗暴。他说，他的想像孕育了《格拉迪沃》，他很喜爱它。如果有人不喜欢它，可以不去读它。他很自信，他的作品实际上多么地受读者喜爱。

作者的否认很可能还不是这一点。他可能全盘否认了我们指出的他所遵循的有关规则，他还可能否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觉察到的所有创作的目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了。或许，我们自编了一套可笑的解释，赋予一部单纯的艺术作品作者本人尚且不知的目的。这样也就再次揭示了：找到一个人正在寻找的东西、洞察一个人头脑里的想法是多么的容易——在文学史上再奇特的例子都有可能找到。现在，请每一位读者都来决定他是否能够接受这一解释。当然，我们自己持另外一种观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观点是，作者可能对这些规则和目的一无所知，所以他才那么坚决地否认。然而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所需的科学知识应有尽有。或许，我们各自用不

同的方法，从相同的渠道获得知识，研究同一课题。我们俩的结果的一致性，似乎表明我们俩的研究都是正确的。我们的研究程序包括对别人的异常心理过程作有意识的观察，以便能够引导出并确定它们的规律。显然，作者的操作程序与我们不同。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头脑中的潜意识上，他倾听它的可能性发展趋势并给予它们以艺术的表达，而不是用有意识的批评来压制它们。因此，他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了我们从别人身上获得的认识——潜意识活动遵循的规律。但他无须陈述这些规律，甚至也不必清晰地意识到。由于他的智力宽容，它们被融入他的创作之中。我们是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发现这些规律的，正如我们通过真实的病例发现这些规律一样。可是，我们似乎必须面对如下结论：或许作家和医生两者都以同样的方式错误地理解了潜意识，或许双方都理解正确了。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个结论，我们很有必要运用医学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詹森在《格拉迪沃》中描述的妄想和梦的形成与治疗。

我们似乎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有心的读者会提醒我们，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断言梦代表着欲实现的愿望，但我们未曾为此提供证据。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上述篇幅中所描述的可以说明用“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一简单模式来涵盖我们对所有梦的解释，是多么牵强附会。不过，这一断言是成立的，就《格拉迪沃》中的梦而言又是容易证明的。潜隐的梦念——我们现在知道它们的意思了，其类型可能是最多的、最杂的。在《格拉迪沃》中，这些梦中的想法是“日间”的残迹，是清醒生命中心理活动中未被注意和未加处理而遗留下来的思想。但是，若要把它们发展成为梦，还需要得到愿望（一般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合作。这是形成梦的动力，而“日间”的残迹则是梦的材料。在诺伯特·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两个愿望互相竞争，争当这个梦的动力。其中一个愿望其实是可以进人意识状态的，而另一个则属于潜意识，是从压抑中逃出来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自己在公元79年那场大灾难中作为目击者而亲临现场，这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一愿望不是作为一个梦而是真正实现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考古学家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另一个愿望，梦的另一个制造者，带有情欲的色彩：这个愿望可以粗鲁、不十分完整地表述为当他所热爱的姑娘躺下睡觉时，他希望在她身边。正是对这种愿望的排斥使其变成了一个焦虑梦。构成第二个梦的动力的愿望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它的变形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描述为带有情欲色彩的。这种愿望是，被他所热爱的姑娘俘虏、接受她的愿望、屈从于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把它称为潜藏于捕捉蜥蜴背景之后的愿望——事实上，这是一种被动的、受虐的愿望。第三天，做梦者打了那姑娘，好像他是受相反的情欲意念所驱使……。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打住，否则，我们就会真的忘记汉诺德和格拉迪沃仅仅是作者想像的产物了。

作家与白日梦

(*1908*)

孙　庆　民
乔　元　松　译
索　宇　环　校
邵　迎　生　修订

按 语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他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为幻想动力的愿望则贯彻于始终；作家的写作技巧只在于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供纯形式的乐趣。此文对研究弗洛伊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这些门外汉总是急切地想了解——正如那位向阿里奥斯托[①]提出类似问题的红衣主教一样——不可思议的作家们是从什么源头发掘了创作素材，又是如何加工组织这些素材，以至于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心中激发起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料想的情感。假如我们向作家讨教，他本人也难以说清，即使解释了也不会令我们满意。正因为如此，便使我们对此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即使我们都彻底了解了作家是怎样选取素材的，了解创造想像形式的艺术的真谛，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把自己修炼成为作家。

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我们自己身上，或在与我们相似的其他人身上，发现一种与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能动性，那该多么令人欣慰。检视这种能动性将使我们有希望对作家的创作做出解释。的确，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有的。作家自己毕竟也喜欢缩短他们与常人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一再鼓励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位诗人。只要有人，就有诗人。

我们是否该到童年时代去寻觅富于想像力的能动性的最初轨迹呢？孩子最喜欢和最投入的活动是游戏及玩耍（games）。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孩子在游戏时的行为表现俨然像一位作家吗？他在游戏中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是在用自己喜爱的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他那个世界里的事物。如果认为他对待他的那个世界的态度不够严肃，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在游戏时非常认真，并且在上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玩耍相对应的并不是严肃认真，而是实实在在。尽管他全神贯注于游戏世界，却仍能很好地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他喜欢把想像中的物体和情境与现实世界中有形的、看得见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区别孩子的“游戏”与“幻想”（phantasying）的根本依据。

作家与玩耍中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创造了一个他很当真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他以极大的热情创造的世界——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其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语言保留了孩子们做的游戏和诗歌创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德语中）这种富有想像力的创作形式被称之为“Spiel”（游戏），这种创作形式与现实世界里的事物相联系，并具备表现能力。其作品称做“Lustspiel”或“Trauerspied”（“喜剧”或者“悲剧”，也可称做“快乐游戏”或“伤感游戏”），那些从事表演的人称做“Schauspieler”（“演员”也可称做“做游戏人”）。无论如何，作家幻想世界的非真实性对他的艺术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虚构的剧作却能够带来娱乐。许

---

① 红衣主教伊波里托·德埃斯特（Ippolito d'Este）是阿里奥斯托的第一个保护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奥兰多》就是献给他的。诗人得到的惟一报答是红衣主教提出的问题：“罗多维柯，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多故事？”

多感人的事情，它们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伤的，但在作家的作品上演之际，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乐源泉。

我们在现实性与游戏间的对比上还要多花一些时间，这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当孩子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在经过几十年的劳作之后，当他以严肃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时，他或许在某一天会发现，自己再次处于消除了戏剧与现实之间差别的心理情境（mental situation）之中。

作为成年人，他能够回想起童年时代游戏时所怀有的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如果把今天显然严肃的工作当成童年时代的游戏，他便可以抛却现实生活强加给的过于沉重的负担，从而通过幽默的方式得到大量的快乐①。

由此可见，人们长大后便停止了游戏，同时似乎也放弃了从游戏中所获得的快乐的受益。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对一个人来说，让他放弃自己曾体验过的快乐，那几乎比登天还难。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成了替代物或代用品。同样，孩子长大后停止游戏时，除去和真实事物的联系之外，他什么也没抛弃。替代游戏的是幻想。他在空中建造楼阁，去创造所谓的“白日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生活中的某时某刻构造过幻想。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因而，它的重要性也就未被充分地认识到。

观察人们的幻想比观察儿童的游戏困难得多。的确，一个孩子要么独自游戏，要么为做游戏而与其他孩子一起构成一个封闭的精神系统。尽管在大人面前他们可能不做游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从不在大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游戏。与孩子相反，成年人羞于表现自己的幻想，并且对其他人隐瞒自己的幻想。他珍爱自己的幻想恰如对待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通常，他宁愿承认自己的不轨行为和过失，也不愿把自己的幻想向任何人透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以为只有他才会创造这样的幻想，岂不知在别人那里这种创造也相当普遍。做游戏的人和创造幻想的人表现在行为上的这种差异，是由于两种活动动机的不同所造成的。然而这两种动机却是互相依附的。

孩子的游戏由其愿望所决定：事实上也是他惟一的愿望 — 这个愿望在他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就是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做“已经长大”的游戏，并在游戏中模仿他所知道的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他不必掩饰这个愿望。而在成年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他不能再继续游戏，不能再继续幻想了，而应该在真实世界中扮演他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把会引起他幻想的那些愿望隐藏起来至关重要。如此一来，他就为那些孩子气的、不被允许的

① 参阅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七章第七节。

幻想感到羞愧了。

然而，你们或许会问，既然人们把他们的幻想搞得如此神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多呢？事情是这样的，人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灵魂里有一位严厉的女神——必然性——让他们讲述他们经受的苦难，讲述给他们带来幸福①的东西。他们是些神经性疾病（nervous illness）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幻想讲出来，告诉医生，希望医生采用心理疗法（mental treatment）治愈他们的疾病。这是我们的最好的信息来源，我们据此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假设。如果病人对我们守口如瓶，那么，我们从健康人的口中是不可能有所听闻的。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这些充当动力的愿望因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但它们又很自然地分成两大主要类别：要么是野心的愿望，这类愿望可抬高幻想者的地位；要么是性的愿望。在年轻的女子身上，性的愿望几乎总是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她们的野心通常被性欲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的男子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和性的愿望非常明显地并驾齐驱。但是，我们不准备强调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我们更愿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经常结合在一块。正像在许多教堂祭坛后壁的装饰画中，捐献者的形象可在画面的某个角落里看到，在大多数野心幻想中，我们也会在这儿或那儿的角落里发现一位女子，为了她，幻想的创造者表演了他的全部英雄行为，并把所有的胜利果实堆放在她的脚下。大家看得出，在这样的幻想中，的确存在着想掩饰幻想的非常强烈的动机；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只允许有最低限度的性欲需求，青年男子必须学会压抑对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这种过分关注是他在童年时代受宠爱的日子里养成的——以便在其他人也有着同样强烈要求的人际社会中找到可以适应的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想像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已经定型或不可改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随着幻想者对生活理解的变换而变换，随着幻想者处境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从每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中去接受被称为“日戳”（date-mark）的印象。一般来说，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徘徊在三种时间之间——我们的想像经历的三

① 这是指歌德的剧本《托夸多·诺索》最后一场中主角兼诗人所吟诵的著名诗句：

当人类在痛苦中沉默，

神让我讲述我的苦痛。

种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关联，与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可以引起主体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而退回到对早年经历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在这个时期该重大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在幻想中便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白日梦或者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一起了，愿望这根轴线贯穿其中。

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就可以把我所说的这些问题解释得很清楚。我们以一个贫穷孤儿为例，你已经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他也许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在去看雇主的路上，他可能沉湎于与产生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白日梦之中。他幻想的事情或许是这类事情：他找到了工作，并且得到新雇主对他的器重，自己成为企业里面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人物，进而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与这家的年轻而又妩媚迷人的女儿结了婚。随后又成为企业的董事，初始是作为雇主的合股人，再后就成了他的继承人。在这种幻想中，白日梦者重新获得他在幸福的童年时曾拥有的东西——庇护他的家庭，疼爱他的双亲以及他最初一见钟情的妙龄佳人。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到，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

关于幻想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但我将尽可能扼要地说明其中的几点。如果幻想变得过于丰富多彩、强烈无比的话，那么神经症和精神病就处于待发作状态。另外，幻想是我们的病人经常抱怨的苦恼病状的直接心理预兆。它像一条宽敞的岔道伸向病理学范畴。

在此我不能略而不谈幻想与梦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夜里所做的梦就属上述幻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梦之诠释来证实①。语言早就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对梦的本质问题下了定论，把漫无边际的幻想创造命名为“白日梦”。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梦的意义总觉得模糊不清的话，那是因为夜间的环境使我们产生了一些令自己感到羞愧的愿望，而这些愿望我们又必须对自己隐瞒，所以它们受到压抑，被压入潜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得以一种极其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科学工作已能成功地解释造成梦变形的因素时，就不难看出夜间的梦与白日梦——即我们非常了解的幻想一样，都是愿望的满足。

关于幻想的问题就谈这些。现在来谈一下作家。我们真可以将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② 做一比较，将他的创作与白日梦做一比较吗？这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两类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

① 参阅弗洛伊德《释梦》（1900a）。

② ［Der Träumer am hellichten Ta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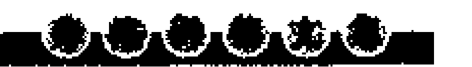
和悲剧作家那样接收现成题材的作家以及似乎是由自己选择题材创作的作家。我们在进行比较时，将主要针对后一类作家。不去选择那些批评家最为推崇的作家，而选择那些名气虽不十分大，但却拥有最广大、最热中的男女读者的长篇小说、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所有这些作者的小说作品中，有一个特点我们肯定能看得出：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作者似乎将他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祇的庇护下，假如在小说的某一章的结尾，主角遭到遗弃，并受伤流血，神志昏迷，那么可以肯定，在下一章的开头我们就会读到他正得到精心的治疗护理，逐渐恢复健康；如果第一卷以他乘的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而下沉为结尾，那么我还可以肯定，在第二卷的开头就会读到他奇迹般地获救——没有获救这个情节，小说将无法写下去。读者带着安全感跟随主角走过他那危险的历程，这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位英雄跳进水中去拯救一个落水者的感觉，或者是他为了对敌群进行猛烈攻击而使自己的身躯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正英雄的感觉，我们一位最优秀的作家曾用一句无比精彩的话表达过："我不会出事！"①而正是通过这种刀枪不入、英雄不死的启示性特征，我们似乎可以立即认出每场白日梦和每篇小说里的主角如出一辙②，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自我"。

这些自我中心小说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其类似性。小说中的所有女人总是爱上了男主角，这一点，很难说是对现实的描写。但是，作为白日梦必要的构成因素却很容易被理解。同样，作者根本无视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而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整齐地分成好人或坏人。"好人"是自我的助手，而"坏人"则成为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这个自我就是故事的主角。

我们十分清楚，许多富于想像的作品和天真的白日梦模式相距甚远，但我仍不能放弃这种推测：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不间断的、一系列的过渡事件与白日梦相联系。我注意到，被人们称为"心理小说"的作品中只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作者对其进行内心描写的主角。作者好像坐在主人公的脑袋里，从外部来观察其他人物。毋庸置疑，一般来说心理小说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现代作家倾向于凭借自我观察，将他的主人公分裂成许多部分自我，结果是作家将自己心理生活中相冲突的几个倾向在几个主角身上体现出来。另外某些小说，或许可称之为"怪诞"（eccentric）小说，似乎与白日梦的类型形成非

① "Es Kann dir nix g'schehen!" 这句话出自弗洛伊德喜爱的维也纳剧作家安泽格鲁伯（Anzengruber）之口。参阅《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标准版，第14卷，第296页。

② 参阅《论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91页。



常特殊的对比。在这些小说里，被作为主角介绍给读者的人物仅仅扮演着一个很小的角色，他犹如一位旁观者静观其他人的活动以及遭受的痛苦。左拉的许多后期作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必须指出，通过对创造性的作家和在某些方面背离所谓规范的作家做个人精神分析，我们发现白日梦具有与"怪诞"小说类似的特点，即"自我"满足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如果我们想让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与白日梦者、诗歌创作与白日梦之间的比较有某种价值的话，就必须先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其有效性。譬如，我们应试着对这些作者作品运用我们在前面论及的关于幻想、三个时间和贯穿三个时间的愿望之间的关系命题，借助于此我们还可以试着研究一下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无人知晓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设想什么样的预期成果，而且人们常常把这种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借助于我们对幻想研究的结果，我们应该预料以下的事态：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作品本身能够显示出近期的诱发事件和旧时的记忆这些因素①。

不要被这个程式的复杂性吓倒。我猜想事实会证明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然而，它或许包含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第一步。根据我所做的一些实验，我相信对作品进行研究不会是劳而无功的。你将不会忘记，对于作家生活中童年时代的记忆的强调——这种强调或许令人不明所以——归根到底来自于这种假设：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回落到我们应该认识的那类富有想像力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是独创性的写作，而是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的改造加工。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也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表现在素材的遴选以及素材的变化上，这种变化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不过就现存的素材来说，它来自流行的神话、传说及童话故事的宝库。对诸如此类民间心理构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极有可能的是，诸如神话故事的这类传说，是所有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也是人类早期的尚未宗教化的梦幻歪曲后的残迹。

你或许会说，虽然在这篇论文题目中我把作家放在首位，但我对作家的论述比对幻想的论述少得多。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推导出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认识。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提出一些鼓励和建议，从对于幻想的研究着手，导向对作家选择文学素材问题的研究。至于另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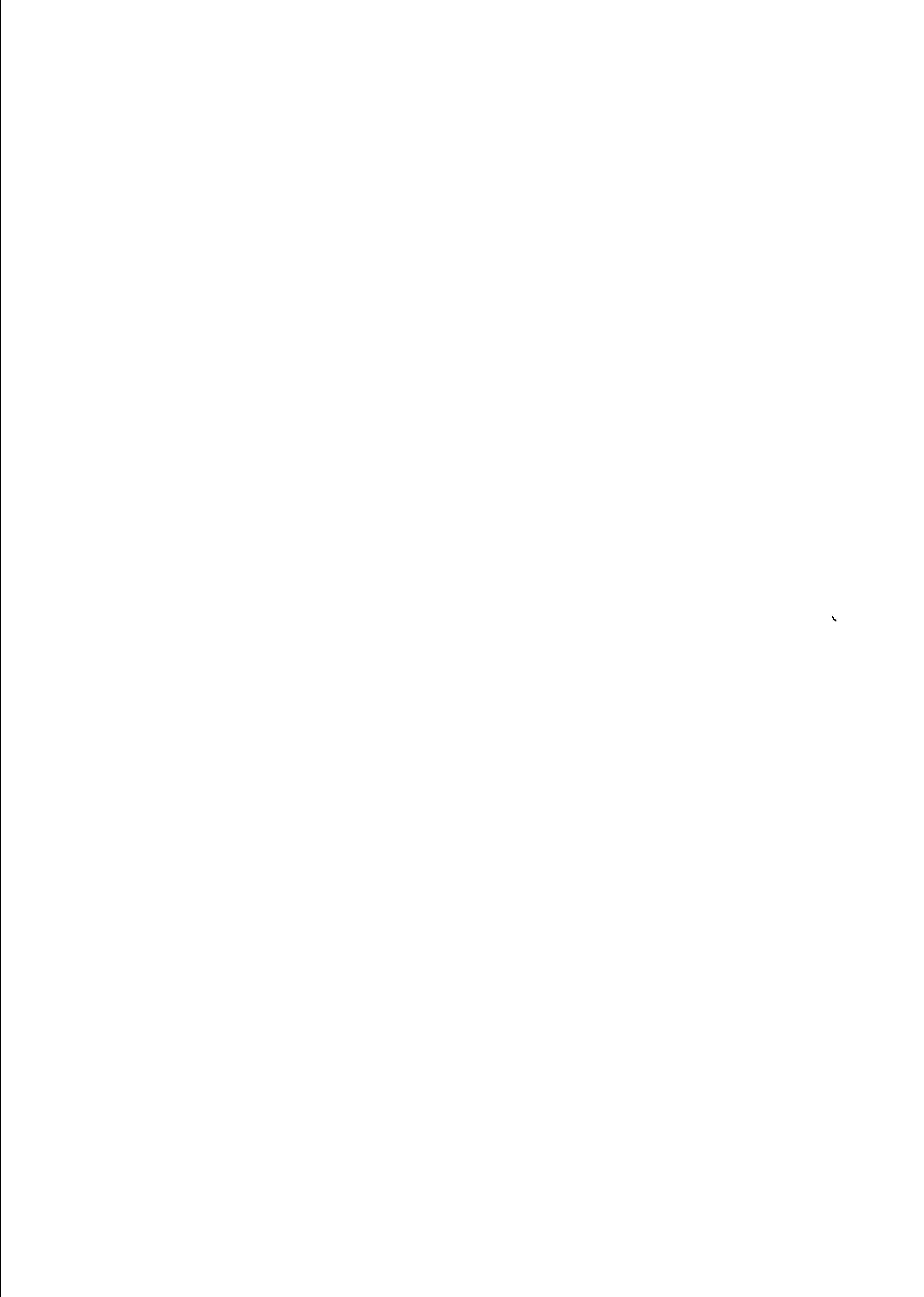
---

① 弗洛伊德在 1898 年 7 月 7 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讨论迈耶尔（C. F. Meyer）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主题时，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弗洛伊德，1950a，信 92）。

作家采用什么手段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感情效应——截止目前我们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我至少乐于向你指明一条从我们对幻想的讨论一直通向诗的效应问题的道路。

你会记得我曾论述过，白日梦幻者由于他感到有理由对自己创造的幻想而害羞，从而小心谨慎地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幻想。现在我应该补充说明，即使他打算把这些幻想告诉我们，这种倾诉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我们听到这些幻想时会产生反感或者深感扫兴。但是当一位作家给我们献上他的戏剧，或者献上我们习惯于当做他个人的白日梦的故事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极有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产生。作家如何达到这一目的，那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精华在于克服使我们心中感到厌恶的效果的那种技巧，这种厌恶感毫无疑问地与一个“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产生的隔阂相联系。我们可以猜测到这种技巧的两个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他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形式的　　即美学的　　快感来俘虏我们这些读者。我们给这类快乐命名为“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作者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①。在我看来，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甚至有可能，这种效果的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这个认识成果就把我们引向新的、有刺激性的、复杂难懂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门槛儿边；但同时，至少是目前，它也把我们带到我们讨论的终点。

① 弗洛伊德把“前期快乐”和“额外刺激”的理论应用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最后一段中。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前期快乐”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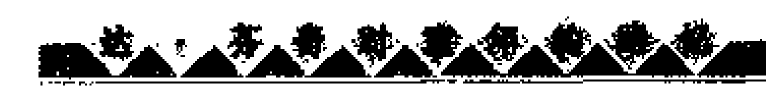
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

(*1910*)

刘　平　译
廖凤林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长篇评传。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1) 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丛”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 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像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3) 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他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征。(4) 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抑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是阿兰·泰森修改了标题后的完整的新译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①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全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中译者）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② 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的这种兴趣不是暂时的，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的调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他曾提到了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他的一个患者。他在10月17日给琼的信中说，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刚从意大利搞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到的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读过这篇论文和一些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书之后，12月1日他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末出版。

弗洛伊德对此书再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有关"包皮环割术"（circumcision）的短注释，选录和引用了里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生活的人。这类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是赛德格已出版的对迈耶尔（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③。虽然弗洛伊德没有从事过这类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经依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

---

① 弗利斯断言，弗洛伊德对"双侧对称"（bilaterality）和"两性同体"（bisexuality）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的观点有疑问。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彼此疏远。在下文（原文136页）中将间接涉及到这场争论。

② "左利手" （left-handed），俗称"左撇子"，指在活动中惯用左手或占优势的是左手。——中译者

③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记录（我们很遗憾没能引用）表明，在1907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弗洛伊德作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撰写传记的某些说明。（参见琼斯，1955，第383页）]

章节，进行过片断的分析。事实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去了有关迈耶尔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说的研究，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这篇关于列奥纳多的专著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旅行。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的谴责和诽谤，因而他在第六章的开头就为自己做了辩解，这种辩解至今对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指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写的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到他的摇篮的记忆或者说是童年幻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把这只鸟命名为“nibio”（现在写做 nibbio），是意大利语中一个意为“鸢”的词，而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文的“Geier”，在英语中却只能译做“秃鹫”[①]。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自他阅读和参考过的那些德文译著。如赫茨菲尔德在她的译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来翻译摇篮幻想，规范德文该译为“鸢”。从弗洛伊德有记号的藏书里能看出，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米莱茨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从中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其他方面的情况 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虽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语中这个词译为“鸢”。

因为这个错误，某些读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整个研究，觉得它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更冷静地检查这种处境，详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无效的论争和结论的确切方面，仍将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须抛开列奥纳多画中“隐藏着的鸟”。即便它真的是鸟，也是只秃鹫，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费斯特“发现”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绍，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当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作为象形文字的埃及语“母亲”（mut）一词很肯定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她的权威性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确认“Gyps fulvus”就是鹰头狮身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

① 艾玛·里查特（Irma Richter）在她最近出版的《达·芬奇笔记选集》的一条注释中指出这一点。她像普费斯特一样，把达·芬奇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梦来解释。

而且这种经验性的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①。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列奥纳多的情况关系怎样，列奥纳多有关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与这种纠正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除由埃及语讨论导致了离题而外，尽管这仍然保持了它很大的独存价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题没有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即对列奥纳多的研究起始于他幼年的感情生活，描绘了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产生。除了这个主题外，这个研究还向我们展示了若干很重要的相关问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本质的一种更普遍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类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对自恋概念的充分展开，所有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影响。

---

① 秃鹫未受精便怀孕的故事不能作为达·芬奇在婴儿时期已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这种联系的存在不被这个特殊证据的缺乏而否认。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第一章

精神病学通常选取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这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①，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图填平将伟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离开来的鸿沟，会让人感到不满意。然而，研究不能不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们可以被认识、理解的每件有价值的事，并且相信他们同样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和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的天才②。绘画在他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使我们认识到的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③与艺术家结合起来的伟大。虽然他的绘画杰作留了下来，可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他的调查研究的特质从没完全给艺术创作以自由，并且经常是科研在艺术创作中反客为主，最终使他受到抑制。依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在列奥纳多临终时，他自责由于他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④。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属于传说，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无法否认的价值。

---

① [“世界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是席勒的名作《奥尔良少女》的诗句。这首诗被收入他的 1801 年版的剧本《奥尔良少女》，作为序诗，它被认为是对伏尔泰的《少女》的攻击。]

② 这是伯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被康斯坦丁诺娃引用（1907）。

③ 圆括号里的词为作者 1923 年增加。

④ [他（列奥纳多）鞠过躬直起身子，然后坐到床上，讲自己的病情和医疗条件。还说，因为他没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去为自己的艺术而工作，他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见瓦萨利的著作（1919）。]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不理解呢？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正是这种多才多艺的渊博知识使得他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的斯弗尔兹，并让其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发明封泥的执行者。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当常见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列奥纳多便是这种结合范例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中接受了极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也不属于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只重视关心人类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的那一类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匀称的身材，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善于雄辩，待人可亲。他热爱周围美的事物，喜欢豪华的服装和注重每一种生活优雅。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专题论文中的一段——这篇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他描写了有着许多不便在等待着的雕塑家："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个面包师，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他的背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尘。画家的情形就相当不同了，因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间里挂满了使人高兴的画并且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和读着美妙佳作的男士们陪伴着他，他可以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心情极为愉快地欣赏着它们。"①

列奥纳多的洋溢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限于他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可能如此。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生活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能从列奥纳多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的时代，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哥白尼

---

① 《论绘画》见路德维希的著作（1909），还见于里查特的著作（1952）。

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似的评论家有很大的背离，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炼金术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他的实验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对他绘画的影响在于他很不情愿执笔绘画，他画得越来越少，起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到这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几乎不关心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看来成了一个谜。

列奥纳多的某些原来的崇拜者试图为他开脱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他被指责之处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况相类似，他们都一样没有错误。而且，他们极力主张，就某些画来讲，甚至于没有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做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仅仅是他意图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概念，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像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声言，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掩盖不住我们面对的列奥纳多的全部情况。对一幅作品反复创作的艰辛感到苦恼，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但又不关心它的未来命运，这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再现，可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索尔密（1910，第 12 页）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当他进行绘画时，整个过程里，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列奥纳多最后的一些画，如《丽达》、《圣母玛利亚》、《酒神巴切斯》、《年轻的教徒圣·约翰》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罗马佐在复制《最后的晚餐》时，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及了列奥纳多没能完成他的作品的这种坏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从不放下他的画笔，
却比得上非凡的芬奇——
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在进行最详尽地准备、研究之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他的一个同时



代人、作家班德利，当时是修道院中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早早地爬上脚手架，一直在那儿呆到傍晚，不曾放下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呆上几个小时，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也时常从米兰城堡的庭院直接来到修道院，为他在那儿给斯弗尔兹制作的骑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画肖像，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从未交给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奥纳多保存，并由他把它带到法国的事实[①]。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最灿烂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把关于列奥纳多的工作方式的这些报告与他留给后人的、大量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展示其作品中每一个主题的草图和研究资料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否定这种说法：不稳定及草率的特质对列奥纳多的艺术产生了些许影响。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同一般的深奥性和只能在犹豫中取得决定的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观察到难以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限制如何不合他的理想。缓慢——列奥纳多工作中一直明显存在的特性——被看成是这种限制的特征，也是他后来从画坛中退出的先兆[②]。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不适应那种在未干好的底色上迅速作画的壁画技法，因此，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干燥过程拉长了作品的创作时间，这适合他的心境与闲适。然而，被涂在底色上的颜料又与底色分开，并且脱离墙壁，加之墙壁的残缺，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着绘画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毁坏[③]。

一个相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断送了《安格哈里战役》。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佛罗伦萨会议厅的墙上，并且没有完成就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似乎是一种不同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是促进这件艺术作品的，只是到后来才损害了这件作品。

列奥纳多这个人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消极和不以为然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当任何人要想得到自己的最大的活动范围时——没有对别人的强烈侵害，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列奥纳多却以默默地保持

---

① 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

② 佩特（Pater，1873）写道："然而在他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他肯定几乎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了。"

③ 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1卷）论述了有关试图修复和保存这幅画的历史。

和平、回避所有的对抗和争吵而闻名。他温和、慈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不吃肉，因为他认为剥夺动物的生命是不应该的。他会特别愉快地到市场上买回鸟，再放飞他们[①]。他谴责战争和流血，并且描绘人不是动物世界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②]。这种带有女性温柔的感情没有妨碍他在刑徒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以便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脸孔，并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素描；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型武器，且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为伯尔吉阿服务。他时常表现得对善恶毫不在意，或者坚持用特殊的标准衡量善与恶。在最残忍、最狡猾的敌人侵占罗曼纳的战役中，他以权威身份跟随着皇帝。然而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上没有一行字对那些日子的事件加以任何评论与关注，这完全类似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

如果这部传记研究企图真正达到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话，那它就不必——好似在绝大多数传记中存在着谨慎或拘谨的情况——默然忽略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个性。关于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几乎不了解，但这方面的事却充满了重大意义。在同那个淫欲横流与悲观的禁欲主义相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表现出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女性美的画家不该有的情形——对性欲的冷漠拒绝。索尔密下面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句话证明了他的性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恶心，以致如果没有传统风俗、没有美丽的脸蛋儿和激发美感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③] 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也论及到了我们觉得不该是他这样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④]。这些作品是纯洁的，人们甚至说它们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纯文艺作品中此种程度的纯洁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它们如此果断地避开有关性的每件事情，似乎惟独厄洛斯，这个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材料[⑤]，人们都很了解，伟大的艺术家们是

---

① 孟兹（1899）《一个同时代的印度人给一个麦地西人的信》中谈到了列奥纳多这个典型行为（见里查特的著作）（1939）。

② 见波塔兹（Bottazzi）的著作（1910）。

③ 见索尔密的著作（1908）。

④ 见赫茨菲德的著作（1906）。

⑤ 或许在他的《妙语集成》中能找到对这一点的异议（虽然它并不重要），但这本书还没有翻译过来。见赫茨菲德的著作（1906）。 [提出厄洛斯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这种说法比弗洛伊德引用此词早10年，两个短语几乎完全相同，弗洛伊德把它作为与死的本能对立的一般的性的术语。如用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

怎样常常地通过他们的性感的甚至赤裸裸淫秽的画来宣泄他们的幻想。相反，在列奥纳多的诸多资料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有关女性内部生殖器和子宫里胚胎的位置等的解剖草图[①]。（见图 1）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热烈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

---

① ［1919 年增注］在列奥纳多有关性行为的素描中某些错误显而易见。那是一幅平面解剖图（见图 1）我们肯定不会称之为淫秽的。里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按照我在这里给出的列奥纳多的性格的描述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

"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暴露出他过分的研究本能完全失败了，显然，这是他更强的性压抑的结果。男人的身体全部画出来了，而女人的身体只画出一部分。如果复制一幅给人看，只露头，身体盖住，能够肯定，他会把这个头看成是女人的头。尤其是前额波浪式的刘海儿及披在身后的、齐于第四、五胸椎的长头发，使得这个头更像女人头。"

这个女人的乳房有两个缺陷，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它被画得很松弛的样子，又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垂着；另一个是解剖学上的，这显然是由于列奥纳多的性欲缺乏，而没有认真观察哺乳期妇女的乳头。假如他有过观察，他必定会注意到有许多不联系的奶管输出奶水。可是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管道，并一直伸至腹内，他可能认为它以某种方式与性器官相联系。我们应该承认在当时对人体内部器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人体的解剖被看做是对死者的侮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列奥纳多所能使用的解剖材料很少，事实上，他是否知道在腹腔中有一个淋巴液囊都很成问题，但他想在画里画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是没有疑问的。他画的奶管向下延伸，直到与内生殖器联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想用能够看得见的解剖关系来描绘乳汁开始分泌与妊娠结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虽然我们准备谅解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导致的解剖学知识的欠缺，但事实上，列奥纳多很草率地处理了女性生殖器，使得表现子宫的线条十分混乱。其实他本可以把阴道和像子宫的东西画出来。

"与此相对应的，列奥纳多绘制的男性生殖器要正确得多。比如，他不满足于画出睾丸，还画出了附睾，并且画得相当准确。"

列奥纳多所画的性交姿势特别明显。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选择背向的、侧向的性交等进行绘画或素描。可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站着性交的素描，一定会想到这样几乎是荒唐地表现这个行为的原因是强烈的性压抑。假如一个人想痛快，他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舒服，这对饥饿和爱这两种原始本能都适用。在今天，人们采取躺着性交的姿势，就像我们的古人躺着吃饭一样，都是很正常的。就意愿来讲，躺着的姿势或多或少是希望享受的时间长一些。

"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愤怒的抵抗。他那厌恶的目光向旁边斜视着，眉头紧皱，紧闭着双唇，嘴角向下。在他的脸上看不到爱的欢乐和尽情的幸福，只有愤怒和厌恶。"

"无论怎样，列奥纳多在画两个下肢时犯了最蠢的错误。实际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他是通过平面解剖图在描绘性交，男人的左脚在图的最前面，据此，女人的脚便应该是左脚。但在画中，列奥纳多把二者调换了位置，男人有一只左脚，女人有一只右脚。如果人们想到大脚趾在脚的内侧，这个调换就很容易理解了。"

"仅仅这张平面解剖图就能够使我们推断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对力比多的压抑，这个压抑使他混淆了某些事情。"——［1923 年增注］里特勒的这些评论受到了批评，其理由是：不应该从一张草草的素描中得出如此严肃的结论，甚至不能肯定素描中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属一体的。

否有过任何密切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一样。当他还是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师傅瓦罗奇奥家时，他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他被判无罪。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扫地的男孩做模特儿[①]，他似乎就陷入了被嫌疑之中。当他做了师傅，他被他学生中的那些漂亮男孩和青年包围着。其中最后一个学生迈尔兹陪同他到了法国，并一直伴他到去世。列奥纳多



图 1

① 根据克纳米杰罗的记载（1900）：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有一段难解的、涉猎广泛的内容可以作为此情况的参考："当我把上帝描绘成婴儿，你会把我投进监狱；现在假如我把他描绘成成人，你会更坏地对我。"

指定迈尔兹为他的继承人。我们与现代的列奥纳多传记作家们所肯定的情况不同，这些作家们自然地要否定列奥纳多与他的学生们有性关系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这正是当时的习俗——有感情关系十分可能，但这并没有扩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高度的性行为不属于他。

只有一种方法即联系他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品性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理解列奥纳多的情绪和性生活的特殊性有关。就传记作家来说，心理学的探讨途径是非常不同的。就我了解只有一个人——索尔密（Edmondo Solmi），研究解答了这个问题。作家米莱茨可夫斯基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围绕着这位非凡的人写了一本与那小说相类似的读物，作家（通过想像）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索尔密（1908）给列奥纳多做了如下结论："然而对周围的每一事物的认识和以冷静的优于他人精神探究美好事物的最深层奥秘的不满足的欲望，决定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它们体现了他的信念的自白，提供了关于他本性的答案："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对事物本质的彻底了解，那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一事物。"[①] 列奥纳多在另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他似乎在保卫自己，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评论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处理方式）就是认识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的方式，这也是爱这样伟大的发明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被爱对象的深刻认识。如果你只了解它一点点儿，那你就只能爱它一点点儿或者根本就不爱……"

在他们传达的重要的心理事实中，没有找列奥纳多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宣称的显然是错的，而且列奥纳多必定同我们一样清楚这点。人类在研究和熟悉了感情所适用的对象之后才去爱或恨这一对象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相反，他们冲动地去爱，来自于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emotional motive），其作用顶多是经过反应和考虑使之减弱。那么，列奥纳多的意思仅仅是人类进行的只是不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人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爱：控制感情，让它服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勇敢地面对思维的检验时，才能让它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理解，他希望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正在他身上发生，并且假如别人都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他的感情被控制着，并且服从于他的研究本能。他不爱不恨，却要探讨自己爱什么恨什么的起源和意义。因此他首先必

① 见波塔兹的著作（1910，第193页）。又见里查特的著作（1939，第2卷，第244页）。

然会表现出不加区分地看待善与恶、美和丑。他在调查工作期间摆脱了爱和恨的肯定与否定的印记，把二者都转变为智力兴趣。实际上，列奥纳多不是缺少激情，也不缺少天才的火花——这一所有人类活动背后隐含着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他只是把他的激情转变成为求知的渴望，然后他依靠从热情中获得的执著、坚定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并使智力活动达到了巅峰。当赢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把长期受约束的感情释放出来，任它们自由流淌，就像源于大河的小溪。在发现的巅峰，当他审视到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会被情绪所折服，会用欣喜若狂的语言来赞美他研究中具有创造性那部分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措辞——造物主的伟大去赞美它。索尔密正确地理解在列奥纳多身上的这种转变过程，他在引用了列奥纳多称颂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转变为一种宗教情感，是列奥纳多手稿的一种独有的特征，在那里，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因为他对知识的无法满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求，列奥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避开关于研究的本能可能转化为生活乐趣的疑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变当做浮士德悲剧的基础——那我们就会冒险地得出一种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相接近。

心理本能的力要转化为各种活动形式，同体力的转化一样，没有损失或许是达不到的。列奥纳多的例子教会我们有多少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在与这些过程的联系之中加以考虑。直到充分地获得知识才去看，其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在知识的国度里畅通无阻的人不能适当地被说在爱和恨，他总是超越了爱和恨。他用调查研究代替了爱。这或许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比其他伟人、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可激励可消沉的暴雨般的激情本性——其他人可在其中享受到最富有的体验——看来并没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同样取代了活动和创造。一个对宇宙所具有的复杂性、法则的宏伟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忘掉自身的微不足道；迷失在赞颂和充满虔诚之中，他太容易忘掉自己也属于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一条路向他开放着。他根据自己的力量尝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注定过程的一小部分，而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比那大部分缺少精彩和意义。

像索尔密认为的那样，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①。为了保证对自然模仿的准确，他直接努力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则，并且给其他人指出了这种方法。当时他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驱动他去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植物、人体的比例，并且通过它们的外部来获得其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

① 索尔密（1910）论述：“列奥纳多把对自然的研究作为画家的规则……然后，当研究的热情占了统治地位，他就不再希望为艺术而求知，而只是为知识而求知。”

这些知识确实在它们的外部得以表现，并且它们也要求在艺术中被描绘。最终，无法抵挡的本能席卷了他，直到这种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割断，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断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他在自己的书中很抒情地写下了这一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调查研究已伸展到了自然科学的每一领域，并且在每一个单独的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个预言家和先驱者①。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某些事情使他远离了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却使他在"芬奇研究院"中（见原文 128 页），为该院画了一些精致的缠结的符号，给心理学研究留了一席之地。

那么，当他尝试着从调查研究回到他的起点艺术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被兴趣的新方向所干扰，并改变了他心理活动的本性。在一幅画中什么使他感兴趣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首要问题的背后，他明白还有无数其他问题会产生，就像他经常在自己无尽的和不知疲倦的自然研究中遇到的那些问题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孤立地去看艺术作品，更不能把它从他理解的它所属的广泛联系中分割开来。在耗尽许多努力在艺术作品中去表达与他思想中的艺术相联系的每件事以后，他被迫在作品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声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收了一个研究者帮他绘画，现在，这位"仆人"强大起来，并压制了他的师傅。当我们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里面发现本能发展了一种过分的力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寻找着用特殊倾向来解释——虽然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的一切，我们还几乎不了解。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让我们预构了两个进一步的预期结果。在每个特别的案件中，我们都满意地找到预期结果的验证。我们认为像这种过分有力的本能可能在有些倾向的人的童年时代的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确立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做进一步的假设，过分有力的本能从原始的性本能力量中找到了援助。结果后来它能够代替人物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这种类型的人会以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另一类型的人则把这种精神献给爱情）来追求研究事业，并以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的事例中有性援助，而且在大多数特别强烈的本能事例中亦如此。

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给我们的是，多数人把他们的性本能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功地指向了他们的专业活动。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种奉献。就是说，它有能力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不是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已被证明了的过程，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会显示出在他童年里，这个强有力的本能是为性兴趣服务的。

① 参见赫茨菲德所写的传记中列奥纳多科学成就细目（1906）。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

我们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成熟的性生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衰退的话，那一部分性活动就将被强有力的本能活动所取代。

应用这些预想对强有力的本能情况的研究似乎特别困难，因为大家恰好不愿相信儿童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容易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的爱提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提问是因为他们想以此来代替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如果成人不了解这是孩子迂回累赘的陈述，就会大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一些，变得更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就常常会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满的说明，告诉我们可能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大约从他们三岁开始，就要经历一个被称做"幼儿性研究"（infantile sexual researches）的时期。就我们所了解的来说，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留下的印象所唤醒——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的事实，或者被他们出生的客观经验的恐惧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领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从哪来的问题，孩子确实在寻找抵制不喜欢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使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孩子们拒绝相信给他们的些微信息。例如，不相信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的聪明才智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经常体验到与成人的严重对立。事实上，他们在后来绝不谅解成人有关事实真相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推测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随着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得出婴儿来源于吃饭，再通过人的肠子生出来，以及父亲在其中起着模糊的作用等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而性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敌意的、狂暴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的结构尚未达到能生孩子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从哪儿来的研究难免一无所获，并因不能解决而被放弃。第一次智慧尝试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长久的、深深的、沮丧的印象①。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精力旺盛的性压抑的高潮所结束时，研究本能面对性高潮有三种清晰可能的变迁，这都由于研究方法与早期的性兴趣有联系。第一种类型，研究均分享了性欲的命运。从那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此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受到限制，尤其是此后不久这种对思想有力的宗教抑制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一种具有神经性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带来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症。第二种类型，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抗约束它的性压抑。当幼儿性研究的时期结束以后，已强壮起来的智力时常会回忆起

① 从研究我的《对一个5岁儿童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以及类似的观察结果看，这些可能并不夸张的断言能得到证实。[1924，下面的话是这样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第2卷中类似的观察结果的记载。"在《儿童性理论》的一篇论文中我这样写道："然后，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失败对孩子的整个一生都具有丧失活动能力的影响。"]

旧的联想，试图帮助逃避性压抑。研究被抑制的性活动以强制的沉思的形式，自然也是以被扭曲的和不自由的形式从潜意识中再现出来，然而性活动会用充足的力量给思想本身赋予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欢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涂上色彩。在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经常是惟一的活动，并且出自一个人头脑的决定及其感情代替了性满足，可是事实上孩子在研究活动中的无止境的提问特征，仍在不停的思考和渴望不断重复着缩短寻找答案的过程。

因一种特殊素质的效力，最宝贵、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抑制和神经强迫思考的抑制。这里确实也发生性压抑，但是它不会把这些性渴望的本能降至潜意识中。代替它的是力比多，从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依附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作为援助力量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研究活动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来自潜意识的闯入），神经症的特性没有出现，这儿没有对原始婴儿性研究活动情结的依附，本能能够自由地运转来为智力兴趣服务。性压抑通过给本能添加了升华的力比多，使本能如此强壮，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关系，但它仍然受到本能的驱动。

如果我们认识到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过程的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衰退，我们就应该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典范。他的本性的核心与奥秘显示出，在他的好奇心于幼年时被激活来为性兴趣服务之后，他便成功地将大部分的力比多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要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确实不容易。要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应需了解他童年早期心智发展的一些情景，仅仅希望从有关他的生活情况的很少且不可靠的材料中得到证实似乎有些可笑。有关情况信息不详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没能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关于列奥纳多年轻时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1452 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一个被叫做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瑟・皮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和公证人（姓氏来自于当地的地名）结合的家庭。他的母亲叫卡特琳娜，好像是一个农村姑娘，后来与芬奇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母亲没有在列奥纳多生活的历史中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相信他成功地找到了她的某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惟一比较可靠的资料来自 1457 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佛罗伦萨征收土地税的登记簿，其中提到列奥纳多是芬奇家庭中的一员[①]，是瑟・皮罗的 5 岁的私生子。瑟・皮罗与阿尔贝拉结婚以后没有孩子，因此就可能把小列奥纳多留在他父亲家里养育。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他作为一名艺徒进入瓦罗奇奥的画室。1472 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如此。

---

① 参见克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

第二章

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仅有一个地方记载了一段有关他童年时的情况。这一段描述的秃鹫的飞行情形，他突然中断叙述，追忆起涌现在脑海里的一个早年的记忆：

"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①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当然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记忆。因为它的内容及它所标定的年龄都很奇特。一个人能够保持他在乳儿期的记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保持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确定的，列奥纳多这个记忆里宣称的秃鹫用尾巴撞开小孩子的嘴的情形，听起来不太可能、太离奇了。那么，对此记忆的另一种观点，能够同时解开两个疑难的观点，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该记忆的判断。依照这个观点，秃鹫的情况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形成、并且变换到童年时代里去的一个幻想②。

① 弗洛伊德在德文本中引用了赫茨菲德翻译的意大利原文的德译本的内容。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德文本里有两处不够准确，意大利语"nibio"应该是"鸢"，不是"秃鹫"；而且意大利语"dentro"在里面被漏掉了。这个遗漏，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里做了矫正。

② ［1919年增注］在对本书进行友好的评价的同时，蔼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就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不赞同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有良好的真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经常是比一般估计的要晚些；问题中的大鸟不一定就是秃鹫。这一点我愿意让步，为了减小困难，我要提一个建议，即他的母亲观察到了大鸟拜访她的孩子，在她的眼睛里，这件事比较容易被看成是预示着某种意义，并且在后来反复地给他讲述这件事。我认为，结果是他所保持的记忆是他母亲给他讲的故事，以后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很可能把这个记忆当成自己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改动无损于我的总的说服力。的确，一般说来，人们在日后建构起来的有关童年时代的幻想被附加到早期的通常会被遗忘的平凡的真实事件上。所以重视并不重要的真实事件，就像列奥纳多故事中的鸟，他称之为秃鹫及它的值得注意的行为，那样细致地处理这个真实事件，必定有其隐秘的原因。

童年时代记忆的起源常常是这样的方式。童年记忆与成年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全然不同，它们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在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此后的趋势服务。所以一般来说，不能把它们很准确地从幻想中识别出来，如果把它们与起源于古代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或许能最好地说明它们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它便不想着要去记载自己的历史。它的人民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抗争，尝试着从人家那里夺取领土和获得财富。这是英雄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的时代。然后，是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来到了，人们意识到自己要富裕和强大起来，这又是怎样发展的。历史记载以对现在情况的不断记录开始，同时也要一瞥过去，采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踪迹，通过这种方式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期历史应该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应是过去的真实画面　　这是必然的。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遗漏了，另一些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适应现在的观念被给以错误的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好奇心，而是期望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在他们前面竖起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年期的事件有意识的记忆各个方面都可与第一类历史记载［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相媲美。就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当然这历史后来是为了具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①。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有关秃鹫落到他的摇篮的故事仅仅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就会觉得在它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很不值得。有人也许会满足于基于列奥纳多的爱好对此做出的解释：他（指列奥纳多）不隐瞒自己的爱好，他把自己对飞鸟的专注看做是命运的预先安排。可是若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很不公正，就好像很粗心地否定了在民族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做的解释一样，即使有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是早期年代里的人们早期形成的经验，并且是在曾经很强有力的、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所有起作用的知识力量把被歪曲的事扭转过来的话，那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困难。同理，这也可揭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或幻想。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

①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第四章中论述了童年时代的记忆和掩蔽性记忆（screen-memories）。弗洛伊德在1907年增补时，又把它与历史记载做了类比。

估价的证据[1]。现在，当我们以精神分析技术这一极优秀的方法，帮助我们把隐蔽的材料显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大胆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这样做，我们还不能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定性，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思考来安慰自己了，关于这位伟大的、谜似的人物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同样没有遭遇到更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列奥纳多对秃鹫的幻想（phantasy of the vulture），那这个幻想就不会长久显得奇怪了。我们似乎能回想起在许多地方都见到过同类事情，例如在梦中。所以我们便大胆地从幻想自身特殊的语言中把它翻译成通常能被理解的文字。这个翻译可以看做是指向一种性的内容。一个尾巴，"Cada"，在意大利语中与在其他语言中相同，是男性性器官的最为人熟知的象征和起替代作用的一种表现[2]。秃鹫用尾巴撞开孩子的嘴，并在里面强有力地拍击着[3]。这种幻想中的情形与含阳（fellatio）行为，即把阴茎放进有性关系的人嘴里的性行为是相符的。很奇怪，这种幻想在特征上完全是被动的，就像在女人或被动的男同性恋者（是指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人的人）的身上发现的一

---

① ［1919年增注］当我写完上面这段文字，我已试图对另一个天才人物的难以理解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做了类似的分析。当歌德（Goethe）大约60岁的时候，他在《诗与真》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描述。最初的几页里写道：他在邻居的鼓励下，怎样开始把一些小陶器从窗户掷到街上，摔得粉碎，后来便掷大件。的确，这是他所报告的童年时代最早期的生活的惟一一幕。它的内容是全然不重要的，这与其他没有成为伟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记忆相符合，在这一段中表现出他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在他3岁零9个月时他弟弟出生，在他将近10岁时弟弟死去，所有这些都引起我对这个童年记忆的分析（事实上，歌德在书的后面部分，详细描述童年时的许多疾病时提到了他弟弟）。我希望自己能用与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某种东西来说明这个记忆，这个说明将使得这个记忆值得保留，并与歌德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所给予它的位置协调一致。简短的分析［《诗与真》中歌德的童年往事（1917）］可能把掷陶器作为一个反对讨厌的侵犯者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加以认识；书中所写的这种情景反映出他的意图要达到这样一点，也就是不能允许第二个儿子干扰歌德与他母亲的亲密关系。如果最早期的童年记忆在这样的伪装中保存下来，那么歌德的情况与列奥纳多的情况一样，都与母亲有关，那里面什么会使人惊讶呢？［1919年的版本中，有一段写了"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这一句改写成"……很显然，一点也没提及有关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版本用了前面的句子，句子结尾还加了括弧。1923年，弗洛伊德在论述歌德的论文中，增加注释说明了这个情况（1917b），标准版，第17卷，第151页］

② ［"鼠人"（标准版，第10卷，第311页）情况的"原始记录"。可以指出（假定这只鸟实际上就是"鸢"）鸢的分叉的长尾巴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在空中飞行时尾巴起重要作用，并且无疑的是在飞行中这个尾巴被列奥纳多观察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弗洛伊德在这一段里关于鸢尾巴的象征意义的讨论最近被发表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的一篇鸢的鸟学描写所证实："有时尾巴在右侧（角）向水平面呈扇形展开。"］

③ 参见原文第82页注释①的结尾。

些梦和幻想。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自己，别因为精神分析被第一次应用到对一位伟大而又纯洁的人的记忆进行分析，就去对它进行无法原谅的中伤，就让愤慨的波涛妨碍你跟着精神分析前行。很清楚，这种愤慨绝不能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意义，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明确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或者，如果说得好听点，是不能放弃我们的偏见，即这类幻想必定有“某种”意思，与另外一些心理创造（psychical creation）——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妄想——有相似的方式。那就先让我们、公正地倾听片刻分析工作吧，它的确还没讲到最后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进嘴里并吸吮它的爱好，在体面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令人恶心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却频频发生——古时亦然，像一尊古时雕像所表现的那样，在做爱情形中，这一爱好完全失去了令人恶心的特征。医生们发现，甚至那些读过克兰夫特（Krafft-Ebing）的《变态性心理》或者从其他信息中也没有意识到以口淫的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能从这种爱好中产生幻想。妇女们发现自发地产生这种渴望的幻想似乎并不困难[①]。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受到道德严厉的谴责的这种情况可溯源于一种最纯洁的初始状态。它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我们都曾感受到愉悦的一种情形——即当我们还在受乳的时候（“essendo io in culla”）[②]，把我们妈妈的（或奶妈的）奶头放在我们的嘴里吸吮它。这一经验的器官印象——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快乐的源泉——无疑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法抹掉的痕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与人的乳房功能一样的牛乳房时，它的形状与它在肚子下的位置使孩子把它与阴茎联想在一起，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就实现了，这个初级阶段会使人产生令人厌恶的性幻想[③]。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列奥纳多把自己想像中的秃鹫的经验认为是他受乳期的记忆。幻想所掩盖的仅仅是妈妈怀里吸吮乳头，或者被哺的回忆，这是人类美丽的一幕。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掩护下，用过他的画笔进行描绘了。的确，还有一点我们不甚了解，而且这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种对两性同等重要的回忆被列奥纳多这个男人转换成了被动的同性恋幻想（homosexual phantasy）。我们把同性恋和吸吮母乳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回想一下，事实上，传统观点的确把列奥纳多作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感情的人来表现的。

---

① 这个要点可参见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的片断》（1905c），标准版，第 7 卷，第 51 页。

② “那时我还在摇篮里”参见原文第 82 页注释①。

③ 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第 10 卷，第 7 页。

在这种关联中，我们的目的与那些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不管它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都是不相干的。决定我们判断某个人是否是一个性倒错者（invert）[1]，并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而是他的情绪态度。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外一个难以理解的特征。我们把这个幻想解释为待母哺乳的幻想，并发现秃鹫替代了他的母亲。那么这个秃鹫从哪儿来？又如何恰巧在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被发现的？

在这一点上，那来自遥远地方的一个思想涌上心头，它是那么迷人。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2]。埃及人还崇拜女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是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3]。女神的名字读做摩特（Mut），与我们的单词Mutter"（母亲）读音相似，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若是在秃鹫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真正的联系，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期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因为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生活在1790～1832年的查姆波林（Fransois Champollion）[4]。

探究古埃及人是怎样选择了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的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现在的宗教和文明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自己能熟悉埃及遗迹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品中获得了我们可用的有关埃及遗迹的资料。作品中有一些是知名作者所写，如斯泰波（Strabo）、普鲁塔契（Plutarch）和阿美安斯（Ammianus），另一些著作是人们不熟悉的作家所著，其史料出处及写作日期都不确定。像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和留传于世的那本作者名字是赫姆斯（Hermes Trismegistos）神的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书。我们从这些史料中了解到，秃鹫之所以被看成是母亲的象征是因为人们仅相信雌秃鹫的存在，这一物种被认为是没有雄性的[5]。在古代自然之中我们能找到单性繁殖的相应例子：埃及人崇拜圣甲虫，把它当做有神性的，因为它被认为只有雄性的存在[6]。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便要猜测它们是怎样受孕的。这一点在赫

---

① 在1910年，仅仅是"一个同性恋者"。

② 赫拉波罗（Horapollo）（《象形文字》1，11）：为了表示母亲……他们勾画了秃鹫。

③ 参见罗斯彻（Roscher）（1894～1897）著作，兰泽（Lanzone）的著作（1882）。

④ 参见哈特兰本（Hartleben）的著作（1906）。

⑤ [他们说："不曾有过雄秃鹫的存在，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阿利安《动物的本性》第2卷第46页。] 温·罗莫（von Römer）引用（1903第732页）。

⑥ 普鲁塔契："正像他们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所以埃及人得出结论，没有发现雄秃鹫。"这句话实际上是李曼斯（Leemans）为赫拉波罗写的注释（1835，第171页）被弗洛伊德张冠李戴到普鲁塔契头上。

拉波罗的论述中给予了充分的解释[①]：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这些鸟停留在半空中，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我们此时意外地达到了一种境地，仅仅是不久前我们还当做荒谬并加以否决了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熟悉一则科学寓言是相当有可能的。在这则寓言里埃及人让秃鹫担当起了母亲这个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是一个涉猎极为广泛的读者，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全部分支。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本他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全部书籍的目录[②]，并且还有大量对从他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所做的阅读笔记。假如我们从里查特（Richter 1883）摘录的列奥纳多的笔记来推断，他的阅读范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著作在他阅读范围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书籍当时都已出版了。事实上，米兰是意大利新的印刷艺术的领头城市。

我们通过对一则信息的进一步探讨，便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变为确定性。赫拉波罗的博学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引用的原文做了下面这样的笔记（李曼斯，1835）："然而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他们凭借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取的证据，试图驳倒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因此，几乎他们所有的人中都流传着这个话题。"

所以，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跟圣甲虫类似传说一样，绝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来自自然史中的证据，来对抗那些怀疑神圣的历史的人。假如在最好的古代记载里秃鹫被描述为受孕于风，那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在相同情境中没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变得这样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挂在嘴边，所以，我们就无法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被广泛地庇护和宠爱的寓言。

现在我们可以重构列奥纳多有关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神父那儿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的，并且它们在没有雄性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繁殖，在这点上，一个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记忆被改造成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幻想了，然而这个幻想是表示他也是个这样的小秃鹫——他有过母亲，却没有父亲，这一点与他的记忆联系起来了，那么重要的年龄印象——在母亲胸前吃奶时的快乐回声——惟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教会的神父们引喻的圣母及其孩子的思想，即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对他来说，必定是助长了这个幻想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确，他能够以

---

① 赫拉波罗：《象形文字》李曼斯编辑（1835，第 14 页）。"他们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一种族中没有雄性。"似乎赫拉波罗文中的一段被错误地引用了，从上面正文内容看，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② 参见孟兹（Müntz）的著作（1899，第 282 页）。

这种方式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基督，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我们剖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区分其中哪些是真正的记忆，哪些是后来被修饰、歪曲动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现在我们了解了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母亲揭示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和谐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把自己比做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掌握的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接受了。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呢，还是在土地登记注册前的几周呢？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是这样的：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性的最初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那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度的，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体验了缺少父亲的感受。这似乎是从我们精神分析的努力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却很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而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的情况确实对他起作用，这个结论的肯定性就被加强。史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瑟·皮罗与出身很好的阿尔贝拉小姐结婚了，因为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被他父亲的（确切地说是他祖母的）家庭收养了。就像文件证实的那样，那一年他5岁。在婚后不久便让一个年轻的、期望自己被保佑生养自己孩子的新娘来抚养一个私生子的事是很不常见的。他们在决定收养可能自己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这对他们没有一个所希望的合法孩子的状况是个补偿）即私生子之前一定经历了几年失望的生活，如果他与孤独的母亲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之后，才转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是最吻合了。可这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幻想一律强调这个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可靠的，那么，秃鹫幻想证实的列奥纳多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是同他生母共同度过的这一事实，将会对他的内心生活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早年生活中就比别的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带着特殊的感情焦急地思索这个谜，就这样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便成了一个研究者——被婴儿从哪来、父亲与婴儿的起源有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折磨着①。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童年的历史就这样被联系着，促使他在后来声称：因为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要对鸟的飞翔问题进行探索。这样，在下文要说明他对鸟儿飞行的好奇心如何源于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研究，就不困难了。

---

① 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第三章

我们在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中，拿出秃鹫这个因素代表他的记忆的真实内容，而他这个幻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说明这个内容对他以后生活的重要性。在我们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置于同性恋的情境中。用乳汁哺育了孩子的母亲幻化成了把尾巴放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断言，根据语言置换成替代物的通常方式，秃鹫的“尾巴”（coda）只能象征着男性生殖器——阴茎。然而我们不清楚想像活动是怎样成功地把男性的显著特征明确地赋予了象征着母亲的鸟，这种荒唐的观点使我们茫然不知怎样才能分解出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有什么理性的意义。

不管怎样，当我们仔细考虑那些显然是荒谬的，在过去我们被迫放弃其意义的梦，我们就不该绝望。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代的记忆比一个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呢？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当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让我们赶紧加上另一个更显著的特性[①]。

根据罗斯彻（Roscher）的词典中俊克斯勒（Drexler）写的条目，长着秃鹫头的埃及女神摩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人物，她经常与另外一些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女神，如专司生育的女神（Isis）及爱神（Hathor）结合在一起出现，与此同时她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崇拜者。埃及众神的特征是单个的神并不在结合的过程中消失。个别的神在与其他神融合的过程中继续独立存在。现在这个长着秃鹫头的女神通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来代表[②]；她的身体是女性的，这由乳房来揭示，但是还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我们发现在女神摩特身上就像在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女性和男性特征的结合一样。我们能否假设列奥纳多读了罗斯彻的书后了解了雌秃鹫的两性同体的性质，如此来解释这种巧合呢？这种可能性是很有问题的，显然他所接触到的资料

① 参见《释梦》里弗洛伊德的某些类似的议论（1900a），标准版，第4卷，135～136页。

② 见兰泽的图解（1882，图136～138）。

不包含这个惊人的特征。这一巧合应追溯到在两种情形（指女神摩特与雌秃鹫的两性同体）中都起作用、但我们还不清楚的一个共同因素，似乎更有道理。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的雌雄同体的结构，不仅为摩特所有，而且也是其他神——像生育神和爱神们所有——虽然这些只可能是就他们也有母性的本性并能与摩特合并在一起来说的（诺玛，1903）。神话又进一步指出另一些埃及神，例如派生出希腊雅典娜的赛斯的内斯神，当初也被想像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还有许多这样的希腊神，尤其是那些与地尼萨斯（Dionysus）相联系的神，而且阿芙罗狄特亦如此，她后来被限制在充当女性爱神的角色。神话也可能提供解释：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的身上是要企图表达最原始的自然创造力量，而且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只有男性和女性要素的结合，神的完美才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体现。然而，这些思考中没有一个给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以解释，即人类想像力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欲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与母性的一切相反的男性能力的标志。

婴儿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生殖器被认为与母亲的形象并不矛盾[①]。当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把他的好奇心转向性生活之谜时，他就被自己对生殖器的兴趣支配了。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部分有价值、太重要了，以致使他不能相信那些他觉得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们身上会缺少那部分。因为他不能猜测出还存在另一种与此价值相等的生殖器结构，他便被迫得出一种假设：所有的人，女人，还有男人，都拥有一个像他那样的阴茎。这种定势牢固地植根于这个年轻的研究者心中，甚至当他第一次观察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也未毁坏这种定势。他感觉到他身上真的有某种东西与女孩有别，然而他还是不能向自己承认：他的感觉内容是女孩子们身上不能找到阴茎。阴茎失踪了，这个离奇的、无法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打击，所以，他试图以这样的结论做妥协：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还很小；将来会长大的[②]。如果在以后的观察中，他的这个期望没能变成现实，他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方法：小女孩也有一个阴茎，可是被割掉了，在它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道伤口。这个理论的进步已经含有了令人痛苦的个人经验。那时，这个男孩已经听过恐吓，如果他显示出对那个器官太浓厚的兴趣，那它对他来说如此亲爱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拿走。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下，他现在用新的视角来审视他已经获得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见解。今后，他在为男

---

① 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② 参见《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中的意见（弗洛伊德 1909 年《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第 10 卷，第 11 页。还可参见荣格 1910 年的著作及 1919 年增加的注释）。并可参见《国际精神分析医疗杂志》和《意象》中的意见［关于儿童的一章］。

性而忧虑的同时，将蔑视那些不幸的创造物，像他推测的，严厉的惩罚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1]。

在孩子还没有受阉割情结的支配之前，在他还认为女人充满价值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极强的窥视的欲望，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最初全部的可能性是把它们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于母亲的性吸引力不久会在对她的生殖器（他以为那会是一个阴茎）的渴望中达到顶点，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种渴望就经常转变为厌恶感，在青春发动期这种厌恶感能变成神经衰弱、厌恶女人和长期的同性恋的原因。然而，他的强烈渴望固定在女人的阳具这一对象上，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打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他会特别彻底地深究幼儿的性。盲目地崇拜女人的脚和鞋表明他仅把脚当做了他曾经尊崇过的、后来又失踪了的女人的阳具的替代性象征，这也是清楚的，喜欢剪女人的头发的反常者扮演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者的角色。

只要人们坚持人类开始文明起来时的那种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的态度，那就无法达到准确地理解儿童的性欲活动，或许还会找个庇护，声称这里所说的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出自原始时期的类比来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经历了一代一代的漫长岁月，我们把生殖器看成是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使人厌恶。如果一个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会被引诱着声明[2]，生活在今天的大部分人服从的是不情愿地繁衍后代的指挥。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折磨，被贬低了。在我们中间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只存在于粗野的社会底层的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在高雅的上层社会，这种观点被隐蔽着，因为它被认为是文化低俗的表现，人们违心地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初始情形全然不同。文明研究者的辛勤编辑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生殖器最初是生命的骄傲与希望，它们被当做神来崇拜并且向重新学习的人类活动传播它们的神性。作为它们的基本特性升华的结果出现了无数个神。当官方的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从意识中隐去的时候，崇拜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联系在那些初学者中继续保持下去。许多神圣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被从性欲中抽取出

---

① ［1919年增注］这个促动了我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儿我们可以追溯到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根源，它显示出强大的自然力，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发现如此无理的表现。如果勇敢地把我们的推测带回到人类的初期，我们就能得出推论，原来的包皮环割术取代了阉割，这是一种宽容的设计。［有关这点的深入探讨可在《"小汉斯"分析》的注释中找到（1919b），标准版，第10卷，第36页；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的第四节中也可以找到。］

② 这一观点的句子是1919年增加的。

来，被钻空的残余物陷入耻辱之中。按照所有不可磨灭的东西是精神痕迹的说法，甚至崇拜生殖器的最原始情形仍能在近期的时代中存在，并且在今天的人类语言、习俗和迷信中都保留了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残余物①，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物学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类似情况，使我们发现了个人精神的发展以忽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所以，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重视婴儿生殖器具有很高价值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关于母亲有阳具的假设，就是两性同体的女神，如埃及的摩特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的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用两性人（hermaphrodite），并且在其医学意义上来表述这些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结合的两性生殖器，厌恶所有的观看者的结合被畸形地表现出来了。所有发生的情况都是男性生殖器被附加在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上，正像儿童关于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描述的一样。母亲身体的这种形式，原始幻想中的令人尊崇的创造物，在神话中被信徒们保存了下来。突出列奥纳多幻想中秃鹫的尾巴这点，现在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解释：“最初我的多情的好奇心是直接指向母亲的，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生殖器。”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对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清楚，我们还不应该满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尾巴的那种解释。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更多的我们未理解的东西。它的最惊人的特征毕竟是把在母亲胸前吃奶变成了被母亲哺乳，也就是说，变成了被动的形式，即处于一种同性恋者的情境。当我们想到历史上的列奥纳多，在其一生中犹如一个情感上的同性恋者那样所谈所行，是历史的可能性时，我们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幻想是否能揭示出列奥纳多的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与他后来显现出的即使是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了解到确实存在这种联系，并且事实上是一种密切的必要的联系，我们就不应该贸然地从列奥纳多被歪曲的记忆中做出这种联系的推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男人们强烈地反对强加于他们的性行为上的法律限制，愿意通过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描述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性类型，作为“第三性别”（third sex）的一个中间的性阶层。他们宣称，他们是由器官决定了的先天被强迫从男人身上获得快乐，而无法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的人。无论人们多么想以人性为由赞成他们的宣称，都必须有所保留地对待他们的理论，

① 参见耐特的著作（1768）。

因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和对同性恋者宣称给予检验的方法。这个分析只在少数人的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都产生了同样惊人的结果①。在所有我们这些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在其童年早期，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这段经历后来被遗忘了。这种依恋在童年时期被母亲太多的温柔所唤起或鼓励，又进一步被父亲较小的作用所强化。塞德格强调了一个事实，同性恋患者的母亲通常是男性化的女人，她们具有强烈、显著的性格特质，能够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偶然也见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另一种情况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开始父亲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以致男孩发现自己完全在女性的影响之下。的确，一个强壮的父亲的存在能够保证儿子在选择某一个异性对象时做出正确的决定②。

经过初步的性研究阶段，转化过程便开始了，它的机制是我们所了解的，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清楚。孩子爱母亲不能继续有意识地向前发展，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使自己被母亲同化（identify），他以自己为模特儿，选择与自己相像的作为他的新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是悄悄溜回到自恋，待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现在爱的男孩是他自己儿童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和复活，并且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孩子。正像我们所说的，他沿着自恋（narcissism）的途径找到他所爱的对象，根据希腊传说，纳西索斯（Narcissus）是一位宁愿喜爱自己的倒影也不喜爱任何东西的青年，后来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③。

更深层的心理学思考证明了这种主张：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在记忆中保持了对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把对母亲的爱保留在潜意识中，

---

① 依我个人的经验，特别提及塞德格的研究，我大体上能够证实这个研究。我也意识到维也纳的威尔海姆·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和布达佩斯的桑德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② ［1919年增注］精神分析的研究的两个事实有助于对同性恋的理解，同时，无须假设精神分析的研究详尽地讨论了这种性变态的原因。第一个事实是前面提到的对母亲的性需要的固着（fixation）；第二个事实包含在这个叙述中的每个人，甚至最正常的人也可能进行同性恋对象的选择，有时他在生活中这样做了，或在他的潜意识中仍保持这个选择，或者用强有力的相反态度防止它。这两个发现否定了把同性恋者看做“第三性别”的声明，否定了被人们相信的先天同性恋与后天同性恋（innate and acquired homosexuality）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性别”（受身体的两性同体所决定）的特征相当有助于同性恋的对象选择，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在科学的领域里替同性恋者申辩的人，在已经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发现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③ ［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对自恋的参考意见仅仅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几个月，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第2版（1910）中增加的注释。他在1909年11月10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提到了这个概念。完整的论述见《论自恋：导论》（1914）］

并且从此对她保持忠诚。他似乎在追求男孩，成为他们的情人，但实际上他是在逃避其他女人，这些女人能导致他不忠诚。在个别情况的直接观察中也能使我们看到那种对男人的魅力十分敏感的人，实际上就像一个正常男人会被女人所吸引一样。每一次他都迅速地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如此重复着这个机制，就是依靠这个机制他才学得了同性恋。

我们并不是硬要夸大同性恋心理起源（psychical genesis）的这些解释的重要性。显然，它们与为同性恋者申辩的人的正式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以对问题的可能性做出结论性的说明。由于实际的原因，所谓的同性恋或许是由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引起的，我们造出这许多过程中特殊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预测的同性恋的数量。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未知素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整体的同性恋现象通常可溯源于这些未知素质的因素。如果我们没有证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的证据，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探讨我们所研究的同性恋的心理起源①。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详情，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断言不会有重大的错误。根据世代因袭的传说，他是一个性需要和性活动异常减退的人，仿佛一种更高的抱负使他超越了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要。他是否寻求过直接的性满足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有过，那又是怎样的呢？或者，他是否全然不需要呢？无论怎样，我们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种驱使其他男人急需进行性行为的情感趋势。因为我们不能想像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性欲望——力比多的形成中没有一份欲望，即便这种欲望是违反了它的原始目标，或者制止它的实施。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找到比不变的性倾向的痕迹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些痕迹指的是一个方向，使他被当做一个同性恋者看待。人们一向强调他只收那些十分漂亮的男孩或青年做学生。他亲切又体贴地对待他们、照顾他们，当他们生病时便像母亲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护理他们，就像他的母亲照顾他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开撒尔·达·赛斯托、鲍特拉菲、安德烈·撒拉诺、弗朗西斯科·米尔兹等等都没成为重要的画家。他们一般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导师，老师死后，他们便无影无踪了，在艺术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标记。而另一些人，却由于他们的作品能被

① ［同性恋及其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中找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0～1920年间增加的较长的注释（标准版，第7卷，第144～147页）。后来，在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些讨论中，可能提到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心理起源》（1920）和《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

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如陆尼和拜兹（被称为索多玛），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然会遭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列奥纳多对他学生的行为与他的性动机毫无关系，不能从中得出他特殊的性倾向的结论。对此我们愿意谨慎地提出反对，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的某些行为特征，否则它们永远都是秘密。列奥纳多习惯记日记，他完全用手写体写（从右向左），这意味着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以第二人称来记。"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殖。""你请教阿巴克师傅圆怎样变方。"（索尔米，1908，第152页）或者在旅途中："我将去米兰办一些我的花园的事情　　带两件行李。关于车床的事请教伯特拉菲，并请他磨光一块宝石。把这本书给安德烈·伊尔·托德斯柯（Andrea il Todesco）师傅留下。"[1]（同上，第203页）或者在下定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时写道："你必须在你的论文中阐明地球是一颗星，就像月亮或某些类似的东西，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崇高。"（赫兹菲德，1906，第141页）。

顺便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普通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用几个字一带而过，或者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有些奇怪的账目，被所有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引用了。这些账目记的是艺术家所花费的一笔笔数目很小的钱，相当的精细，就像是一位迂腐又吝啬的管家记的。另一方面，没有花费大笔钱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记账的证据。其中有一项与他给他的学生安德烈买的新斗篷有关[2]：

银丝锦缎	15里拉4索多
深红丝绒	9里拉
镶边	9索多
钮扣	12索多

另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是他为另一个学生[3]的不良性格及偷盗习惯而付出的全部费用："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塑马的雕像[4]。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上，杰克莫到我这儿来，他只有10岁。"（边注："偷窃、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请人给他裁剪出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当我用积蓄的钱准备为这些东西付款时，他把钱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虽然我完全可以肯定是他干的，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承认。"（边注："4里拉……"）对孩子的不端行

① 在这里列奥纳多的行为很像那些习惯于每天向另一个人忏悔的人，他用日记作自己的替身，推测这个人是谁，见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367页）。

② 这一段出自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282页）。

③ 或模特儿。

④ 为弗朗西斯科·斯弗尔兹制造的骑马雕像。

为的报告这样絮烦，并以花费的账单结束："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袜子，7里拉；等等。"①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的愿望不是试图从他的微小弱点和怪癖出发来解答他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分析的着重点在于艺术家对他的学生的慈爱和体贴。他们忘了应该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留下了这些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因为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性的证据落到我们手中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必须设想还有另一个动机存在，一个感情的动机导致他写下了这些笔记。如果没有在列奥纳多的记录中发现另一笔账目，我们就很难猜出这种动机是什么，它使得那个学生的衣服等笔记的意义清晰了，我们没想到他会有这个感情动机：

卡特琳娜死后的葬礼	27 弗洛林
二磅蜡	18 弗洛林
运输和立十字架	12 弗洛林
灵车	4 弗洛林
抬棺人	8 弗洛林
4个神父和4个办事员	20 弗洛林
敲钟	2 弗洛林
掘墓人	16 弗洛林
许可证——给官方的	1 弗洛林
	共计：108 弗洛林
先前的花费	
付给医生	4 弗洛林
糖和蜡烛	12 弗洛林
	共计：16 弗洛林
	全部费用：124 弗洛林。②

① 整段见于赫茨菲德的著作（1906，第45页）。

② 米莱茨可夫斯基（1903）。关于列奥纳多的私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中都不足很使人头痛，我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账目也被索尔密引用过（1908年），但却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最重大的一个是用索多代替了弗洛林。可以想见这个弗洛林不是旧时的"金弗洛林"，而是后被使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 $1\frac{2}{3}$ 里拉或 $33\frac{1}{3}$ 索多。索尔密把卡特琳娜当成是一位有时候帮助列奥纳多料理家务的佣人［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数字做过更改。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1919年与1923年是"19"，1925年后是"4"。1925年以前，运输和立十字架的费用是"4"。整个原文，意大利和英译文见理查德的著作（1939），第2卷，第379页］。

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能够告诉我们卡特琳娜是谁？他从列奥纳多的另外两段简短的笔记[①]中推断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方贫穷的农村妇女，1493年她到米兰来看她的儿子。当时她41岁；她在那儿得了病，列奥纳多把她送进了医院，她死时，列奥纳多用这么豪华的葬礼向母亲表达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不能得到证实，然而它所具有的诸多内在可能性，与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所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和谐的，所以我不禁把它当做正确的判断来接受。他成功地让感情屈服于研究的支配并且抑制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是他，被压抑的欲望偶尔也会得到强烈的表达。对他挚爱的母亲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账目中葬礼的费用就是悼念母亲的一次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歪曲得无法辨认了。我们不清楚这种歪曲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它。但是，在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情形中，特别是在广为人知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有这种相同的过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强烈的感情变为潜意识，又怎样转移到细微的甚至是愚蠢的行动中去。这些压抑下的感情的表达被降低到一个人不得不低估它们的强度的程度。但是这个细微的行为表现仍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意识却极力地加以否认的冲动力量，只有像这样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才能解释列奥纳多为他母亲葬礼花费的账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的色彩的感情系在她的身上，就像在童年时代那样。相反，来自后来的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能允许他在日记中为她建立起一座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碑。但是，却必须履行在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所出现的一切。这样，账目就被记人日记，变成后人知识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们把从葬礼账目中所了解的情况类推到为学生们的花费的账单上，似乎并不为过。它们是列奥纳多力比多冲动的点滴残余以强迫的方式和歪曲的形式寻求释放的另一个实例。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与自己男子气的英俊相类似者，便成了他的性对象，就控制了他的性压抑。我们做这样的描绘，他以那种过分详细地记录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数这样一种奇特方式暴露了他的基本冲突。这一点显示出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确实属于同性恋的类型，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这种类型人的精神发展。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了：因为它的意义确实像我们已经对那种类型的人所断言的一样。我们应该给它这样的解释：“正是由于与我母亲有这种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②]

---

① “卡特琳娜于1493年7月16日到达米兰。”“美得惊人的吉凡妮娜到医院看望了卡特琳娜，并询问了某些事情。”

② 在这些表现方式中，列奥纳多受压抑的力比多被允许显示出来，病理性赘述（circumstantiality）和过分关注钱，这些表现方式都是肛欲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见我的《性格与肛欲》（1908b）。



图 2



图 3

第四章

关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我们还没有讨论完。列奥纳多用太直率的使人想起描述性行为的词汇（它一次次地用尾巴撞我的嘴唇①），强调了母子之间性关系的强度。从他母亲的（秃鹫的）活动与突起的嘴的联系，我们不难猜测到还有第二个记忆包含在这个幻想之中。它可以被演绎为："我的母亲无数次地热烈地亲吻我的嘴。"这个幻想是由被母亲哺乳和被母亲亲吻的记忆混合而构成的。

仁慈的自然赋予艺术家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的能力，甚至这些冲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影响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自己意识不到情感的来源。难道在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他记忆中保持的正是他童年时期最强烈的印象吗？人们当然期望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某些东西。如果人们考虑到深刻的转变，通过这些转变，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印象才能够对艺术作品有所贡献，那人们一定会相当谨慎地宣称自己的推理的肯定性，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尤其如此。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微笑，一个立即令人沉醉又使人迷惑的微笑，这个微笑，作者把它凭想像画在他的女性形象的嘴上。这是一个挂在既长又弯的嘴唇上的永恒的微笑，这成了作者风格的一个标志，并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的"②。任何人看了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美丽非凡的脸孔时却会体验到它那最强烈、最困惑的效果。这微笑需要解释，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一个能使人满意。"几乎是经过了4个世纪，蒙娜丽莎仍然使那些久久地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她，迷失于其中，没有定论。"

---

① 见原文第82页注释①。

② ［1919年增注］在这里艺术鉴赏家会想起古希腊雕像中，如爱吉娜雕像的独特的不变的微笑；他也许还会在列奥纳多的老师瓦诺奇奥的画中发现某些相似的东西，所以，在接受后来的争论时有些疑惑。

莫瑟（Muther，1909）写道："对观众特别有魅力的是这微笑的神奇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描绘过这个女人，说她刚刚还那么富有诱惑力地对我们微笑，现在她又冷冰冰地无魂似地凝视着空间。没有一个人能解开的谜一样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读懂她思想的意义。每件东西，甚至风景，都神秘地如梦境一般，似乎都在一种淫荡的肉欲中震颤。"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凝结着两种不同的要素，这一思想触动了一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发现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冲突节制与诱惑之间，最真挚的温情与最无情的贪婪的情欲之间的冲突（那无情的情欲是要消灭男人，好像男人是异己的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下面是孟兹（1889，Müntz）的观点："我们知道，蒙娜丽莎·吉奥孔多在近四个世纪时间里对簇拥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来说，一直是个诱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我借用一位笔名为皮锐·德·考雷的敏感作家的话）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人的本质：柔情与媚态，端庄与神秘的感官快乐，寂寞的心和深思的头脑，一种克制的、仅流露快乐情绪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格罗（Angelo Conti，1910）在卢浮宫里看到一束阳光照射下的这幅画更充满了生机时说："在庄重的宁静中这位夫人微笑着，好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全部遗传，诱惑其他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的仁慈，所有这些都隐现于微笑的面纱背后，隐藏在她诗一般的微笑之中，好的和糟的，残忍的和同情的，美妙的和狡猾的，她笑着……"

列奥纳多在这幅画上花了4年的时间，或许是从1503年到1507，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他使用了精心设计的方式使夫人能愉快地坐着，脸上保持着那个著名的微笑。他当时用画笔在画布上展现的所有微妙细节，在目前状态中的这幅画里已荡然无存了。当它还在绘制之中的时候，它就被认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成就。然而列奥纳多自己对它并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他没有把它交给委托人，并声称这幅画尚未完成，而后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保护人弗朗西斯一世从他那儿获得了这幅画，并把它送进了卢浮宫。

让我们放下蒙娜丽莎的尚未解答的面部表情之谜，来注意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对艺术家来说，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就像对以后400年间所有看到它的人一样强大。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便反复出现在他所有的以及他的学生的画中。由于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肖像，我们就不能设想他由于自己的原因而

在她的脸上加上了一个富于表情的特征——一个并非她自己具有的特征。因此，似乎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他的模特儿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并被深深地迷住了，便在他的幻想中把这个微笑进行了自由创造。例如，康斯坦丁诺娃就提出过这个不很牵强的解释（1907）：

“在艺术家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画肖像所占用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怀着同情感观察了这位夫人面部特征的微妙细节，并把这些特征，尤其是神秘的微笑和奇怪的凝视迁移到后来他所有的绘画或素描的脸孔上了。吉奥孔多特殊的面部表情还可见于卢浮宫中《施洗者约翰》的画里，尤其在《圣安妮、夫人和孩子》[1] 中玛丽的脸上更是清晰可辨。

这种情况还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不止一个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感到有寻找吉奥孔多微笑的魅力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的必要，因为这微笑的魅力是如此使艺术家心动，以至于他一生都无法摆脱。沃尔特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了一种“神采……一种表现了千百年来男人们向往着的富有表情的神采。”（1873）他极为敏感地写道：“略带着某种邪恶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进入了列奥纳多的所有作品。”当他声明了下面这段话时，他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条线索：

“除此以外，这幅画是一幅肖像。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起就在他的梦的结构中有了鲜明的轮廓了。若不是清晰的历史证实，我们很可能想像这个形象就是他理想的夫人，最后在这幅画中被具体化和被看到了……”

赫茨菲德（1906）无疑有些与沃尔特·佩特相似的思考。她声称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中找到了自我，所以，他才能把自己的诸多天性融进肖像之中，“在列奥纳多心中，画的特点全在于神秘的移情。”

让我们尝试着澄清这里的这些见解。很可能是列奥纳多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昔的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遗忘，因为它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不断地给它注入新的表现力。佩特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就可以看到，像蒙娜丽莎那样的脸在他梦中就已经轮廓清晰了，这似乎很令人信服，并能成为可靠的依据。

瓦萨利提出，“笑着的女人头”[2] 形成了列奥纳多第一个艺术努力的主题。因

---

① ［这个题目的德文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意思是《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本文后面涉及到了这幅画，第112页］

② 引自柯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第32页）。

为这段话并没有要证明什么，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点，在肖恩（Schorn，1843）的译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用泥塑造了一些笑着的女人头，后来又用石膏复制了，有些漂亮孩子的头被他师傅当做模特儿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凭着塑造两类对象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两类性对象。如果漂亮孩子的头是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卡特琳娜的副本。我们开始猜想他母亲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的可能性——他曾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深深地被它迷住了①。

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在绘画时间这一点上与《蒙娜丽莎》最接近的是被称为《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那幅画，即《圣安妮·夫人和孩子》。画中最美的是列奥纳多式的微笑，并且很清晰画在两个女人的脸上。想弄清楚列奥纳多是在画蒙娜丽莎之前还是之后多久开始画这幅画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幅作品的创作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想，或许可以认为艺术家是同时创造它们的。如果列奥纳多的身心被蒙娜丽莎的特征强烈地占据，就会激励他从幻想中创造出圣安妮这个形象，那就与我们的预期结果很一致了。因为，如果吉奥孔多的微笑唤起了他脑海中对母亲的记忆，那就容易理解这个微笑怎样使他立即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促使他把在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还原在母亲的脸上。因此我们透过蒙娜丽莎的肖像，把我们的兴趣倾注到另一幅画上，它的漂亮毫不逊色，现在也悬挂在卢浮宫里。

圣安妮及她的女儿和外孙是意大利绘画中极少表现的主题。列奥纳多的处理不同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形式。莫瑟写道（1909，第1卷，第309页）：

"某些艺术家，像汉斯（Hans Fries）、老赫尔宾（Holbein）和吉罗拉莫（Girolamo dai Libri），他们让安妮坐在玛丽身旁，把孩子放在他们两人之间。另外一些艺术家，像雅各布（Jakob Cornelisz）在柏林的画中画的那样，真正画出了"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②。换言之，他们把圣安妮画成抱着形象稍小的玛丽，形象更小的救世主坐在玛丽的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里，玛丽坐在他母亲的膝头，身体向前倾斜着，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玩一只小羊羔，对它似乎有点不和善。外

① 米莱茨可夫斯基作同样的设想。然而他所设想的列奥纳多的童年历史与我们从秃鹫幻想中得出的结论不同。如果像米莱茨可夫斯基说的，这微笑是列奥纳多自己的，传说是不会不表述出这种巧合的。

② 在画中圣安妮是最突出的人物。参见原文第110页注释。

祖母坐着，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面带着极乐的微笑凝视着另外两个人。当然这个组合是受着某种限制的。虽然这两个女人唇际的微笑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微笑一样，却没有了离奇和神秘的特性，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感情和静谧的幸福。"①

当我们对这幅画研究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我们清楚了只有列奥纳多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这画是对他童年时代历史的综合，要考虑到列奥纳多生活中个人的印象，才能理解画的细节。他发现，在他父亲的家里不仅他善良的继母唐娜·阿尔贝拉，而且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蒙娜丽莎（Monna Lucia）也像一般的祖母（我们这样假设）那样温柔地对待他。这些情形能使他想到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在母亲和祖母的照料下的童年生活。这幅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一定是一位主妇，在画中她应该被塑造得比圣母玛利亚更成熟、更严肃一些，但她却被塑造成一个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事实上，列奥纳多给了男孩两个母亲，一个向他张开双臂，另一个在背景中，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般的快乐的幸福微笑。这种独特性使得评论这幅画的人们都感到吃惊，例如莫瑟认为列奥纳多横不下心来画有皱纹的老年人。由于这个原因，圣安妮被画成了容光焕发的美女。然而，我们是否满足这个解释呢？另外一些人（寄希望于）却否认母女之间年龄上的相似②。但是莫瑟的解释试图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样年轻是来自于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与画中的情景异常准确地相似。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至五岁期间，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这个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事实与上面提及的那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③ 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特征，即外祖母，不仅在外形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与他原先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相符。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着这个不幸女人感觉到的忌嫉，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的妒嫉，就像她

---

① 康斯坦丁诺娃（1907，第 44 页）："玛丽向下注视着她的宠儿，内心充满感情，她脸上的微笑使人想起吉奥孔多的神秘表情。"（同上，第 52 页）在另一段里，她说到玛丽："吉奥孔多的微笑显现在她的特征中。"

② 参见温·塞德利兹的著作（1909，第 2 卷，第 274 页。）的注释。

③ 圆括号里的话是 1923 年增加的。

曾经放弃了孩子的父亲一样①。

就这样，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即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微笑唤醒了长大成人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

① [1919年增注] 如果要把画中的圣安妮和玛丽从形体上分开，并画出每一个人的轮廓，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人们会说，她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梦中的紧紧地融为一体的人物一样，因此在某些地方很难说出圣安妮结束在哪里，玛丽在哪儿开始。但是，在一个批评家眼里[1919年版本里："在一个艺术家的眼里"]，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构图的缺陷，而用分析家的眼光看来，由于对其内隐的意义的说明被证明是对的，对艺术家来说似乎他童年的两个母亲化为一个了。

[1923年增注]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把卢浮宫中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与著名的伦敦草图进行比较，同一素材被用于不同的构图形式。（见图2）在这儿，两个母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们各自的轮廓更难辨认清楚，所以，批评家们不得不说："好像两个头长在一个身体上。"

大多数权威一致认为伦敦草图是更早些时候的作品，他们把草图创作的时间估计在列奥纳多住在米兰的第一个时期（1500年以前）。相反，阿道夫（Asdolf Rosenberg）把草图看做是同一主题的更晚、更成功的构图（1898）；随后，安东（Anton Springer）认为它的创作时间甚至晚于《蒙娜丽莎》。假如草图肯定是早些时候的作品，那它就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了。当反向推理不成时，便不难想像卢浮宫中的画是怎样由草图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把草图的构图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就能看到列奥纳多感到多么需要打开两个女人梦一般的融合（这个融合是那么符合他童年的记忆），并且在空间上把两个头分开。这个情形的发生如下：他把玛丽的头和上半身从两个母亲的整体中分出来，并且上身向下弯去，为了给这个移位提供出理由，小耶稣不得不从她的膝盖上下来站到地上。这样，就没有小圣约翰空间了，他被羊羔代替了。

[1919年增注] 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对卢浮宫里的这幅画有一个杰出的发现，这个发现有无法否认的影响，尽管有人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纳它。在玛丽巧妙的、显得凌乱的衣着中，他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他把它作为潜意识的画谜来解释："画中代表着艺术家母亲的秃鹫——母亲的象征，是完全清晰可见的。"

"蓝色的衣料围在前面女人的臀部并顺着她的大腿和右膝盖伸展，这样人们就可以看见秃鹫那独具特色的头了，它的脖子和急转弯处是其身体开始的地方。任何一位观察家对我的这个小发现几乎都不能否定这个画谜的证据。"（普费斯特，1913年，第147页）。

在这一点上，我能肯定，读者不会不认真看附图，试试自己是否能发现普费斯特所说的秃鹫的轮廓。这块蓝色衣料的边缘即是画谜的界限，在这件复制品中，浅灰色的田野衬出浅黑色的衣服，在浅黑色的衣服上，蓝色的衣料格外明显。（见图3）

普费斯特继续他的描述："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画谜延伸到哪里？如果我们顺长长的衣料看，在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的就是画谜，我们注意到了，从翅膀的中间开始，它的一部分垂到女人的脚上，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的一个肩上和孩子身上。前面的部分多少代表了秃鹫的翅膀和尾巴，很自然的样子；后面部分可能是突出的肚子，当我们特别注意到像羽毛轮廓的线条时，鸟尾巴是展开的，尾巴的最右端，正像列奥纳多童年时期的梦中一样，伸向孩子的嘴即列奥纳多的嘴。"

作者继续十分详尽地检查这个解释，讨论它显示出的难点。

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夫人和贵族太太就被画成卑微地低着头，脸上挂着卡特琳娜那种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自己杰出的儿子带给这个世界，命中注定了他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忍受痛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无限温柔的许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真实地保持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出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渴望新的爱抚。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足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后来成长着的孩子的爱更为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①]。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抗衡的开始，这种抗衡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

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他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这妨碍他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

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是他亲自这样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类型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美丽的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以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性生活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

① 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23页。

第五章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有一条记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是由于该记载的重要性和一个小的形式上的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1504年7月9日，星期三的7点钟，瑟·皮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的公证人、我的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有10个儿子和两个女儿。"①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笔记说的是他父亲的死。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死亡时间的重复，7点钟给出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结束这个句子时忘了他在开头已经写过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任何一个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不会重视它，甚至注意不到它，即使是注意到了，他可能会说任何人在那个"分心"（distraction）或者情感体验强烈的一刻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的想法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以至于不能作为隐藏精神过程的现象。他一向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种情况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且恰恰是"分心"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中的冲动，并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段笔记像卡特琳娜葬礼的账目和给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说明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不成功的，某些事情长期被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有着学者式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②。

这类重复我们称之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现感情色彩的极好的方式。例如，回忆一下圣彼得在但丁的《天堂篇》中为反对他那在人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而进行的长篇激烈的演说：

>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
> 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
> 儿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
> 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③

---

① 此段话原文用的是意大利语。孟兹（1899）后来在注释中用英文把它们译过来了。

② 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中把他父亲的年龄不是写成77岁，而是写成了80岁，我暂且在这里先不谈他的这个大错误。

③ 但丁《神曲》（王维克译），第27章，第22～25行。——中译者

若没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抑制，笔记中的这段记录可能会这样写："今天7点，我的父亲去世了——瑟·皮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他做的这份死亡报告中，持续性言语转到了最不重要的细节上，父亲死亡的时间，这剥夺了记载中的全部情感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掩盖着的和被压制着的东西吧。

瑟·皮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而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成功。他结了四次婚。前两个妻子都没生孩子就死了，只是到了第三个妻子，在1476年，才给他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这时距他把父亲的房子改成他师傅瓦罗奇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父亲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时，已经50多岁了，这个妻子给他生了9个儿子和两个女儿①。

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他性心理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仅反映在男孩童年初期父亲的缺失这一消极因素，而且也反映在童年生活的后一阶段父亲出现这一直接因素上。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并在想像中把自己等同于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过父亲获得优势当成自己的任务。当不到5岁的列奥纳多被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必然取代了那个与他感情密切相联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肯定发现了他处于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中。像我们所了解的，赞成同性恋的决定通常发生在青春期那几年。当这种决定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达成，他的父亲认同作用对他的性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的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虽然瓦萨利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美感，我们认为这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模仿和要超越父亲的因素。对可怜的农村姑娘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儿子亦不断受刺激向往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并要"胜过希律王"②，展示给他父亲一个看起来真正的高贵绅士。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奥纳多的父亲认同作用是一种对他的画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然后就不再关心它们了，就像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一样。在这种强迫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强迫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修正那些被压抑的和保存于潜意识中的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晚些的时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个显贵的绅士、资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他手中掌握着艺术家的命运。

---

① 列奥纳多在他日记的这一段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进一步的错误，即在他的兄弟姐妹的数目上的错误，与这段值得注意的精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② (英文原著中有这最后3个字)

列奥纳多找到了被人们称为摩洛工业的斯弗尔兹做自己的保护人。斯弗尔兹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方面异常精明，但他有怪僻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在他米兰的宫廷里，列奥纳多为斯弗尔兹服务，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列奥纳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和斯弗尔兹的骑马塑像足以证明。在斯弗尔兹遭受劫难以前，他就离开了米兰，后来斯弗尔兹死于法国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一件被完成。"[1]显然，他指责他的保护人的这句话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想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的情形负责。从事实上看，他对这位公爵的指责并不错。

如果说作为艺术家对他父亲的模仿是无益的，那么早在童年时期他对父亲的反抗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同样能获得杰出的成就。米莱茨可夫斯基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明喻（1903）：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这时其他人都还睡着呢！他还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并且所有的独立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断言的正确性："一个人当出现不同观点，求助于权威时，那这个人不是用理性工作，而是用记忆工作。"[2] 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也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只通过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胆量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指出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只是重复着一面（one-side）的观点，并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观点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概念转到个人的具体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和权威仅与他的父亲相呼应，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哺育了他的温柔、慈善的母亲。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如此强烈地需要来自某类权威的支持，以至于那个权威受到了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崩溃，这一点今天与原始时期是相同的。只有列奥纳多能够免于这种支持，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形下生活，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才有他后来的大胆的、独立的科学研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到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就成了排斥性成分的延续的探索。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童年的最早期[3]就摆脱父亲的恫吓，并在他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束缚，而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这与我们希望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

---

[1] 塞德雷斯引用过这段话（1909，第2卷，第270页）。

[2] 索尔密引用过这句话（1910，第13页）。

[3] ［"最早期"是作者1925年增加的］

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父亲。每天我们都在获得有关这点的证据：一旦当父亲的权威在年轻人心里破除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宗教需要扎根于父母情结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说是关于父母的概念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再生。按生物学的观点来讲，宗教应溯源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他在以后生活里的某一日，知觉到在生活强大的力量面前他是怎样的弱小和没有指望，感觉到自己的情形与童年时一样，就试着用回复那种保护了他婴儿时期的力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宗教把对精神病的预防赐于信仰宗教的人，这种预防很容易得出解释：个人的罪疚感和人类的罪疚感都源于父母情结，宗教启动了这个情结，并通过它来解决罪疚感，而不信教的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①。

列奥纳多的实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观点并没被误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说背叛基督教（那时二者是一回事）。关于这些在瓦萨利（1550）为他写的第一本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瓦萨利在他的《生活》第2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论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列奥纳多甚至在笔记本上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圣经》中创世的描写引向最小偏差的歧途。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成千上万年的期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比现代人毫不逊色。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肯定会触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例如，“关于对着圣徒们的肖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全无察觉，睁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人说话，人们跟他们交谈，却没有得到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的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赐；人们为瞎子点灯。”（赫茨菲尔德，1906，第292页）

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悼念”。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无数的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的观点我们已经有过描述。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把它们与教会之间联系的最后残迹除去，并赋予它们人生，把人类伟大而美好的情感通过它们表现出来。莫瑟称赞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快乐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在那些显示出了列奥纳多是怎样倾心于大自然奥秘的研究笔记中，总会有些段落表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奥秘的最终源泉的赞美；但是没有什么话语表明他愿意与这个非凡的力量维系任何的个人关系。他晚年的一些深刻睿

① 最后这一句是1919年增加的。这一点，在弗洛伊德1910年致纽伦集会议的信中提到了，又见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最后一章，标准版，第18卷，第142页。

智的见解流露出他乐于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且不期望自身的痛苦从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中得到解脱。毋庸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背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那些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童年时期最初的探索中，也涉及到了性欲问题。的确，通过把对热切希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特殊境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把这境况泄露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有关鸟儿飞翔的十分模糊的记述，似乎是一种预言，极好地表达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他醉心于如何模仿鸟的飞行技术来取得成功："伟大的鸟的第一次飞行将从'大天鹅'的背上开始，它会使整个的世界为之震惊，使所有描写它的文章给它赞誉，它给自己的诞生地带来永恒的光辉。"[①] 他可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能实现愿望的梦里了解到巨大的幸福来自于愿望的实现。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都会梦到自己能够飞呢？精神分析学这样回答的：飞翔或者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乔装打扮，这比梦见无论是词还是实物的一座桥，都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希望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们常告诉爱提问的孩子，婴儿是由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生殖器形容成有翅膀的；当我们得知，男性的性活动在德语中最通常的表述是"vögeln"［德语的鸟是"Vogel"］；在意大利语中男性器官实际上被称为"l'uccello"［"鸟"］所有这些都只是有联系的整体思想中的片断，从这个思想中我们明白了，梦中期望能飞只能被理解为渴望性行为[②]。这是婴儿早期的一种愿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似乎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时他尽情欢乐，对未来不做任何打算，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样羡慕孩子们。但是，如果孩子们能亲自告诉我们一些早期的信息，也许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不是幸福快乐的诗歌，只是我们在回忆中歪曲了它。正相反，经过几年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受到要长大的愿望驱使，要做大人的事情。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无论怎样，孩子们在自己性研究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重要的范围内，有些事很神奇，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也不让他们知道。这使他们充满能做那样子的强烈渴望，他们梦到它正在飞翔，或者他们准备着把经

---

① 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32页）；"大天鹅"似乎是指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叫蒙特·西西里的小山（西西里在意大利文中是"天鹅"）。

② ［1919年增注］这个记述依据波尔·费德恩（Paul Federn）和毛利·伍尔德（Mourly Vold 1912）两位挪威科学家的研究，伍尔德与精神分析学没有关系［也参见《释梦》（1900）标准版，第5卷，第394页］。

过伪装的愿望放到以后的梦里去。因此，最终在我们的今天实现了航空，这同样可以找到在婴儿性欲方面的根源。

列奥纳多向我们承认，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以特殊的和个人的方式专心于飞行问题，他也给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指向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对现时代的儿童进行研究所应得到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但恰恰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童年起直到他智力完全成熟，基本相同的题目——只是在意义上稍有变化——始终吸引着他。他所渴求的技艺很可能在机械方面是无法达到的，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或许他在这两方面的渴望都受到了挫折。

的确，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一生中不止一个方面保持孩子般的特点，据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必然保留着某些儿童的天性。甚至当他成人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便是他为什么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难以理解，显得古怪的另一个原因。只有我们对他为宫廷里的节日及盛大宴会制造极为精致的机械玩具感到不满，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艺术家把他的精力用于这样的琐事。他自己却好像显得很乐于这样支配时间，因为瓦萨利告诉我们，甚至在没人委托他做这些事时，他就已经制造了类似的东西："那里（在罗马），他得到了一块软蜡，并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便会飞起来，而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就落回到地面。贝维迪尔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特别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颤且启动。接着，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嘴角并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①。这种具独创性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经常把羊肠很用心地清洗得非常干净，可以把它们拿在手里，有时把它拿到一个大房间里，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羊肠系在鼓风机口，往羊肠里打气，直到胀开的肠子占满了整个房间，使人们不得不到角落里。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明了羊肠是怎样逐渐变得透明的，并充满了空气。最初，羊肠只占一个小空间，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做天才。"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他的寓言和谜语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幽默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富于思想的，情趣的缺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列奥纳多具有想像力的游戏与恶作剧的某些情形中，使得那些在这方面误解了他的性格的传记作家误入了歧途。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语手稿中有些是致"索里奥（地名，即叙利亚）的道达里奥、巴比伦王国总督圣苏丹"的信的草稿。他在这些稿子中谈到了自己被作为工程师派到东方的某些地区去实施一些工

---

① 见肖恩翻译的瓦萨利的著作（1843，第39页）。

程，他为有人说他懒惰做了辩护，他提供了那里的城市和山区，小镇的地形图，并且还讲述了他在那里时所发生的一个重大的自然现象①。

1883 年，里希特试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苏丹期间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按这种观点，应该是 1483 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对那里进行了访问，即他住进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然而，另一些聪明的作家毫不费力地发现，列奥纳多的所谓东方旅行只不过是年轻的艺术家想像力的结果。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消遣，也表达了他想周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另一个关于他创造性想像力的例子，可能是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被发现的，作品中有五六个象征性符号，互相之间以极为复杂的形式联结着，其中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②。瓦萨利提到了这些设计，却没提及研究院。孟兹用其中一个作为他的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封面设计，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能，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龄消失了；可能，这种游戏使他发现了进人研究活动的途径，这种研究活动表现出了他的个性最终、最高的发展。但是，只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高的、却无法再得到的性快乐，那他挣脱与童年的这种联系的过程必将非常缓慢。

---

① 这些信及相关的各种问题见孟兹的著作（1899，第 82 页以下），真正的原文和其他有关的注释可以在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 233 页以下）中找到。

② 肖恩（1843，第 8 页）的著作中谈到："甚至他花了一些时间画绳结，顺着绳结的绳头到另一头，直到我们可以看到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图。这类非常复杂漂亮的设计被刻在铜板上；在它们中间能够读出'列奥纳多的芬奇研究院'的字样。"

第六章

蔑视这样的事实是无益的！今天的读者觉得所有疾病的来历都很使人厌恶。他们抱怨说审查一个伟大人物的病历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一种无用的、不恰当的做法，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容易被发现等，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厌恶。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以致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借口和伪装来理解。审查病历的目的根本不是想使这个伟人的成就变得无法理解，人们肯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想要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但反对的真实动机与此不同。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们审视他们的主人公的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在心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开始他们就感到对自己的主人公会特别喜爱，所以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这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放进他们所设计的婴儿模式中，还在于在他身上恢复孩子对父亲的理想。为满足此心愿，他们除去了主人公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消除了他一生中与内外抵抗斗争的印记，他们不允许他有人类的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冷酷的、陌生的和理想化的人物，来取代我们感到与我们有着遥远关系的那个人。这样，他们为了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放弃了深入人类本性的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十分令人遗憾①。

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妨碍人们试图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及谜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为了要找到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向他致敬。假如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付出牺牲，假如我们把那些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惨痛烙印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我们从没把列奥纳多当做一个神经症者，或者如那些拙劣的语词所称是“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抗议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胆大包

① 这种批评可相当普遍地运用，但目标却不能是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

夫，居然使用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其实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明智地抛弃了的偏见。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健康与疾病（illness），正常人与神经症人之间不再有显著的差别，并且神经症特征不再一定是普通低级的证据。我们也知道了神经症症状是一种结构，它代替了某种压抑的结果，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会产生这种代替结构，只是其数量、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的概念，推断素质低劣的存在。从我们所了解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与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症类型很相似。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沉思"（obsessive brooding）进行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了解的"意志缺失"（abulias）加以比较。

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的性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据此，我们应该概述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方面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对他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和干扰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时为止。只有他母亲向他敞开心灵，给他温情的诱惑，他是他母亲惟一的安慰。他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地达到性成熟。有一个现象能肯定地证明，他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那就是他所进行的婴儿性研究的强度。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被童年早期的印象最强有力地刺激着，嘴的性感带（erotogenic zone）得到了强化，此后从没放弃过这种强化，从他后来夸大了对动物的同情这种相反的行为，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阶段并不缺少强烈的施虐狂特性。

一个强有力的压抑的高潮结束了这个童年时期的过分的行为，并形成了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在青春期变得明显了。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结果是每一种原始的感官活动都受到了回避，这使得列奥纳多在禁欲中生活，并给人以"无性人"的印象。当青春期的刺激像洪水一样冲击着男孩时，这种冲击却没能迫使他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和有害替代结构而令他患病。因为过早地倾向于性好奇，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性本能需要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求知，因此逃避了压抑。只有很小一部分力比多继续给予性目的，它代表了一个发育迟缓的成年人的性生活。因为他对母亲的爱被压抑了，性目的不得不采取同性恋的态度，用对男孩子们理想的爱来表明性的存在。对他母亲的固恋及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温馨记忆的固恋继续被保持在潜意识中，但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之中。在这种方式中，压抑、固恋、升华都在性本能对列奥纳多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时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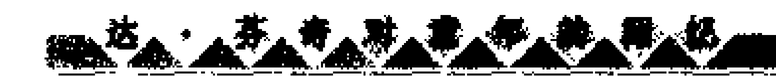
列奥纳多从童年的微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源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视淫本能的早熟觉醒所加强。如果不是能力所限，我们最乐于描写艺术活动是怎样来自于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

足于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一种发泄，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怀疑这个事实。在列奥纳多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指出来自于瓦萨利的研究资料（上文中）：笑着的女人头和漂亮的男孩。换言之，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的艺术努力中是值得注意的。列奥纳多在青春时期的工作之初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生活中的外部行为是模仿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在米兰这样度过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在那里命运有幸使它在洛德维克摩罗公爵的身上找了父亲的替代者。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几乎全部的真正性生活的压抑都不能给升华了的性倾向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由性生活决定的模式发生效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开始下降，他那谨慎和拖沓的倾向作为干扰因素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倾向影响了他的技巧，因而对其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作用。渐渐地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个过程只能比做神经症者身上的退行（regression）。他在青春期变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在婴儿早期就已决定了的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让位给最初的升华（科学），当第一个压抑到来时，升华的时机就成熟了。当他成为一位研究者时，最初仍然为他的艺术服务，到后来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由于他的保护人，父亲的替代者的失去，他的生活笼罩着一种阴暗的色彩，这个退行的手段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①]，这是一位与德斯特伯爵夫人有书信往来的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他被过去了的婴儿时期控制着。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似乎包含了一些显出潜意识本能的活动，永不满足、持之以恒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点。

当他刚刚50岁的时候，亦正值其生活的巅峰时期，在这个年龄妇女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而男人在这个年龄力比多经常会有更加旺盛的发展——一个新变化向他袭来。他的最深层的心理内容再一次活跃起来，这有利于他的艺术，当时他的艺术正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他遇到了一个唤醒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快乐又幸福的微笑的记忆的女人，在这个苏醒了的记忆的影响下，在他艺术努力开始时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恢复起来了，那时他也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他画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和一系列以神秘的谜一般的微笑为特点的画。在他最早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体验到了再一次征服艺术中的压抑的欣喜。在我们的眼中，这个最后的发展，在逼近的老年的隐蔽下显得很模糊了。在这之前，他的智慧翱翔于世界构想的最高实现，这个最高实现远远地超出于他生活的时代。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已经呈现出了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列奥纳多的发展过程的图景，提出了他生活中的这些细节，解释了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

① 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1页）。



的摇摆。假如因为我的这些叙述，激起了对我的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认为我仅仅是写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我将回答说，我远没有过高地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我像其他人一样，受这位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驱使，在他的天性中人们发现了只能用如此鲜明的抑制来表达自己的强大的本能激情。

然而，无论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能停止对它作精神分析解释的努力，甚至我们能完成一种新突破。我们必须用通常的方法，在传记领域中界定出精神分析学所能取得成绩的限度。否则，每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失败摆在我们眼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控制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活的历史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情况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一对象被记叙过的反应。在心理机制知识的支持下，努力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在他的反应力量上的动力学基础，揭示他的心理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转变与发展。如果这样是成功的，在他生活过程中的个性行为就能在性格和命运、内外力量的结合中得到解释。假如这样做不能提供任何的肯定的结果，这就可能——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是如此——不该指责为精神分析学的错误或方法不适当，而在于与列奥纳多相关的资料不准确、不完整，用传统的方法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此。所以，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因为精神分析学被迫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最大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之后开始的性压抑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当童年第一次性满足之后，这个压抑不再发生了。在另外某些人身上，它可能不会发生，或在极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地，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压抑这个高潮的结果，是惟一可能的结果。可能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使大部分的力比多免于受压抑。在相同的影响下，或许一个人会承受对其智力活动的永久性挫伤，或者试图控制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即他那十分特殊的压抑本能的倾向，及他升华原始本能的卓越能力。

本能及本能的转变在精神分析学的界限内是可能辨别的，在这一点上它被生物学研究代替了。我们必须寻找在压抑倾向的源泉中的性格在生理基础上的升华，心理结构只是后来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上的。因为艺术的天赋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无法解答的。

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与女性的素质混为一体的结果，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英俊的体形及他的"左利手"，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①。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便精神分析学没有阐明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的事实，至少提出了它的那些现象和我们对那些现象理解的限度。似乎只有具备了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忧伤的命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能达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一个人能否接受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发现是"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②。这个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非法出身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同意这样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认为偶然性对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一种虔诚的宇宙观（view of the Universe），当列奥纳多写"太阳不动"时，他就在克服这种观点了。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每一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我们自身起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始。不过，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与我们的愿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我们都仍然表现得太少尊重自然（在列奥纳多的晦涩的话语里，能使人忆起哈姆雷特的诗句）。列奥纳多说："自然中充满了无数的'原因'，它们永远都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③

作为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只能与这些自然力量的"原因"的无数实验中的一个相符合，在这个实验中，它们（原因）走进了我们的经验。

---

① 无疑这是暗指弗洛伊德深受其影响的弗利斯的观点。参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标准版，第7卷，第216页。然而，在"双侧对称"的特殊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参见英文版第59页注释①。

② "恋亲丛"系精神分析术语，与"双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内涵相同。指以母亲或众亲为核心的爱恋性的心理情感，亦即子女对异性父母的忤恋，包括"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中译者

③ 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11页）［似乎是暗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名言：天国人间事真多，荷拉提奥，比你在哲学梦想中的还要多］。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1914*)

孙庆民
乔元松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 本文最早匿名发表于 1914 年《意象》杂志第 3 期，文章之前有这样一段编者按语：严格说来，尽管这篇文章不符合本刊接受稿件的条件，编辑还是同意刊登，因为编辑知道，作者属于精神分析学派这个圈子，而且作者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方法。

按 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创造的摩西（Moses）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文中提出艺术作品打动人以后的奥秘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在观众心中唤起与之同样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品质。同时指出，在艺术品的欣赏中对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的注意和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文对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我或许应该立即说明，在艺术上我可不是什么鉴赏家，只是个外行而已。我常常发现，艺术作品的题材比其形式及技巧对我更具吸引力，尽管艺术家们认为艺术品的价值首先且主要在于其形式和技巧的质量。我没有能力恰当地去赏析艺术品所采用的各种表现手法及获得的艺术效果。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得到读者的谅解，以允许我在此做一番艺术欣赏方面的尝试。

然而，艺术品确也给我以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和雕塑作品，绘画作品的影响相对弱一些。当我凝视着这些艺术品时，我总要在它们身上花费好多时间，试着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即扪心自问这些艺术作品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的。每当我做不到这一点时，譬如在音乐方面，我几乎得不到任何乐趣，我的理性（或分析）思维倾向使我无法被什么艺术作品感动，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成为这个样子的。

这使我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的事实：正是那些宏伟壮观、雄踞人寰的艺术创作却对我们形成了难以理解的幽幽之谜。我们赞美它们，我们被这些艺术珍品所征服，但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向我们呈现了什么。我读书不多，不知道是否已有人论及这个现象；极有可能某些美学家已经觉察到，这种智性上的困惑是一件艺术品要达到它极致效果的必要条件。在我，是极不情愿相信这种必要性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艺术鉴赏家和艺术爱好者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美这些艺术品。在我看来，他们能言善辩得很。但在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面前，他们往往各执己见；而对那些谦虚好问的仰慕者所提出的需要解释的问题，他们却都缄口无言。我认为，那如此强有力地吸引了我们的正是艺术家的意图（intention），为此他在其作品中成功地注入这种意图并使我们领会这一意图。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件仅仅靠智力能够理解的事情；作者的目的是在我们心中唤起与他相同的情感态度，同样的心理品质，正是这种心理品质在他身上产生了创作的动力。为什么艺术家的意图不能像其他精神生活的东西那样，用语言交流，用语言理解呢？也许，就伟大的艺术作品而言，不运用精神分析法就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作品确实有效地表达了艺术家的意图和感情活动，那么作品本身就一定得这样分析。当然，要弄清艺术家的意图，我必须首先找出他作品中所表达的意思和内容；换句话说，我必须能够解释这件作品。因此，艺术作品可能需要解释，只有诠释了作品，我才能够知道我为何被它如此强烈地感染着。我甚至冒昧地希望，作品的魅力不会因为我们对它进行的一番分析而减损。

我们来研究一下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王子复仇记》吧，这部剧作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①]。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精神分析文学，并接受了它的观点，即

① 第一次上演可能是1602年。

只有当悲剧素材被追溯到恋母情结（Oedipus）这一主题思想时，莎剧的感染力之谜才能最终得以解开。但在这种追溯完成之前，百口不一、针锋相对的解释不胜枚举（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64～266页）。关于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剧作家的用意的猜度更是五花八门！莎士比亚是代表一个病人，一个弱者，还是代表一个于现实无益的理想主义者来要求我们的同情的？许多这样的解释丝毫不能打动我们！ 它们对于戏剧的效果什么也没说，反让人觉得该剧的魅力只在于其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瑰丽。然而，正是这些诠释恰恰说明：我们有必要在该剧中寻找另外的某种力量源泉，难道不是吗？

在这些令人费解的精湛的艺术品中，还有一件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像《摩西》，它保存在罗马维科里的圣皮埃特罗教堂里。众所周知，这座雕塑只是教皇巨大陵墓的极小一部分[1]，原本是艺术家为至高无上的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树立的。每当读到称颂该雕塑的话，诸如它是"近代雕塑之冠"之类（格林，1900，第189页），我总是十分高兴。因为没有一件雕塑作品能像这尊摩西像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有许多次我沿着被人冷落的科尔索加富尔那陡峭的石梯来到寂静的广场，被遗弃的教堂在那儿茕茕孑立，试图在那儿承受摩西这位英雄愤懑的目光。有时，我谨慎小心地从阴森的教堂踽踽而出，仿佛自己也是他所怒视的暴民中的一员 这些暴民既无信仰又没涵养，一旦重获幻想中的偶像便欣喜若狂。

但是，我为什么把这座雕像称之为令人费解的艺术品呢？毫无疑问，塑像表现的是摩西，犹太人的法规制定者，手里拿着刻有《十诫》的律法书（法版）。这是完全肯定的，不过也仅仅如此。就在1912年，一位艺术评论家马克斯·索尔兰特（Max Sauerlandt）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件艺术品像这位头上长角的摩西一样，遭到如此众说纷纭的评判，仅是对这个人物形体的解释就出现了正反两种说法……"依据5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2]，我将先研究与摩西这一形象有关的疑惑：在这些疑惑的背后隐藏着理解这件艺术品的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揭示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困难的。

---

① 根据亨利·汤德（Henry Thode，1908，第194页）的说法，这座雕像建于1512～1516年间。

② 亨利·汤德：《米开朗基罗：对其作品的批判研究》（1908）。

第一章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呈坐姿；他的身体朝着正前方，脸上有茂密的大胡子，头扭向左边，右脚放在地上，左腿抬起，仅有脚趾触地。他的右臂一端抵在《十诫》律法书上，另一端摸着胡子；左臂放在大腿上①。若要我更加详细地描述他的姿态，那就必须先说说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各类作家对这座雕像的描述竟是那样出奇地失当。他们对自己不懂的地方进行了不准确的描述。不理解的东西也就是不能准确地感知和复现的东西。格林（Grimm，第 189 页）描述道：他“右臂放在律法书上”，右手“握着胡子”。（1900 年）吕布克（Lübke，1863，第 666 页）说道：“他深受震动，右手抓住蓬松飘逸的美髯”。斯普林格（Springer，1895，第 33 页）说：“摩西左手按在身上，右手似乎下意识地插进那卷曲的大胡子。”贾斯蒂（Justi，1900，第 326 页）认为，他的右手手指摆弄着胡子，“就像现代人激动时摆弄表链一样”，蒙知（Müntz，1895）也强调这种摆弄胡子的姿势。汤德（1908，第 205 页）谈到“右手拿着律法书紧贴于肋部，显出一副沉着、坚定的神态”。与贾斯蒂和博伊托（Boito）不同的是，他甚至连右手呈现的激动的迹象也没看出来，哪怕是在右手上。雅各布·伯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1927，第 634 页）抱怨道：“手一直握着胡须，这种姿态一直保持在这位巨人将头转向另一侧时。”雅各布·伯克哈特批评说，“那条健美的左臂实际上只起到把胡须压在身上的作用。”

既然各人的描述有如此差异，那我们遇到关于雕像五官的不同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觉得，对摩西的面部表情，还是汤德（1908 年，第 205 页）描绘得最为准确。他从塑像上感觉出“一种愤慨、痛苦、蔑视掺杂在一起的表情——紧锁的眉头表现出愤怒，目光中饱含着痛苦，而轻蔑则表现在突出的下唇和下撇的嘴角”。但别的仰慕者肯定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件雕像作品的。比如，杜帕蒂（Dupaty）就认为“他那威严的眉毛犹如透明的面纱，正好将其非凡的思想半遮半

① 见本书插画。

掩"[1]。另一方面，吕布克（1863，第666～667页）却声称："如果你想从他头上看出超常智慧的迹象，那只能徒劳；他的下弯的眉毛并不能表示什么，顶多不过是说明他有无比的愤怒和冲天的蛮力。"吉罗姆（Guillaume，1876，第96页）对摩西面部表情的解释与上述几种相去更远。他说在摩西面部没看到任何情感，"仅有一丝傲气，一股尊严，一线信仰。摩西的眼光洞察到人类的前途，预感到他的子民将不断繁衍生息，他的律法将永恒不变。"蒙知（1895，第391页）也认为，"摩西的视野远不止人类的范围，他能看到只有他的目光才能到达的神秘世界。"在斯坦曼（Steinmann，1899，第169页）看来，这位摩西确实已"不再是威严的立法者，不再是罪恶的劲敌，不再带有耶和华的疾愤，而是一位永恒的伟大的神父，仁慈而有先见之明，额头上反射出永恒之光，向他的人民做最后道别。"

还有人甚至认为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根本就无足称道，而且他们对此直言不讳。一位评论家在1858年的《评论季刊》（第103期，第469页）上写道："从总的构思来说雕像缺乏意义，这使整个作品失去了灿烂的光辉。"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人甚至认为摩西不值得崇仰。不仅如此，他们对他产生反感，并抱怨他的形象凶恶，头颅造型极似动物。

那么这位艺术大师是否真的在这块石头上刻画出这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图像，以致招来如此众多的不同解读呢？

不管怎样，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它把第一个问题也包含在内。米开朗基罗是想在这个摩西身上创造出"对性格和气质永恒的研究主题"，还是想把摩西一生中某一特定的时刻，或者说，最有意义的时刻塑造出来？大多数评论家同意后一种可能性，并且能够告诉我们，艺术家把摩西一生中的什么时刻镂在大理石上，以使之永世长存。这个重要时刻便是，摩西从西乃山上帝那里得到恩赐的《十诫》（法版），然后走下山来。这时他发现他的人民恰好正在围着自铸的一个金牛犊起舞欢庆。正是这个场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正是这个场面唤起他脸上所呈现的那种种表情——再过一刻这些情感就将化做他猛烈的行动。米开朗基罗抓住了人物这最后的犹豫瞬间，即暴风雨前的平静，来进行艺术塑造。在下一个瞬间，摩西将一跃而起——他的左脚已从地上抬起——把《十诫》摔在地上，向他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民大发雷霆。

在支持这种解释的人们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个人见解。伯克哈特（1927，第634页）写道："雕像所表现的那一刻，摩西可能看到人民对金牛犊顶礼膜拜，正欲起身。他的形象由于一个即将爆发的猛烈行动而极富生机，而他所特有的非凡体力又使我们心惊胆战地等着该行动的发生。"

吕布克（1863年，第666页）说："仿佛就在此刻他那炯炯的目光正直视人们

---

[1] 引自汤德，同上书，第197页。

对金犊礼拜的罪孽，他心潮澎湃，荡击全身。震惊之下，他右手抓住飘动的美髯，似乎想稍稍控制一下自己的行动，以便在下一个瞬间让怒火更加势不可挡地喷发出来"。

斯普林格（1895，第33页）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提出了一个疑虑，这一点疑虑在本文的后面将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性情刚烈的主人公内心极不平静，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汹涌的激愤……于是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相信雕塑表现摩西当时看见以色列人对金牛犊顶礼膜拜，正要愤怒地跳起来的那一刻。确实，这种印象很难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相符，因为摩西这个形象和其他五尊位于教皇陵墓上方的坐像一样，最初只是想制造一种装饰效果。但这种印象却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艺术在摩西这个人物身上所要表现的活力与个性"。

有一两位作家，虽未真正接受这种金牛犊论，却对其主要观点持赞同态度，即：摩西正要跳起来，采取行动。

根据格林的说法（1900年，第189页），"摩西这个形象充满了威严、自信，仿佛天下惊雷都要受制于他，不过在愤怒雷霆暴发之前，他尚在控制自己，他要看看他想要消灭的仇敌是否胆敢向他进攻。他坐在那儿，似乎就要站起来，他那高傲的头颅从肩膀上昂起；右肘压着《十诫》，右手抓住波浪般飘洒在胸前的胡须，他的鼻孔大张，即将脱口而出的语言仿佛冲击着他的嘴唇"。

希思·威尔逊声称（Heath Wilson，1876第450页）：摩西的注意力受到刺激，他就要跳起来，却仍有些犹豫；他那蔑视与愤慨交织的目光也有可能变得慈祥怜悯。

沃尔夫林（Wölfflin，1899，第92页）谈到了"抑制的行动"。他说，这种抑制出于摩西自身的意志；这是他发作并跳起来之前自我控制的最后瞬间。

就雕像表现了摩西看到金牛犊时的行为来说，贾斯蒂（1900，第326～327页）的解释最趋极端。他指出了一系列迄今为止无人注意到的细节，并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设。他要我们注意两版圣书就要滑落在石座上。"'他'或许正朝着喧嚣声传来的方向张望，脸上的表情似乎表明他已有不祥的预感；或者，可能是那令人憎恨的景象令他惊恐失色。他又惊恐又痛心，身躯重重地沉下去[①]。他已在西乃山度过四十个昼夜，如今已疲倦不堪了。恐惧、命运的突变、罪恶，甚至幸福本身，都在这一刹那历历在目，但又没法抓住它们的本质，没法探出它们的深度，也没法估计它们的后果。这一瞬间，摩西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他对自己的子民完全绝望。此时此刻，内心的情感不由自主地从一些细小动作中流露出来。圣书从右手滑落在石座上；圣书的书角已触到石座，他用前臂将它们夹

① 应该指出，仔细安排在坐像膝上的披风就使得贾斯蒂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相反，这种安排使我们这样假设：摩西先是从容地坐着，后来才被突然发现所惊动。

住。手却伸向前胸摸着胡须，由于头转向右侧，手便把胡子挽向左边，打破了这件特有的男性装饰品的对称性。看上去他的手指好像在抚弄胡须，就像现在有人激动时摆弄表链一样。他的左手埋在覆盖着他身体下部的长袍里——按照《旧约》的说法，脏腑乃感情所在之处——而左脚已经收回，右脚向前伸去；再过瞬间他就会跳起来，他的精神力量将要从感情转化为行动，他的右臂就会移动，圣书将滑落到地上，可耻的亵渎神灵的凡夫俗子将用流血来赎罪……”“这并不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精神上的痛苦仍在压迫着摩西，令他几乎崩溃。”

纳普（Knapp，1906，XXXII）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只是他在叙述的开头没有提到那个疑点[①]，而是把圣书下滑之说引向纵深。“他刚才还和上帝单独地在一起，现在却被尘世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听见喧嚷、唱歌和跳舞的噪音，把他从冥思中惊醒；他的目光随着头转向喧闹声传来的方向。一时间，惊恐、怒火、失控的感情纵横交织于他那伟岸的身躯。他一旦跳起来向他的那些染上恶习的子民大发雷霆的话，圣书就会下滑，摔在地上，摔得粉碎……这是艺术家所选择的最紧张的瞬间。”因此，纳普强调的是动作前的准备，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认为塑像表现的是主人公试图对激愤的感情加以扼制的情景。

不可否认，贾斯第和纳普所尝试的这类解释，很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并未止于人物形象的一般效果，还考虑到以塑像的个别特征为依据；这些特征我们常常不大注意，因为我们常易被总体印象所局限，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头部明显地左转，目光随之视向左边，同时身躯前倾，这一造型说明，正在端坐的摩西突然在左前方看见了什么东西，从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抬起一只脚只能意味着他准备跳起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意[②]；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摩西一时情急，圣书从手里滑脱，即将摔落地面，主人公拿圣书所采用的极不寻常的姿势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十诫》是最神圣之物，不能像随身的普通物体那样随意放置）。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相信，雕像记录了摩西一生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刻，至此我们也可以确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了。

但是汤德的两个说法却使我们对原本以为明白了的东西不明白了。这位批评家说道：在他看来，圣书不是下滑而是被“牢牢握住”。他注意到“右手稳稳地放在圣书上”这一细节。如果我们亲自审视一下雕像，我们也会毫无保留承认汤德是正确的。圣书放得很稳，没有下滑的危险。摩西的右手支撑着圣书，或者说圣书支撑着摩西的右手。的确，汤德没有说明摩西持握圣书的姿势是准确的，但这也不能用来证明贾斯蒂以及其他人对持握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汤德，1908，第

---

① 见前注。

② 尽管朱利亚诺（Giuliano）在美第奇教堂（Medici Chapel）中从容的坐像的左脚也同样从地面抬起。

205页）。

第二个说法更有权威性。汤德提醒我们，“这尊雕像是米开朗基罗计划完成的六座中的一座，原是打算雕尊坐像。这两个事实都证明米开朗基罗并不打算以此雕像记录某一特别时刻。因为按照第一种构思，即塑造一组呈坐姿的人像计划——以表现充满活力的生命（vita activa）和冥想者（vita contemplativa）——就排除了这尊雕像意在记录特殊历史事件的可能。根据第二个事实，即表现一种坐像姿态——此乃整部雕塑作品艺术构思的要求，却与历史事件的性质发生矛盾，即与摩西走下西乃山来到营地的事件相冲突。”如果我们接受汤德的这种异议，那么，我还可以增加这种说法的分量。摩西像与另外五尊像（根据后来的速写草图来看，或许是三座）是用来装饰陵墓底座的。与摩西对应的一尊雕像原计划是保罗像。另外一对，表现生命活力和冥思者的雕像取形于利厄（Leah）和雷切尔（Rachel）——一对真正的站像，被置于陵墓上方，因为它们尚未完成，形象很惨。这样，摩西就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想像，摩西雕像意在激发观赏者想像：摩西正要从座位跳起来，跑去制造一场混战。如果其他几尊雕像未表现出准备采取激烈行动的话——这种可能似乎很小——那么，单独的一尊雕像却让我们认为它要脱离自己的座位和伙伴，事实上也就不再充当总体设计所赋予它的角色，这样就会给人造成很坏的印象。这样一种创作意图会产生一种混乱的效果，我们不会指控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下如此行径，除非事实迫使我们得出此等结论。处于离座瞬间的形象与陵墓想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心情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

因此，摩西的形象不能理解为将要跳起来，必须让他和其他雕像中的人一样，像计划中的教皇像一样（但教皇像并非米开朗基罗本人所塑）保持其庄严姿态。这样一来，我们面前的这尊雕像就不可能是一个满怀愤慨的人，不可能是那个从西乃山上走下来，发现他的子民毫无信仰而把圣书摔在地上，结果圣书破散的摩西的像了。的确，我至今仍记得，最初几次参观维科里的圣皮埃特罗教堂时，我总是坐在这尊雕像前，希望我看见摩西怎样抬脚站起来，把圣书扔在地上，大发雷霆。但是，这样的事从未发生。相反，大理石雕像越发巍然屹立，全身透出一股慑人的威严，我于是不得不承认，这里所表现的是某种凝滞不变的东西，这位摩西将永远这样满怀愤怒，姿态不变地坐着。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放弃雕像表现的是摩西看见金牛犊，怒火中烧，正欲发作的解释，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某种假设，承认该雕塑作品是人物性格的习作。汤德的观点看来是最不武断的，其解释与雕像中人的动作意义最为贴近。他说：“和通常一样，他（米开朗基罗）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表现一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他创造了一位情绪激昂的人类领袖，这位领袖深知自己作为法规制定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勇敢地面对人类对他的不理解、不合作。表现这类行动的惟一手法就是突

出他的意志力量，这一点是通过表现总体静态中的一丝动意来实现的。比如我们从他那扭向一边的头、绷紧的肌肉和左脚的位置中感受到某种动意。这些明显的特征，我们在佛罗伦萨的麦迪西教堂中的奇尤里阿诺身上也能发现。米开朗基罗突出表现了这位改造人类制度的天才和芸芸众生之间的必然冲突，愤怒、轻蔑和痛苦的情感成为他身上的典型特征，从而使摩西的这一基本性格更趋丰满。没有这些情感就不可能描绘出这类超人所具有的性格。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种具备着制服冥顽世界所需的永不衰竭的内在力量的典型性格；他不仅给《圣经》中关于摩西的记叙提供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我相信他也为自己的内心经历、为尤里乌斯的个性以及萨沃那洛拉的永恒冲突的根源，都提供了一种表现形式。”（1908，第206页）



图1

这种观点可以同纳克富斯的说法联系起来（1900，第69页）。他说，摩西雕像艺术效果的巨大秘密就在于人物内在的激情与外在姿态的冷静两者之间的艺术对比。

就我本人而论，我对汤德的解释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他的解释缺少某些东西。或许他需要进一步挖掘主人公那姿态里所蕴涵的心理状态，去发现以上所述的“外在”冷静和“内心”激情之间的对照。

第二章

早在我听说精神分析学这回事之前，我就听说有一位俄罗斯艺术鉴赏家伊凡·莱蒙列夫[1]，曾因考证绘画作者之真伪而给欧洲绘画艺术馆带来一场革命，他向人们演示了如何准确区别原作和摹本，他能为那些受到怀疑的作品构想一个假设的作者。他主张人们的注意力应当从一幅画的整体印象和主要特征上转移开来，强调微小细节的重要性，诸如指甲、耳垂，以及光晕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细部的画法，因为这些细节常被临摹者在仿造时忽略，而每个艺术家在这些方面又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后来我了解到，伊凡·莱蒙列夫是一位意大利医生的俄文假名，他的真名叫莫雷利，死于1891年，生前曾是意大利王国的上议员。这一新发现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觉得莱蒙列夫的考证方法和精神分析的技巧密切相关，它也是通过十分细致的观察，从所谓的垃圾堆中挖掘某种秘密，以及从那些不为人们注意，甚至为一般人不屑的细节中寻找所掩藏的东西。

在摩西像身上有两个地方的细节迄今不仅没有注意，实际上甚至也没被恰当地描述过。这两处就是他右手的姿势和两版《十诫》圣书的位置。可以说正是这只右手构成了圣书《十诫》和主人公怒气冲冲的胡须之间惟一而特别的联系，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环节。他被描述为手指插入胡子，抚弄着胡须，同时又将手的外侧靠在《十诫》之上。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我们有必要更密切地观察他右手手指的动作，更细致地描述手指触到的那蓬大的胡须。

我们现在很清楚地发现下列情况：右手的拇指被遮住了，只有食指真正牵连着胡须。食指那么用力地压住柔软的胡须，以致手指的上下部形成了隆凸。其余的三个指头靠着前胸，上关节弯曲：最靠近右手的一绺胡须从手指边飘散开来，几乎未触及手指，似乎手刚从胡子里抽出来。因此，说右手插进胡须或者正摆弄胡须，都是不正确的；明显的事实是，食指放在胡子上并压出了一道深凹痕。无可否认，用一根手指压住胡须是一种不寻常的姿势，其用意耐人寻味。

摩西那令人羡慕的胡须，从他的脸颊、下巴以及上唇波浪般的一绺绺飘泻下

① 他的首批论文是用德文发表于1874～1876年间。

来，每绺之间互不牵扯。最右边的那一绺，从脸颊长出，飘落至向内压迫的食指处被牵制住了。我们可以设想，这绺胡子可以沿着食指和被遮盖住的拇指之间继续下泻。与此对称的左边一绺，一直畅通无阻地经胸前飘下。最不寻常的处理是对左边内层一绺和中线之间的这部分浓密的胡须，这部分胡须没有随着头部转动向左边飘去，而是松松地卷起，形成一种旋转的装饰效果，横悬于胸前，覆盖在右边内层的胡须上。这是由于它受到了右手指的有力的压迫，尽管这部分胡须长在脸的左侧，而且实际上是左边整个浓密胡须的主体。所以，虽然摩西的头部猛烈地向左转动，胡子的主要部分却留在了右边。在右食指压住的地方胡须形成了涡状；左边的绺绺胡须盖在右边的胡须上，二者都被专横的右食指挽住。只有在右食指尚未触及的地方，胡须才不受束缚，再次自由飘逸，垂直下落，直到摩西膝盖上张开的左手拢住了它们的末端。

我并不幻想我的描述十分清楚，也不想冒昧地认为这位雕塑家真的鼓励我们去解开他的雕塑胡须之谜。除此之外，事实上右食指的压力主要影响了左边的几绺胡须，由于这种斜向牵制，使得胡须没有随着头和目光转向左边。现在我可以提个问题：这种安排有什么用意？动机是什么？如果雕塑家确实是考虑到线条和空间设计的缘故，才把向下飘逸的胡子拉向而朝左方的雕像右侧，那么，用一根手指压住胡须的方式该是一个多么奇特而又不合适的表现手法呀！无论什么人，当他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胡子挽向另一边时，都不会考虑用一根指头的力量把一半胡子压到另一半上。这些细小的特征难道都是无所意味的吗？难道我们是在创造者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思吗？

且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细部也有意义。有一个办法可以帮我们克服困难，并帮我们发现新的含义。摩西左边的胡须压在他的右食指之下，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姿势看做是右手与左边的胡须之间曾发生某种接触的最后阶段，这一接触曾被选择来表现此前某一时刻的一个最关键的姿势。也许他的手曾更有力地握着胡须，也许他的手曾到达过胡须的左侧，而当他的手落到雕像现在所示的位置时，一部分胡须便随之而往，这些胡须证明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动作，卷曲的胡须显示着这只手的运动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右手曾经有过一个收回的动作。这一假设可引出其他假设，在想像中，我们可以使一个场面完整。胡子为依据可证明该动作是这种动态场面的一部分。依据静坐的摩西被喧闹的人群和膜拜金牛犊的景象惊扰这一点，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这种假设：我们猜想，他最初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头和飘逸的胡须朝向前方，他的手也许根本没有靠近头和胡子。突然，喧闹声震耳欲聋，他把头和目光转向发生骚乱的方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他无比愤慨，准备一跃而起去惩治那些不肖子民，把他们消灭。他的狂怒当时虽远离它的对象，摩西却以某种姿势将其发泄在自己身上。他那焦躁不安的手随时准确行动，抓住了

随头转动的胡须，把它紧紧地握在拇指与掌心之间。这是种充分表现力量和激情的姿势，它使我们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其他作品。但这时发生了某种变化，至今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先前伸出去插进胡须中的手急速抽了回来，紧握着的手松开来，也松开了原本握着的胡须。但因手指插得较深，在回缩的过程中将左边的一大把胡须径直带向了右边，在一根手指的重压下，这绺胡子停留在右边的胡须上。这一新姿势只有借助先前的那个姿势才能理解，而雕像捕捉的正是这个姿态。

现在我们该停一停，整理一下思绪。我们曾经设想：右手最初是远离胡须的，然后在心情极度紧张的时刻把手伸向雕像的左侧，抓住了胡须；最后手又抽回来，并带回了一部分胡须。我们安排这只右手的动作就好像我们能自由地使用它似的。但是我们可以那样做吗？这只手真可以如此自由支配吗？他不必去拿或夹着《十诫》吗？这些摹拟动作难道不会受到手的重要功能的限制吗？再说，假如当初使这只手离开原来位置的动机是那么强烈，那么，又有什么原因能使其抽回了呢？

这的确是些新难题。不可否认，右手要负责拿《十诫》，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明它该抽回。可见，假如这两个难题可以同时解开，在此基础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事件之间的联系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又假如正是发生在《十诫》上的一件事导致了右手的运动，我们又当如何解释？

如果我们看图 4 的画面，我们就会发现，圣书《十诫》的一两个显著的特点，到目前还没有人重视并予以评论。人们说，雕像右手靠在《十诫》上，或曰右手支撑着《十诫》。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两块并在一起的长方形《十诫》书，拐角触地竖立着。如果我们再观察得仔细一点，就会注意到，《十诫》的下沿形状不同于上沿形状，上部边沿向前倾斜。上部边沿笔直，而底部最靠近我们的地方有一个角状的隆起物，《十诫》恰好用这个隆起部分接触石座。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①]？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隆起部分意在标明《十诫》实际上是上下颠倒了。像《十诫》这类长方形的书，只有上面部分会卷曲或有凹口。我们由此可知，《十诫》呈倒置状态。这是对待圣物的一种奇特态度。它们头朝下立着，并靠书角保持平衡。在形式上考虑到什么，才使米开朗基罗将圣书置于这样一种状态？或许，这个细节对这位艺术家无关紧要？

我们开始猜想：造成《十诫》目前这个位置的原因是先前某个动作的结果，这个动作是我们曾假设的右手位置变化的结果。《十诫》的运动促使右手随即收回去。手和《十诫》的运动可以用这种方式协调起来：最初，摩西静静地坐着，右臂垂直地夹着《十诫》。右手握住《十诫》的下沿，并发现《十诫》前部的突出部

---

① 顺便说一句，维也纳造型艺术学会的收藏品中，有一座摩西的石膏雕像，在雕像身上，他们十分错误地复制了这一点。

分易于把握（这种易把握充分说明了《十诫》的倒置问题）。后来才发生了前面描述过的事：远处的骚乱打乱了摩西的平静，他把头转向骚乱的地方，看到了那些情景，他抬起脚准备跳起，手松了《十诫》，伸向左上方插进了胡须，似乎要把暴怒发泄在自己身上。这时，《十诫》只能靠手臂来夹住，手臂不得不将它们紧紧压在身侧。但手臂的压力不足以支撑《十诫》，《十诫》开始头朝前同时向下方滑动。原来平滑的上部边沿，开始朝前，向下；下部边沿，失去依托，前端靠近石座。接下来，《十诫》可能就会绕这个新的支点转动，上部边沿会先着地掉下，甚至摔碎。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雕像的右手抽回，松开了胡须，但一部分胡须无意间被拉回，手及时地靠在《十诫》的上沿，在靠近后面书角的地方夹住了《十诫》，置于最高处。这样，胡子、手以及倾斜的《十诫》所组成的整体的奇特的紧张气氛，就可以上溯到右手的一个猛烈动作以及这个动作的自然结果。如果我们想还原这一激烈动作，我们就必须把《十诫》上前方的角抬起，并向后推，这样就可使前下方的那只角（有隆起的那一角）从石座上抬起来；然后放下右手，放到现在已恢复水平状态的《十诫》的下沿。

我设法借一位艺术家之手画了四幅草图来说明我的意思。草图 5 复制了现存雕像的模样；图 2 和图 3 表现了我的假设的前两个阶段——第一是平静阶段；第二是高度紧张阶段，在这个阶段摩西准备跳起来，松开了对《十诫》的握拿，《十诫》因此开始下滑。现在该注意的是，想像草图的两种姿势，如何能证明前面那些作家的描述是正确的？和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孔迪维说道："摩西，这位希伯莱人的导师和领袖，以一种冥思哲人的姿态坐着，右臂下夹着《十诫》法版（Tables of the Law），下巴支在左手上（!），就像一位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的人。"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塑像中根本看不见这种姿态，但这种说法几乎精确无误地描述了第一幅草图所支持的观点。吕布克及其他评论家共同评论："他深深地被震动，右手抓住飘荡的美髯。"如果我们看看现存雕像的复制品，就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但就第二幅草图来说却是适合的。和我们看到的一样，贾斯蒂和纳普观察到这样的细节：《十诫》就要滑下去，随时都有摔碎的可能。汤德更正了这种说法并证明了，右手稳稳地握着《十诫》；不过，如果他们描述的不是雕像本身而是我们构想的动作的中间阶段，那就正确了。情况几乎是这样：好像他们已使自己的注意力从雕像的视觉形象移开，无意识中开始了对形象背后的动机力量的分析，而他们这种分析的结果，竟与我们用更清醒、更明确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一样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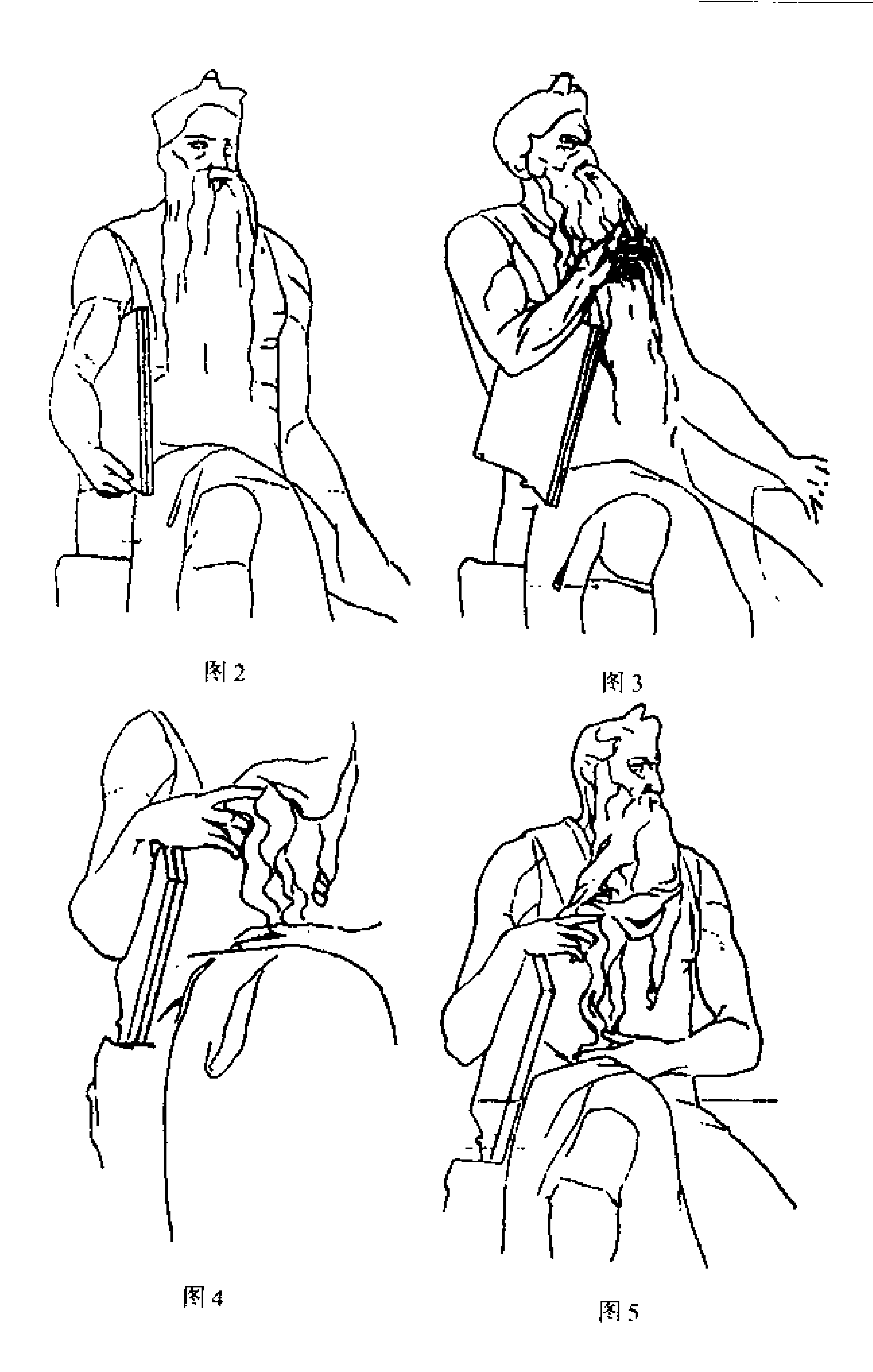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第三章

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收获自己辛勤劳作的果实了。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拜倒在这尊雕像前，满腔热忱地为其作注，认定它表现了摩西被其子民舍弃主恩、围着偶像跳舞所激怒。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让我们期待着看到他于下一刻跳起来，摔碎《十诫》，实施复仇。而这种看法与雕像设计背道而驰。这座雕像与其他三座或五座雕像一起，构成朱利叶斯二世陵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再捡起已放弃的解释，因为我们复制的摩西画像中，摩西既不会跳起来，也不会把圣书扔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是激烈行动的开始，而是已发生的行动的延续。在开始大发雷霆时，摩西想采取行动，跳起来复仇，忘记了圣书《十诫》在手，但他战胜了冲动，继续静坐在位子上，只在心中凝聚着怒火，痛苦中夹杂着轻蔑。他也决不会扔掷圣书使其在石地上摔碎，因为恰恰是因为考虑到《十诫》，他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为了维护《十诫》，他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发泄满腔怒火时，他必定忽略《十诫》，所以将拿《十诫》的手移开。《十诫》下滑后，随时有摔碎的危险。这一点使他醒悟。他记起了自己的使命，为了这个缘故，他抑制了情感的膨胀。他的手回到原处，在《十诫》就要落地之前，护住了失去支撑的圣书。他以这种姿态巍然不动，米开朗基罗取这种姿态，把他塑造成陵墓护卫者①。

如果我们将雕像上下打量，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三个感情层次。面部线条反映趋于强烈的感情；塑像中部显示出克制行动的痕迹；脚仍保持采取行动的姿态，仿佛控制力是自上而下得以实现的。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提到左臂，它似乎也该在我们的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左手轻柔地放在腿上，爱抚地握住飘垂下来的胡须的末端。它似乎想要扼住那股狂怒，正是因为这股狂怒，另一只手片刻前狠狠抓住了胡须。

这里应当指出，这毕竟不是《圣经》中的摩西。因为那个摩西确实大发雷霆，

---

① 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建议，弗洛伊德在分析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所描绘的感情方面，曾试图将其部分观点接近于持不同意见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一时期这项内容充斥于他的头脑，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对历史人物摩西的兴趣，在他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也表现出来。

并把《十诫》摔得粉碎。这位摩西想必是不同的，是艺术家心目中的新摩西。所以，米开朗基罗必定胆大地修改了《圣经》文本，改变那位圣人的性格。我们能够想像到他如此大胆，敢于采取亵渎神明的这种行为吗？

《圣经》中描写摩西看见金牛犊场面时的行为，引述如下①：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8）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所指示的道路，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它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真是十分倔强。（10）你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然后再为你创造一个大国。（11）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可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啊！……”

“（14）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15）摩西转身上山，手里拿着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16）这是神的杰作，字是神写了刻在版上的。（17）约书亚--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争战的声音。（18）摩西说：这不是他们要征服别人的声音，也不是被人打败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们歌唱的声音。（19）摩西走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遂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20）他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小孩喝……”

“（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31）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铸金牛犊。”（32）不过你若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的话，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掉我的名。（33）耶和华对摩西说：谁违背我的训诫，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掉谁的名。（34）现在你去带这帮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听着，我的使者将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35）耶和华杀百姓，是因为他们铸了亚伦铸的牛犊。”

用现代评论《圣经》观点来读以上几段，肯定会发现这是由几种不同来源的说法笨拙地拼凑而成的。在第 8 节里，上帝晓谕摩西，他的人民已经堕落，为自己铸造了偶像；摩西为那些做坏事的人求情。而他跟约书亚说话的样子好像对此一无所知（18）。只是在见到膜拜金牛犊的场面时才突然被激怒（19）。在第 14 节里，他已从上帝那里为他的犯罪的人民求得了宽恕；而在第 31 节里，他却又上山恳求宽恕。他向上帝讲述他的人民犯罪，并确信上帝会推迟对他们的惩罚。第 35 节提到上帝给予他的人民的惩罚，但未做更多介绍；而在 20～30 节里却描述了摩西本人所给予的惩罚。众所周知，《圣经》历史故事中，涉及到《出埃及记》的部分，充满着更多明显的不一致和自相矛盾。

---

① 起初，弗洛伊德为其“不合适宜地引用鲁瑟的译文”而表示道歉，下面的这段译文引自钦定《圣经》译本［1611 年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核定发行的英译《圣经》］。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没用这种批判态度来对待《圣经》的经文，而是把它当做连贯的整体予以接受，这就使得以上存有疑问的段落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很好的主题。按照《圣经》的说法，摩西已经被晓谕，他的人民在对偶像顶礼膜拜，他自己已站在了调和宽恕的立场上。然而，当他亲眼看到金牛犊和跳舞的人群，却突然盛怒不已。因此，我们毫不奇怪，艺术家在反映他的主人公对那痛苦的意外之事的反应时，出自内心动机，偏离了《圣经》本文。再者，对艺术家来说，只要有点借口，偏离经文并非反常或绝对不允许。由帕米加那所作、被他故乡所收藏的名画就这样表现摩西：他坐在山顶上，把两块法版扔下山去，尽管《圣经》明确地叙述摩西是"在山下"砸碎了法版。就连坐着的摩西，在《圣经》里也找不到证据，倒似乎证实了那些评论家的论断：米开朗基罗雕刻这座坐像，其用意并不在于记录这位先知一生中某个特定的时刻。

按照我们的推测，比修改《圣经》更重大的，是艺术家改变了摩西这个人物的性格。传说中的摩西脾气暴躁，动辄发怒。他盛怒之下曾杀了一个虐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不得不逃到荒郊野外。同样他又在一气之下摔碎了上帝亲自书写的法版《十诫》。传统毫无偏见地记录了摩西的这种特点，保存了曾经在世的一个伟大人物的形象。但是米开朗基罗却在教皇陵墓上放置了一个不同的摩西，一个超越历史或传统形象的摩西。他修改了打碎法版这一主题：他没有让摩西在盛怒之下打碎法版，而是让摩西想到法版有跌碎的危险，从而抑制住怒火，或者无论怎样防止怒火变成行动。这样一处理，他就给这尊雕像赋予了某种新的、超人的内涵。于是，这样一个有着巨大体魄的伟大形象就具体地体现了只有人才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同内心感情成功地进行了斗争。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解释，尽管仍然能够质疑，什么动机促使雕塑家选择摩西这个人物，这个经过大幅度改造过的摩西，来作为朱利叶斯二世陵墓的装饰？许多人持这种观点：这些动机可以从教皇的性格中，从米开郎基罗与他的关系中找到。在这一点上朱利叶斯二世和米开朗基罗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想实现伟大辉煌的目标，特别是在宏伟的设想方面。朱利叶斯二世是一位果敢坚定的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下统一意大利。他想独自奋斗，一心想把几百年来没有发生的奇迹变成事实，后来通过联合外国武装才了其夙愿。在任教皇的短暂时间里，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并采取了些过激的暴力手段。他欣赏米开朗基罗和他同属一个类型，但他却动辄发怒，根本不去考虑别人，这使得艺术家变得机警谨慎。艺术家本人也感到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意志力，作为一个更为内省的思想家，他可能还预感到了他们两人命中注定要遭受失败。于是他在教皇的陵墓上雕刻了他的摩西，以示对死去的教皇的谴责，同时也作为对自己的告诫。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艺术家使自己的人性得到了升华。

第四章

1863年，英国人沃特基斯·劳埃德（Watkiss Lloyd）专门就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写了一本小册子。我有幸得到了这本长达46页的册子，怀着复杂的心情读完了它。我再次有机会亲身体验，即使是在一个极其严肃的事业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里仍会渗人多么无谓和幼稚的动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遗憾，那位作者居然会先知先觉我的那么多想法，这些想法对我来说很珍贵，因为那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作者对我的想法的意外证实中得到愉快。然而，在重要之外我们的观点却存在分歧。

劳埃德首先谈到，一般人对雕像的描述是不正确的，摩西不是正要站起来[1]——右手没在抓胡须，只有右食指放在胡须上[2]。有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劳埃德也承认，只有通过假设出前一个动作（这一动作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才能解释现在所刻画的姿势。左边的胡须被拉向右边，表明右手同左边的胡须先前曾自然而亲密地接触过。他提出另一种追溯手同胡须的早先接触的方法，按照他的看法，右手并没有插进胡须，而胡须一直就在现在手放的地方。他说，我们必须想像一下，雕像的头部在突然受到干扰之前是转向右边的，当时他的右手和现在一样，握着法版。法版对手掌的压力使得手指在飘洒的绯绛胡须下自然张开，头部突然转向另一边，致使一部分胡须被静止的手绊了一下留住片刻，形成了胡须的卷曲缠绕，可以看做是运动轨迹的标志——用劳埃德自己的话说是“痕迹”。

在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即右手同左边的胡须曾有过接触的思考，影响劳埃德思维的一种考虑竟与我们的那种考虑如此接近。他说，就这位先知而言，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不可能伸出右手把胡须拉向右边。因为那样做会使他的手指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再者，这种动作将导致法版下滑，因为它们仅仅靠右臂压力的

① “但是，他并不是要站起来，或准备站起来；雕像的上半身挺得笔直，而不是像运动之前那样向前倾，以求平衡的变化……”（劳埃德，1863，第10页）。

② “这样的描述破绽百出。一束束胡须只是被右手绊住了，不是握，也不是抓，抱或者捋。即使绊，也是短暂的——暂时被绊住了，手很快就会松开胡须，让其自由飘落。”（同上书第11页）。

支撑——除非摩西在最后时刻去奋力拯救它们。我们认为，“它们被如此笨拙的姿势抓住，这样想像的本身也是亵渎的行为了。”

很容易发现这位作者忽略了什么。他正确地将胡子反常之处解释为标志前期的动作，但是他忘记了用同样的方法对法版《十诫》位置的反常细节做出解释。他考证的仅仅是与胡须有关的资料，而没对那些与法版《十诫》相关的细节进行考证，他认为法版的位置未曾变化。这样，他就关闭了认知之门，没能形成与我们的观念类似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是，通过考证某些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得到关乎整个形象的意义和目标的意想不到的解释。

但是，倘若我们俩都误入歧途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采取过于严肃、极度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艺术家并不在乎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他随意加入，或者为某种纯形式的考虑来设计，并不带有任何潜藏的意图，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同许多诠释家的运气一样，自以为把问题看得很清楚，而艺术家却有意无意都没想要表现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说不上来。我说不出是否有理由相信米开朗基罗——一位在其作品里蕴涵了那么多思想的艺术家——如此执著地追求精确。尤其是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对我们讨论的雕像上醒目而奇特的特征做出上述假设。最后，或许我们可谦虚地指出，艺术家和诠释家应共同为这件作品的朦胧负责。米开朗基罗在创作中经常走向艺术表现允许范围的最极端，如果说他的目的就是想在激烈感情发泄后的平静中，显示感情奔放过程的话，那么或许他在摩西像的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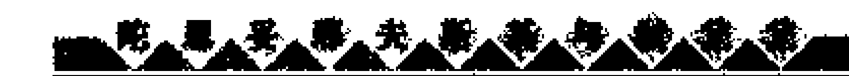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1928[1927])

孙庆民
廖凤林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 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伊谛普斯情结(或称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伊谛普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对于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复杂人格应如何去认识?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无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其中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那段描写，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所以，在创造性艺术家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显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借口惟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而试图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由此将引起的一个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个人一旦他感受到诱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诱惑。如果一个人先是犯罪，然后又悔过，悔过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他便会受到外界的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renunciation)。实际上，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成为使杀戮能够进行的实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看来，这种对道德的妥协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终没有产生十分光彩的结果。在经历了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呼吁之间相妥协的最激烈斗争之后，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权又臣服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倒退是一个人不费力不用脑子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他伟大人格中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为神经症招致这种失败的。他的睿智和他对人类的强烈的爱或许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做一个罪人（sinner）或罪犯，会激起强烈反对，这种反对不必建立在对罪犯的世俗评价之上，其真实动机（motive）很快就会昭然若揭。罪犯有两个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之处以及它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立刻会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出的与此相反的一面——他对爱有强烈的渴望，而且也是有巨大的爱的能力。这表现在他那夸张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权利恨和报复的时候却热忱地去爱，积极地去帮助。正如他在与第一个妻子和其情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罪犯呢？答案是这种评价的理由来自他对写作素材的选择。他总是挑选那些暴虐的、行凶的和利己的人物，这让人联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类似的倾向。他也从他个人生活中挑选素材，如他喜欢赌博，而且承认对一个年

轻的姑娘有过性攻击[1]。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破坏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一名罪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发泄而不是向外部），这导致他既有受虐狂倾向又有犯罪感。认清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此外，他的人格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质，这表现在他十分易怒，喜欢折磨人，即使对他所爱的人也难以宽容，甚至也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他对待他的读者的方式中。也就是说，在小事情上，他对别人是个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个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受虐狂——即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中挑选出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另两个是质量的：感情生活的极其强烈性，天生异常的本能素质（该素质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或是一个罪犯）和他那难以剖析的文艺天赋。这三种因素交织着，在他不犯神经症的情况下可完好地共存。有些未患神经症的人单纯是受虐狂。而从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与对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间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会使他被划为所谓的“本能性格”一类人物。但这一情形又由于神经症的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神经症正如我们所说，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发作的次数越多，须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复杂。因为毕竟神经症只是自我无力进行调控的一种表现，自我在企图进行控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自我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症是怎样表现的呢？他称自己是个癫痫症者，别人也这么认为。他的病情发作时极为严重，伴有意识丧失、肌肉痉挛，其后就产生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经症的一个症状，因此必须把它归之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癔症。关于这一点，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的癫痫症的病历资料不足以及不够可靠；其二是因为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病理状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谈第二点。再次重复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没必要的。因为它对澄清这个问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谈一谈。这个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临床诊断中见到。这种奇怪的疾病发作时伴随着难以预测的、没有先兆便出现的痉挛发作，患者变得易怒、富有进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渐降低。但这种大致的描绘

---

[1] 参阅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ülöp-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写道：“他并未被资产阶级的道德樊篱所阻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违法犯罪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以及他描写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少。”对未成熟姑娘进行性攻击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现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斯达沃罗京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两本书中。

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凶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最终导致严重自我伤害（self-injuries）的危险的癫痫状态（status epilepticus）。不过，也可能病人有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突发晕眩，或在短时间里行径背离性格，好像病人是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症状的发作，虽一般来说是由于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纯粹的肉体原因（purely physical 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发作很可能出于某种纯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惊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结果。不管智力损伤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多么典型，至少有一个病例我们都知道（赫尔姆霍茨的病例），它没能妨碍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与此相同的病例，要么是有争议的，要么是令人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给人以迟钝、发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idiocy）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cerebral defects），尽管它们不是临床上必须的症状。但是，这些程度不同的发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有着过度的、经常失去控制的情绪生活的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人们认为"癫痫症"不可能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症状。在明显的症状中，我们发现的类似情况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说明。似乎可以认为，在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既可以作用于由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所导致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对心理机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动达到心理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种双向性后面，我们瞥见了本能释放的（instintual discharge）潜在机制。这种机制不会远离"性"过程，而"性"过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医生们把性交描绘为一种轻度的癫痫，并由此认为在性行为中包含着对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①。

"癫痫反应"（epileptic reaction），这个普通因素，在神经症中也肯定出现，而神经症病根只能通过大量躯体的方式来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癫痫发作就变成癔症的一种症状，并被癔症接受和缓释，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释放过程接受和缓释一样。因此，官能性癫痫和"情感性"癫痫是完全应该加以区别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患第一种癫痫症的人大脑患病，患第二种癫痫症的人患神经症。第一种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第二种病人所受的侵扰则来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一点也无法证明。要证明这点，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发作与后来的反复发作，贯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进行考察）。而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有关发作的描述本身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癫痫症的发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还缺乏了解，现有的这些残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最有可能的假设

① 参见弗洛伊德《癔症发作概论》(1909a) 一文。

是：发作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现为温和的症状，直到他 18 岁那年经历了一个骇人的事件——父亲的被杀[①]，他才表现出癫痫症症状。如果可以确认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发作，那么这种假设就切中要害了。但是另外一些说法却与此相矛盾[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被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的命运之间的毋庸置疑的联系，震动了不止一个为他立传的作家，并致使这些传记家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流派”。从精神分析（因为目的就是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禁不住想了解他父亲被杀对他的严重损伤，并把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当做他神经症的转折点。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证实这一点，那么我将有可能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的读者所不理解。

我们有一确定的起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在“癫痫症”发作之前的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这些发作具有死亡意义：发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对死亡的恐惧，表现为昏睡、嗜眠。该病首次发作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是种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忧伤，正如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索罗维耶夫的那样，那种感觉似乎他当场就有可能死去。实际上随之而来的确是一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还在费奥多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在睡觉前留下字条，写着他害怕在夜里会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礼一定要推迟 5 天再举行（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IX）。

我们知道这种像死亡一样的病症发作的意义和目的[③]。它们意味着病者与死亡者的认同，要么与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认同，要么与一个还活着、而病者却希望

① 见莱尼·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对他父亲描述的一文（1921）]。资料中特别有趣的部分记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难忘和苦恼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迹象就可以追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Suvorin］发表在 1881 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的介绍文章，1925）。也见于奥罗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写道：“然而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关于法奥德·米海洛维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证，即他的病与他青年早期的生活有关，并且与他和其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剧性事件有关。但是，虽然该例证是由法奥德·米海洛维奇的一位亲密好友提供给我的，但我却不能令自己精确和圆满地复述他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关于此传说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

② 许多记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矛盾，认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期间表现的是残留的癫痫症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不相信神经症者的自传叙述。经验向我们表明：神经症者的记忆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断不合意的原因联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禁闭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却是事实。参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 1186 页）。

③ 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 1897 年 2 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a，信 58）。



死去的人认同。后一种情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个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现在这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了，他自己也死了。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某个男孩子来讲，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因此，这种发作（被称为癔症发作）是对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所做的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

用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来看，弑父（parricide）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恶倾向（见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惟一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还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赎罪欲的心理根源。但根源不一定只是一个。心理情境是复杂的，是需要阐明的，正如我们所说，男孩子和他父亲间的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关系。除了想把父亲当做竞争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父亲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一般也是存在的。这两种心态的结合便产生了与父亲认同的心理：因为他钦佩父亲，所以想要处于父亲的地位上，因为想要像父亲一样，所以他想要父亲离开这个位置。这时，他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遇上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到了一定的时候，孩子会开始懂得，他想将父亲作为对手取而代之的企图，会受到来自父亲用阉割手段所实施的惩罚。这样，由于对阉割的恐惧——为了保持他男性的权利——他就放弃了占有母亲除掉父亲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却仍留在潜意识中，并构成了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儿描述的是正常过程，即所谓“伊谛普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对此还需做深人详述。

当两性同体（bisexuality）的体质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较强地发展起来时，就出现了又一个复杂情况。因为那样一来，男孩子在阉割的威胁下，他的倾向开始强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让自己替代母亲的位置，接替母亲的角色，作为父亲爱恋对象。但对阉割的恐惧也使他的这种办法成为不可能。男孩子晓得，假如他要想让他的父亲把其当成女人来爱恋，他一定要屈服于阉割。于是，恨与爱父亲的两种冲动都遇到压抑。在这事件中有一个心理上的区别：由于对外部的危险（阉割）的恐惧而放弃了对父亲的仇恨，同时，爱恋父亲又被当做一种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胁来对待。尽管从根本上说，它们仍要追溯于同一个外部危险。

对父亲的仇恨难于被男孩子采纳是由于其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筹码。在压抑对父亲的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叫做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成为增强神经症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气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情敌持令人不解的温和态度；

还有，正如他小说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那样，他对只能用受压抑的同性恋才能说明的情况具有独到的理解。

假如我们这样来阐明一个人对父亲爱与恨的态度，以及这态度在“阉割恐惧”(threat of castration) 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读者感到了乏味和难以置信的话，我为此遗憾，尽管我不能改变上述这些事实。我应该预料到“阉割情结”肯定会引起相当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坚持。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证明这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它还教给我们去认识每一神经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把钥匙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症。与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潜意识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

但是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能尽述伊谛普斯情结中压抑对父亲之恨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即与父亲的认同最终还是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纳，但却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的抵抗中存在着，我们管它叫“超我”，并相信这个父亲影响的继承者在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亲是生硬、暴烈和残酷的，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属性，而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本该受压抑的被动状态重新活跃起来。超我变成了施虐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动地实现的。对惩罚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甘愿充当命运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又从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说在罪疚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是对父亲的被动态度的实现。就连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射。

良知形成的正常过程与这里所描述的异常过程一定是相似的。我们还不能成功地在它们之间画出界线。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里，大部分结果是由于被压抑的女性的被动角色导致的。另外，不管这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在现实中是否特别凶暴，作为一个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他显著的罪疚感和他在生活中受虐狂的行为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成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述：一个天生具有特别强烈的两性同体素质的人，能够用特别有力的手段防止自我依靠特别严厉的父亲。这种两性同体的特征，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他的本性的补充。他早期像死一样的发作症状可以被理解为他自我中的与父亲的认同作用，这一认同作用被超我当做一种惩罚容让着。“你是为了要我成为你的父亲而去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却是个死了的父亲。”——这就是癔症症状的正常机制。接下来是：“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它们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他父亲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仍保留它的内容，却已被转

变为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像一个新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诸如此类的来自伊谛普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供给它们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亲的那些性格仍然如旧，或更确切地说，它随时间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在保留着。如果现实让其被压抑的愿望得以满足，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幻想变成现实，所有防御措施因此而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发作就表现为癫痫的特征，它们仍然表明他想与父亲认同从而惩罚父亲，但它们变得可怕了，就像他父亲那可怕的死亡一样。更进一步，这些发作是否包含着其他内容，尤其是性的内容，便无法推测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常出现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觉到的胜利和解脱，紧接着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我们在原始游牧部落中，从那些杀了他们父亲的兄弟们身上所推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顺序：先是胜利，而后是悲痛；先是喜庆，接着就哀悼。我们发现这种顺序在图腾祭宴仪式中①也出现过。如果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确实不曾发作过，那就证实了其他的发作仅仅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这种惩罚便不再需要了。但这一点无法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罚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个事实：他安然度过了那些悲惨、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对他的冤枉的惩罚，以此作为因为他反对生父而有应得的惩罚。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替代者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这里，我们瞥见了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性。事实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惩罚的必要②。

每一个熟悉癔症症状所表现的复杂情况的意义的人都会理解，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③。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最初的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在那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这也决定了他在另两个范围里——在这里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的态度，

①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

② [参见《来自罪恶感的犯罪》，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标准版，第14卷，第332页]

③ 有关他发作的意义与内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供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说，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易怒和沮丧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能从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他犯了很大的罪过，这使他压抑（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页）。在这些自我谴责（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学看到承认"心理现实"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认识。

即对国家权威和信仰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他的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这个沙皇在现实中曾与他一起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就经常如此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更多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无神论（atheism）之间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视任何由信仰带来的智力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来，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宗教感情赖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难以克服。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观的党派观念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派会站在宗教法庭庭长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判断。这种不同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完全像是由神经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导致。

这几乎不能说成是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伊谛普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谈及了同一主题：弑父。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显的是，弑父行为的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那出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伊谛普斯王》。剧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为对素材进行富有诗意的处理不可能不对犯罪动机加以淡化和文饰。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赤裸地承认弑父的意图，不经过分析准备，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的希腊戏剧，以被陌生命运强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潜意识动机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巧妙制造必要条件动机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目的的，显然没有受到女人的影响。然而这后一点却在另一情况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对那个象征他父亲的恶魔重复采取杀人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恶被揭露，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不企图通过求助于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受惩罚，好像这一切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在我们用理智看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在心理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出戏剧中，该主题的表现比较直接。主人公自己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对那个人而言杀人不是弑父。因此，争夺女人，这个被禁止的动机没有必要伪装。通过投射，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主人公的伊谛普斯情结。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而这种罪疚感正是以一种与神经症过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变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务的感觉。有证据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种

超人的罪恶。他对别人的蔑视不亚于对自己的蔑视："按他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谁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motive 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著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①]。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②]。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u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诱惑，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confession）。

---

① ［在德语中（也在原来的俄语中）这个比喻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作为："两边能切割的小刀"。这句话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第12卷第十章中。］

② ［对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实罪行案例中的实际运用的论述在弗洛伊德题为《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第251页下面可以找到，那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再次讨论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使我们对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gambling）的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了解（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们都把此看成是他激情的病态发作。这个不同寻常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不乏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经症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疚感通过债务负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在赌桌上赢钱以便返回俄国时不被债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这只不过是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清楚他主要还是为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①]。他由冲动而做出的荒诞行为的全部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表明了另外某些东西。不到输个精光，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保证，或者用他的名誉许诺，说他再不去赌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赌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说，他从未遵守过诺言。当他的损失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时，他便从中获得继续的病态性的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嫁给了这样一个恶习不改的罪人而遗憾。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后，第二天又会故态复萌。他年轻的妻子已习惯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她注意到有一种事可能成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一切，当他们典当了他们最后的财物时，他的写作就会变得十分出色。她当然不理解其中的原由。当他的罪疚感通过把惩罚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满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样他就让自己沿着成功的路向前迈进几步[②]。

一个赌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经历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赌博的因素？我们可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答案来。斯蒂凡·茨威格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个短篇小说汇成的集子《感觉的混乱》（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想表现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竟驱使她走到什么样的极端。但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意在表现（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带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干脆说是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

---

① “主要的是赌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发誓，贪婪钱财并不是我赌博的目的，虽然上帝知道我极其需要钱。”

② “他总是在赌桌前，直到输掉所有的东西，彻底破产。只有当伤害达到彻底的程度，魔鬼才从他的灵魂中逃走，并为创造天才让路。”（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第1卷第36页。）

无法反驳。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这样，当我问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不相容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年岁已高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她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 42 岁那年，对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么。在一次无目的旅行中，她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表现了一个不幸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手——作家仿佛无意中将他的年龄写得与叙述者的大儿子相同。在输掉了全部财物后，他十分绝望地离开赌场，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诺花园结束他毫无希望的人生。一种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了他，并用尽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去拯救他。他以为她是常见的那种纠缠不休的女人，极力想摆脱她，但她仍跟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极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与他同床共枕。在这个即兴的爱夜之后，她让这个年轻人——此时显然他已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绝不再赌博。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答应在他离开前到车站为他送行。然而，此时她已开始对他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为留住他而牺牲一切，下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但各种意外的事缠住了她，结果她没赶上火车。她怀着对已走的年轻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赌场，结果大吃一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来赌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于他的赌博激情中，竟骂她是碍事婆，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拯救他的钱抛给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

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会深深感动读者。但精神分析学指出，小说的意图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亲自使他了解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masturbation）的可怕伤害（很多论及救赎主题的作品都有同样的起源）。手淫的恶习由赌瘾替代了①，强调手的热烈动作透露了这一由来。确实，玩赌的爱好是手淫这一原始激情的对等物，“玩弄（playin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描写用手摆弄生殖器的一个词。那种无法抵抗诱惑的本质，那种严肃的永不再犯的保证（然而永远也做不到），那种让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这一恶性的感觉——所以这些因素，都保留在赌博这一手淫的替代方式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这一定会让儿子想到：“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手淫对我有怎样的危害，那么她

① [在 1897 年 12 月 22 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手淫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后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 79）]。

肯定会把我从手淫中拯救出来，而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温情都发泄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成妓女，这种母亲即妓女的观念与上述幻想相联系，它使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伴随着幻想的不道德的念头给故事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赋予小说一个“外观”、以此来极力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图，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到一种突然的、神秘冲动的支配，是极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却揭示出这个长期没有爱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惊讶的行为，其动机是十分充足的。为了忠实于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装以抵抗所有相似的诱惑。但是—— 这里，儿子的幻想是对的—— -作为母亲，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潜意识的爱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命运在这个不设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用破除这一习惯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这么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毕竟，我们没有发现一例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体性欲满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压制自体性欲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则早已真相大白，更无须多加赘述了[1]。

---

[1] 这里表达的许多观点可以在乔兰·纽费尔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杰作中见到(1923)。

附录 弗洛伊德致西奥多·里克的一封信

[**英文版编者按**] 在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西奥多·里克（Theodor Reik）在《意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此文的评论（1929 年第 2 期，第 15 卷，第 232～233 页）。虽然里克在评论中对弗洛伊德的文章总体上是赞赏的，但他仍以相当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评价偏颇且苛刻，而且对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阐述的道德观也持不赞同的态度。里克甚或对弗洛伊德的论文形式、以及结尾的明显脱离正题提出批评。弗洛伊德读了这些批评后①，寄给里克一封信作为回答。此后不久，当里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再行发表时（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复信也收进去。两者文章的英译版见后来里克发表的著作《我与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纽约，1940；伦敦，1942）。得到西奥多·里克博士的同意后，我们才在这儿发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订译文。

1929 年 4 月 14 日

我怀着极其快乐的心情拜读了你对我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评文章。你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值得我考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我想提出一点我的辩解意见。当然，这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认为你对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标准。我写它是要让某人②高兴，并不是情愿的。我如今写作总是不情愿，毫无疑问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我草率、虚假的判断开脱，而仅仅是为这篇文章粗糙的结构做一个解释。我不否认我在文中加入了对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确给我的文章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但细想一下，它的出现也有几分道理。假如我对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报刊上不予考虑的话，我一定会写道："我们可以推断，压抑手淫的欲望，在伴随着严重的罪疚感的神经症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推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沉迷完全证实了。因为，正像我们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等等。"这就是说：这个短篇小说中用于这类描写的篇幅不是由这种关系——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另一种关系——手淫与神经症的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这个结论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坚信对伦理学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不愿否认优秀的庸人也有好的伦理行

① 参见注②，英文版第 196 页下面。

② 毫无疑问，爱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这篇论文（琼斯，1951，第 152 页）。

为，尽管他要以自我约束为代价①。但是，与此同时，我承认你所支持的伦理学的主观心理学观点的合理性，尽管我同意你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认为你否认美好的未来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议的，我把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列，对他我能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于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对爱情时他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奈。他真正了解的只有残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从和出于怜悯的爱情。尽管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热烈和卓越无限的赞美，但你怀疑我并不真正喜欢他，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对的。这是由于我对病态现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消耗殆尽了。在艺术和生活上，我对它们也无法容忍。这些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属于别人。

你打算在哪里刊出你的论文②？我对它的评价很高。科学的探索必须戒除自以为是。当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见是在所难免的……③

---

① ［里克写道："克制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只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惟一的一个，优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怀着迟钝的感觉屈从于权威们，并且由于他缺乏想像力，克制对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显得更加优越。"］

② 虽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许会再印的疑问，但好像在《意象》杂志刊出此文之前，里克已给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评文章。

③ 参见上页注②。

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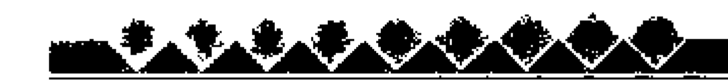
——与无偏见的人的谈话

(1926)

廖 凤 林 译
索 宇 环 校
邵 迎 生 修订

按语

所谓“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指的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甚至对医学知识、医疗技术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可否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只有医生才有权利实施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外行—非专业人员”只要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掌握潜意识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技艺，就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



引 言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释一下。“非专业者”就是“非医生”。现在的问题是非专业人员是否也可像医生一样被允许进行精神分析。该问题受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限制。就时间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去关心由谁来进行分析的问题。确实，人们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的惟一共同点是希望没有人来从事精神分析。对此，他们陈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不喜欢精神分析。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医生才可从事分析的要求与对待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显然更友好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这种态度不被猜疑为是对早期态度稍作改变的话。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分析疗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有医生才有资格。为什么要做这种限定？其理由还需探究。

再就空间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引起相同的重视。在德国与美国，分析治疗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个患者都可以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式。患者选定的任何医生，有的是“庸医”，能够为所有的患者治疗。惟一的限制是，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①]。法律只在医生受到起诉，需要补偿他给患者带来的某种伤害时才起作用。但在奥地利——我正在此并为此写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规定，禁止非医生给患者治病——而不论实际结果如何[②]。这样，外行人（非医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给患者治疗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一出现，显然就被法律的条款解决了。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非专业人员不是医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治疗程序，而整个治疗过程都应委托医生进行。以此推断，不应允许非专业人员对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则应受到惩罚。结论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几乎不怎么争论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了。同时，有些复杂情况法律不想干涉，但却值得考虑。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分析治疗的事件中，神经症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非专业人员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医生还没有真正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医生的资格，还不具备满足患者要求的医疗素质。如果这真是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前，人们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干涉非专业人员的分析治疗也是情有可原的。

---

① 这实际上不只在美国是这种情况，英国也如此。

② 在法国同样如此。

一

这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熟悉分析治疗的特殊性的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分析治疗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认为是公正的、但目前对分析治疗仍然无知的人们。很遗憾，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无法让这些人在场旁观，因为“分析的情境”不允许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疗的不同时期，其价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经许可的听众若碰巧有机会听到了分析治疗的某一过程（时期），一般地说，只会使他形成对此的无用印象。他会处于难以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的危险状态中，或者他会感到乏味。所以，听众一定要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尽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个病人或许正遭受着他控制不了的情绪波动的痛苦，或许正遭受着由于他认为他没能适当做事而感觉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觉的煎熬，也可能正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但并不理解其原因）他难于从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难于做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并难于贯彻决定。也许有一天他由于焦虑而极度苦恼（但他不知道苦恼的由来），从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独自沿着大街行走或乘火车旅行。他也许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种活动。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游，以致他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它们尽纠缠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摆脱。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数数房屋前的窗户有多少个等。当他从事像寄信、关掉煤气阀等简单活动后，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这或许仅仅是件令人烦恼和麻烦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总排除不掉一种想法——自己把一个小孩推倒在汽车轮子下，或者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水里，或者他不得不反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就是警察正在抓的与那天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的凶手，那这种状况就会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他绝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通缉的谋杀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会那么强烈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病人——这次让我们选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领域遭受着另一方面的痛苦。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被痉挛困扰着，不听她使唤。或者，当她想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她会即刻有一种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交聚会是不相容的。因此，她放弃赴任何宴会、舞会，放弃光临剧院或音乐会。她时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头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制去吃那些从长远着对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后，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实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

激惹场合，她就晕倒、肌肉痉挛，进而引发可怕的病理症状。

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所受的干扰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感情生活与某种身体需求相结合。若这些病人是男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最温柔的感情对异性做适度的身体表达，尽管他们或许可对不太喜爱的物体做出自如的反应。世俗的感情把他们与他们看不起又想摆脱的人们联在了一起。或者，类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愿完成的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如果患者是女性，她们会感到当她们有性生活要求时会被焦虑、厌烦或不知名的障碍所阻挡。如果她们屈服于爱恋，她们会觉得自己是受了享乐的欺骗——这种享乐是本性提供给此种屈服的一种奖赏。

所有这些患者都承认自己有病，并前去就医。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们期望自己的神经错乱可得到排除。医生也要把病人划分为不同类别。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诊断病人，并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病症名称下：神经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症等。他们检查与发生上述病症相关的器官，诸如心脏、胃、肠、生殖器之类，发现这些器官都很健康。医生建议病人中断他们久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通过这些手段，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改善，或者根本不会改善。最后，病人听说有些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很有一套办法，开始接受分析治疗。

在我写这篇关于神经症状的专题论文期间，我设想就在分析现场的“公证人”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这点上（对患者施予分析），他开始注意并感兴趣。“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如何治疗那些医生不能给予帮助的病人的。”

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除了相互交谈什么也没做。分析学家不使用任何仪器、甚至不给病人检查，也不开什么药。如可能的话，在治疗期间，他甚至让病人保持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许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分析学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病人会面，启发病人交谈，听他倾诉，然后接过话茬对病人讲话，让他听自己谈。

现在“公证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信任和轻松的神情，但又明显地存有轻蔑。他仿佛在想：“就这么谈谈而已，话语，话语，话语，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他肯定还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讽的话：与话语相伴可以使人们多么舒服①——一段德国人有永远不会忘记的台词。

“看来，这是一种法力，”他评论道，“你们凭说话，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给说跑了。”

确实，分析如能比医药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说是魔术。魔术师的基

① 在《浮士德》剧中第一部第四场中关于学生的场面。



本要素就是速度——人们说快速导致魔术师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疗要花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魔术慢到如此地步时，它就不具备奇迹般的特征了。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蔑视语词吧。语词，它毕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过语词，我们相互传达感情，这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方法。语词，它的好处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诚然，“行为在先”①，语词在后；在某些情况下，当行为被软化为语词时，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但语词在最初出现时，是一种魔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并且它一直保持着它起初所具有的那么多的魔力。

这个“公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假定，病人跟我一样对理解分析治疗没有知识准备，那么你如何使他相信语词或语言具有可使他摆脱痛苦的魔力呢?”

当然，如若必须让他有所准备，那末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对分析者绝对坦白，不要有意隐瞒任何闯入大脑的思想，抛弃任何可能阻止他报告某种思想和记忆的消极因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些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自认为不可能告诉他人的事情，这些是他的“个人隐私”。他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个伟大的进步——人们有一些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喜欢向自己隐瞒，为此，一旦它们在头脑中出现，他会突然住口，并极力把它们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或许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他意识到他在自己隐瞒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从前一直所认定的那样是个统一的自我，似乎他体内有某种与自我相矛盾的东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识到自我与精神生活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立。假如这时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说出一切隐情，那么，他将容易地预感到——在此等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与一个人进行思想联系和思想交流将同样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们的“公证人”说，“你认为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压抑他的东西、某种秘密。通过诱导，他向你说出这个秘密，你就减轻了他的压抑，挽救了他。是的，这就是坦白原则。从远古时代起，天主教会就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天主教对人们精神的统治。”

我们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无疑，坦白在分析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或者说是分析的前奏。但这远不能构成分析的本质或者解释分析的结果。在“忏悔”中，忏悔者要讲出他知道些什么；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讲出更多的东西才行。我们从没听说过，“忏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摆脱真正的病理症状。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开始反驳说，“‘他讲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为一名分析专家，你已对你的病人产生了比神父对他的忏悔者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与病人的接触时间更长，更深入，也更个人化。

① [“Im Anfang war die Tat.”（出自《浮士德》剧中的台词，第一部，第三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用了同样的话作结尾]

还因为你可用这种特别的影响让他丢弃他那些病态的想法，用言语让他摆脱恐惧等等。如想同样用这种手段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现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处于一种催眠状态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能实现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术，便可与他建立一种催眠关系——他对你有一种微妙的依赖倾向——即使你可能并没打算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取得的惊人的结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来得快，而且你告诉过我，分析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公证人”不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如此无知，或如此糊涂。某些迹象确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识的帮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极力把分析与他已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困难是让他清楚他的这种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种特殊过程，具有新奇和独特性，只能借助于新的顿悟——或假设（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们的公证人还在等着我们对他的最后评论做出回答。

你谈到的关于分析者所产生的特殊的个人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且在分析中起着极大作用——但与在催眠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与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应该不成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催眠暗示中并不利用“暗示”这种个人影响因素去抑制疾病症状，而人们却在催眠中利用暗示来压抑疾病症状。认为这种因素是分析治疗的工具和促进者，且贯穿分析始终，也是不对的。无疑，分析之初它是这样的，但到了后来，这种影响开始背离我们的分析意图，迫使我们采取最深远的对策。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分析技术远不是转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语帮他摆脱困扰之类。如果我们的一个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们不会劝告他无视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做，却没能奏效。我们所要做的是，让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感觉必然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而这个事实根据是有可能找得出来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实现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将不胜惊讶，”公证人说，“但你的分析意图是什么？你要对你的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要讲一些你们能够理解的内容，那么我肯定会讲只有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才知道或才受重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些理论中，你们很容易推断出我们应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信息，以及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我将像阐述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教条地、详细地给你们解释。但不要以为这个理论是以这样的

哲学体系似的结构出现的。这一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努力解决每一个问题，并结合观察结果不断修正它，最后才使它完善成我们的目标所追求的形式。若是在几年前，我将不得不用其他术语来阐述这一理论。当然，我还不能向你们保证今天我所阐述的理论就是这一理论的最终形式。你们都知道，科学不是一本启示录，在一门科学出现了很长时间以后，它可能仍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可靠性和恒定性。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科学还很年轻，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研究的是人类所能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的解释，你就很容易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你们如果没听懂或想得到进一步解释可以随时打断我。

"在您开始前我就想打断您。您说您想要给我们讲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但我本来知道心理学已不再是新兴学科了。已有的心理学派、心理学家已经够多的了。我在大学时就听到过这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了。"

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重大成就应属感官生理学范畴，而心理生活的理论却由于误解而被禁止研究，而没能发展起来。今天的研究包括些什么呢？是在大学里教的那些吗？除了那些感官生理学领域有价值的发现以外，大量的心理过程的分类和定义已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知识。这应感激语言学的应用。但很显然，这些分类和定义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心理生活。你是否注意到了：每一位哲学家，每一位富有想像力的作家，每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小说家，都构筑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学。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心理活动相互联系和目标的独特假设。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看似合理，但同样都不可信。它们明显地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心理学领域可以说没有地位，没有威信。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胡为"。如果你提出一个物理或化学上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会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大胆地做出一个心理学假设，你就必须做好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评判与驳斥的准备，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业知识"。每个人都有心理活动，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心理学家，而我却觉得这个头衔对于他们是不大合适的。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申请做保姆的人，当被问及她是否会看孩子时，她回答："当然，毕竟我也曾是个孩子呀。"

"您宣称您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发现了一直被每一位心理学家所忽视的心理生活的'普遍基础'，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我们的发现的来源并没使那些心理学家们丧失其价值。举个例子说吧，胚胎学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天生的器官畸形，就不值得信赖。我给你们讲过，有的人思想失控，所以他们倾向于担心一些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你们认为学院心理学能够在解释这种精神失常方面做出贡献吗？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在晚上，我们的思想各行其是，产生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念头，令我们

迷惑，怀疑这些念头是由于病理原因引起的记忆恢复。这就是我们的梦。普通人总是坚定地认为梦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能说明点什么，学院心理学却一直没能告诉我们梦的含义是什么。它对梦无能为力。即使它试图做出解释，也是非心理学的，比如，将梦归因于感官刺激或大脑不同部位睡眠深度不同等等。但是公平地说，一种心理学如不能解释梦，那么它对于理解心理生活就是无用的，它也不配称为一门科学。

“你太激进了，很明显，你已把问题引向一个极其敏感的区域。我听说过，精神分析的确很重视梦这个现象，它在梦的背后寻找真实事件的记忆。但我还听说，对梦的解释也是因人而异的，就连精神分析家们自己也还在争论释梦的方法，争论从梦中得到的结论的合理性。如果真的这样，你就不该如此肯定精神分析的优点已远远超过学院心理学。”

你说的的确包含了许多事实。实际上，梦的解释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如果我表现得过于激进了，那只是我的一种自我辩护方法。当我想到一些分析者对释梦理论所做的损害时，我就很伤心，表达出悲观的论调。像伟大的讽刺作家内斯特罗伊①曾说的：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有它最初看上去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不知你们发现了没有，人们从来不会曲解他们已经掌握了的事情。只要有点预见性和自律性，许多释梦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你们更会同意，如果我们如此远离正题讨论下去，我将无法进行我的理论阐述。

“是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接下来你打算告诉我们这种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一开始要讲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分析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仪器”结构的蓝图。

“你的‘心理仪器’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一会儿你们就会清楚什么是“心理仪器”了，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它是由什么制成的。这不是心理学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此不关心，就像光学研究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厚纸板做成的不感兴趣一样。我们应将“材料”这个问题②搁在一边，而只保留空间问题。我们勾画出来的这种不知名的仪器，能像真实的一样进行心理活动，这种仪器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我们称做“代理处”），每一部分执行一种特殊功能，互相之间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被理解为“前”与“后”、“表面”的与“深层”的——我们只是说，它首先代表功能的有规则的顺序关系。我讲清楚了吗？

“恐怕没有，也许我以后会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东西很像奇妙的灵魂解剖

① 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1801～1862），维也纳著名的喜剧和滑稽剧作家。

② 心理仪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

学——自然，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事情再也不存在了。"

那你还要怎样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像许多其他科学假设一样，早期的假设通常很粗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尚待修正"。现在我似乎没必要求助于"好像"这个普遍手段。这种"虚构"（哲学家法伊英格尔（Vaihinger）[1] 这么称呼过）的价值大小在于研究者可以凭借它获得多大的成就。

还是让我们开始吧。从日常生活知识出发，我们会认识到，人类有一种心理组织（mental organization），它介于感官刺激和身体需要与行为动机的知觉之间。这种组织的介入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将它称做"自我"。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我们中的每个人即便不是哲学家也能做出这种假设。但我们认为它不足以详尽描述心理仪器的全部。除了"自我"，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心理区域，它比"自我"更广泛，更重要，更隐蔽，我们称之为"本我"。"自我"与"本我"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

你也许会反对我们选择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这两个代理处或范围，而不给他们取一个响亮的希腊语的名称。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贴近普通的思维模式，并尽量使概念更适用而不是被丢在一边。这不是什么优点，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被病人所理解。虽说他们通常都很聪明，但不都博学。"本我"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和普通人的某种表达方式很接近。"它从我身体里穿过，"人们说，"刚才有种比我自己还强大的东西存在于我的体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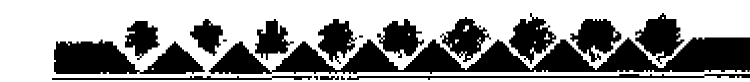
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类比来描述事物。这并不奇怪，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做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这些类比，因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供我们长久利用。因此，为了搞清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我必须让你们将自我看成是本我的表面，就像它的一个外层或表层。我们可以依据最后这个类比展开讨论。我们都知道，表层的特点受其接触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是心理仪器的（本我的）表层，它受外界（现实）的影响。这就告诉你，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对用空间观点来看事物的做法是何等重视。对我们来说，自我的确是表层的，而本我才是深层的。当然，这只是从外面看。自我介于现实和本我之间，是真正的心理机制。

"我还不想问这些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请先告诉我，你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差异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什么引导你发现了它？"

你的问题为我下面的讲解引了路，因为了解自我和本我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是

---

① 汉斯·法伊英格尔（Hans Vaihinger，1852～1933）。他的哲学体系在《似乎哲学》（1911）中做了阐述。奥格登（C. K. Ogden）的英译本出现于1924年，题目是《"好像"哲学》。这本书在讲德语的国家里相当流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5章末尾对此做了长篇讨论。



件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控制心理活动过程的规则在自我中和在本我中是不同的，自我通过其他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关于这个我可以讲出很多，但也许你愿意听一个新鲜的类比和一个例子。想一想在战争期间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会惊奇，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那么大的差异，许多事情在后方部队中是允许做的，而在先头部队中却被禁止。当然，对此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在于先头部队更接近敌人。当然，在心理活动中这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更接近外部世界。有时候“外界”、“陌生”和“敌视”都是相同的概念。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上来。在本我中没有冲突，矛盾和对峙同时存在，却无关大局，本我对它们的调节通常是以折中的方式进行的。而自我在类似的环境中，会感到都是非解决不可的矛盾。而这种解决恰是舍一方留一方的冲动。自我这个机制的特征，是明显地倾向于统一、综合，这个特征在本我中是没有的。在本我中，可以说“全部分裂”；不同的欲望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互不关联。

“如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领域或‘后方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个事实呢？”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问题上来了。心理学自己闩上了通往本我领域的门，因为它坚持一个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的假设，即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①，有意识是衡量什么是心理活动的标准。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些过程没有被意识到，那么，它们就不是心理活动，它们就与心理学无关。

“但是我应该想到是这么回事。”

是的，心理学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种想法一驳即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区分。最迟钝的内省者也会发现，某些想法若不做准备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你又从未感受到思想的前奏，虽然它们的确是一种心理现象，而进入你的意识中的只能是准备好的结果。偶尔你可能会在回顾中，比如重新建构中，意识到这些准备阶段的思想结构。

“也许某些人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准备过程。”

借口！你不能以此来说明这个问题，心理活动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它在你的头脑中发生了，而你的意识和你却都不知道。或者你是否想说明多花些或少花些注意力就可以将非心理行为转化为心理行为？但问题是争论又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催眠的方法，如果有人愿意去学的话，他就会从中找到潜意识的铁证。

---

① 这里的德文“Bwusst sein”，字面意思为“被意识到的”。这个词（基本的词性是名词“意识”）当然通常不用连字符。这里的连字符表明：弗洛伊德强调“bewusst”一词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参见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65页注）里编者的注释。这个词在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一章接近开端处以同样方式和同样目的被分割开来，而印的是两个分开的字却没用连字符相连。这里的连字符只见于1926年的版本，而在后来的德文版中，连字符被错误地省去了，而把两词放在了一起。

"我不想退却，但我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说的'自我'就是意识。你之所谓'本我'是下意识（subconscious），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这些。但你为什么给他们化了装，用了新名称?"

这不是化装。其他名字是无用的。不要试图用文学代替科学。如果有人谈到下意识，我就不能分清他所说的是心理地形学意义上的——表示头脑中位于意识之下的某种成分，还是实质性的——藏于表层下面的另一种意识。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这些。惟一可信的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但是将这种对立简单地等同于自我和本我间的区别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如果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那样我们的理论就会畅通无阻，但事情决非如此简单。真正的事实是：本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而且总是潜意识的，而在自我中发生的进程本身就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但并非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或总是而且也不必总是有意识的。自我的大部分也可能永远是潜意识的。

心理过程成为有意识现象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忍不住要再次教条地强调我们有关该问题的假设。也许你已经记住了，自我是本我的外围的、边缘的一层。现在，我们相信，在自我的最外层有一个特殊的代理处，或者叫系统或器官，它直接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对它的刺激，我们称做意识的现象便产生了。这个器官能够从外部均匀地接受刺激，以此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在感觉器官的帮助下）。它还能接受来自内部的刺激，这样便首先对本我中的感觉做出反应，然后又对自我中的进程做出反应。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我能理解的越来越少了。说到底，你就是想让我参与讨论一个问题：非心理医生是否应该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讲出这么一大堆大胆却又模糊的观点，而你自己又不能让我信服，那么，讲它们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这也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此。当给学生上精神分析理论课时，我们能够看出，开始时，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浅显，他们对待精神分析理论就像对待灌输给他们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样冷淡。他们当中的少数人也许希望被说服，但却丝毫未见有人被说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要求每一个想在他人身上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先让自己服从于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个自我分析（该词似易被人误解）① ——即一边亲身体验分析所要求的过程，一边对他们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的思想施以影响时，他们才能够信服，并在日后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实践。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简单的、因而不好理解的理论。由于你们没有亲身经历，又无法证实它们，所以我怎么能指望说服你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呢?

---

① 该词"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现在被通常作为"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自我分析"的真实含义在下文会提及到（弗洛伊德，1926c)。

我另有目的。我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分析是否明智，也不是关于假设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理论，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借此可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理论包含的观点的范围，了解精神分析法对待病人所依据的假设是什么，以及这些假设对病人的作用。用这种方法必将有助于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不要惊异，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讲，那你已经通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接下来的所有问题对你们来说都将很容易。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去休息片刻。

三

"我猜想，你可能想告诉我如何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勾画出神经症患者的病因。"

我会尽量说清楚的。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自我和本我，从动力心理学角度，也就是说，注意它们当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对心理仪器的描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惟一担心的是它会再次变得难于理解。"

我希望不会。你很快会发现你已走入其中了。现在，我们假设驱动心理仪器的力量来自身体器官，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的需要。你们会记得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话："饥饿和爱推动了世界。"[1]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是两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给引发精神活动的生理需要取个名字叫"本能"[2]。这个词会使许多现代语言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本能构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简而言之，都源于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来源也是本能，它从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么这些本能想得到什么呢？满足，即建立某种环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缓解需要的紧张程度会使我们的意识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强需要的紧张程度则很快会使我们感到不悦。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紧张程度的波动中诞生，整个心理仪器就是借助于这个情感系列而调节着它的活动，于是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的控制"。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就将出现一些很棘手的境况。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满足本能的环境只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当这时，本我中直接面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开始起作用了。如果让心理仪器运转起来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本我，那么自我就承担着掌舵的任务。没有自我，目标是无法达

① 席勒：《世界的性质》。

② 该词德文为"Trieb"（本能）。对该词有各种译法，最通用的译文为"drive"（做"驱力"解），在标准版本里用了"instinct"（本能）的译法的原因在第一卷《概论》中讨论过了。

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价，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让本能照这样行事，将什么也得不到，甚至还会招致损失。预防这种不幸，调节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它在感官和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机会，让本我得到无伤害的满足。另一方面，它影响着本我，抑制其“冲动”，引导本我中的本能延缓它们要求的满足。如果确有必要，自我还将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者作为某种补偿，它将放弃这些满足。自我在用这种方法制服本我的冲动的过程中，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原先是决定性的，而现实原则追求同快乐原则一样的目标时，却要考虑真实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条件。后来，自我认识到，除了适应我已描绘的外部世界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满足的方法，即通过改变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里有意识地建立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它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自我决定何时方便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使之屈服于现实，何时又倾向于去满足本我的需要从而去反抗外部世界，这种决定构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虽然本我没有自我强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这样控制吗?”

是的，如果自我拥有整个组织和效力，如果它有进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并能影响它们，则什么都好办了。因为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没有天然对立，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条件下，它们其实已不能互相分开。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关系中，怎么还能存在一丝病理性失调的可能呢?”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满足这些理想的条件，那就不会再有神经性失调了。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想像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学的人不会惊奇找不到原则性的证实：那就是带来疾病，导致功能失调的祸首，恰恰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异。

“你讲得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话。”

我必须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实。一个有生命的小生物体，即使它充满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相比于强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是不是? 一种自我组织仍没有发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处于所有这些“创伤”的控制之下。它靠着本能愿望的盲目满足过活，最后通常消亡了。自我的变异，首先是向自我保存迈出的一步。无可非议，从破坏中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已经幸运地熬过“创伤”而活了下来，那么他会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会仅凭一简略的印象复本就能以焦虑情绪指出危险所在。而这个印象是在他战胜“创伤”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这种对危险知觉的反应就表现为企图逃跑，这样做可以达到拯救生命



的效果。在某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前，也许只能逃跑。

"这些可不是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你没注意到我就快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组织刚发育成熟的生物体，在他们童年期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几乎没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无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这种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制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我想抵制（因为我知道满足本能需要是危险的，我将幻想出创伤性情景，并将会与外界发生冲突），但是自我又控制不了这种本能需要，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在此情况中，自我视本能的危险如同外部的危险一样，自我克制自己不去响应本能的冲动，并企图逃避，从本我中撤出，让本我自己听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制本能冲动的机制，暂时，还有防卫危险的效用。但是，人们不要泰然地把内部和外部混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在抑制状态下自我遵循快乐原则，并习惯于矫正，结果必定在报复中受到损伤，这表现在自我已永远缩小了它的影响范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现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无法接近它，也影响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后来，当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仍不能解除压抑作用，它的综合性被破坏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块禁地。孤立的本能冲动不再无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弥补被否定了的正常满足，它创造出心理派生物来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离开自我。最后，它以一种不被承认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和意识，生成我们所谓的"症状"。这样，神经症障碍的特性就一下子变得明显了：一方面，被禁锢在综合体上的自我对本我的各部分毫无影响，为了避免与被压抑的本能产生一场新的冲突，自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行动。自我在防止疾病——这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派生物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中耗损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面，个体的本能已独立存在于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顾个人的整体利益，只遵循本我深处的原始心理法则，追求它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观测整个形势，我们将得出一个神经症发源的简单公式：自我企图以不适宜的方式去压制一部分本我，但这种尝试失败了，本我就进行了对它的报复。所以，神经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自我已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正如详细调查所说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保持它的适应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因为忠诚服务于内在本质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结果陷入了与本我的冲突之中。但是应该注意到，冲突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现实和本我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调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我的长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压抑工具去处理冲突，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因素。这种现象

又是因为，当自我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它是无能力的、不成熟的，而决定性的压抑行为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1]。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做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

---

[1] 参见弗洛伊德的《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

四

"这半天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听起来有些陌生、难懂，也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纯'心理学了。迄今为止，我对你的精神分析了解很少，但我听传闻讲，你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与精神分析无关。你一直未能谈及此类正题。这让我觉得你是在有意隐瞒什么事情。我还有另一个疑点，我不想隐瞒它。毕竟，如你所说，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失调。那么，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想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对那些意识深处的障碍不起任何作用，这可能吗?"

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将把最低级的意识与最高级的意识的考虑撇在了我们的讨论之外?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目前阶段还没考虑到心理生活的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也打断你一次，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暂停一下。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在头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心理学是仅限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为外行所不知。因此，一个精神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习这种心理学，这种深蕴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或者至少该学习当今人们已了解的这种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种心理学知识作为我们以后立论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所提及的"纯"意指什么呢?

"噢，有关报告一般都说在分析中详细地讨论性生活中最隐私和最肮脏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我从你的心理学论述中推断不出那样做的必要性——那将有利于说明应该把治疗限制在医生的范围。人们怎么肯把自己的隐私处理权交给那些自己不相信其判断力而其人格又没有保障的人呢?"

医生确确实实在性的领域内享有一定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去检查人们的生殖器。当然啦，在东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曾反对医生的这一特权（你知道我所提的那些改革者是指哪些人①）。但是，首先你应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特权，和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是的，在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权。

这种特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因为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公正、坦率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政府要十分详细和公开地讨论财政状况，而平民百姓谁都不让知道，即使他不是竞争者或征税者。对公正坦率的绝对要求也给分析家施加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观点。

---

① 毫不怀疑是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们。见《论移情之爱》的论文（1915a，标准版，第12卷，第161页）中有同样的论述。

特权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探讨神经症成因和突发因素时，来自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和主要，也许可以说是十分特殊。除了与病人及病人提供的素材保持密切联系以外，精神分析还能做什么呢？分析医生从不把病人引诱到性生活方面去。他不会一开口就对病人说："我们来谈谈你性生活中的隐情！"只有当病人自己喜欢谈时，医生才能有机会倾听；反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病人自己提及性的事情。我过去也常提醒我的学生："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只可接手那些与性无关的病例。我们要小心，别把性因素引入我们的分析中来。否则，我们将无缘发现这样一个与性无关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与性无关的病例。

当然，我知道，我们对性的认可已成为（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对分析怀有敌意的人最反感的东西。但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吗？这种反对情绪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是多么的神经质，因为，很显然，正常人的行为和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已相差不远。有一次，当精神分析受到德国众多学会的严肃审查时——到今天，事情不那么张扬了——其中一个发言人要求拥有特权，因为他说，他甚至允许他的病人自由谈论：当然是为了诊断的目的和检测分析医生的诊断。"但是，"他又说，"如果他们开始谈论性的问题，我就制止他们。作为一种阐述方法，你觉得这样做怎么样？"德国学会为这位发言人喝彩，并没因他谈到性面感羞愧。只有用普遍的偏见意识带来的自鸣得意能解释这个发言人何以如此缺乏逻辑思想。几年以后，当年曾经是我的追随者的几个人再次深感有必要把人类社会从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精神分析则力图把它强加给人类社会。他们当中有人解释说，所谓性并不仅仅指性行为，还指其他一些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类寻求满足他们感知自身能力和控制别人的需要的一个领域。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得到许多方面的支持。

"这一次，我也要冒昧表个态，我认为须有相当的胆识才敢断言：性不是生物体的自然、原始的需要，而是某种其他事物的反映。人只须借用动物做例子就可知道这点。"

那没有区别。不管有多荒唐，如果以此二者来矫正恐怖的性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将十分情愿接受。

而且，我承认，你不喜欢把导致神经症的大部分原因归于性的因素。坦率地说，这似乎与你做一个公证人的任务不甚吻合。你难道不担心这种反感会干扰你做出公正的判断吗？

"听你这么说，我很抱歉。你对我的信心似乎动摇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另外选择一人作为你的公证人呢？"

因为其他人也不可能与你的想法相差太多。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准备好承认性生活的重要性，那么人们都会惊呼："哼，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公证人，他只是你

的一个支持者!”不，我不会放弃影响你观点的希望。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依我看来，这次的情况不同于我们以前碰到过的情况。假如你的印象是，我们所探讨的是一个纯心理学的问题，那么，不管你是否相信我，我们的心理学讨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关于性的问题，如果你能认识到你心中那强烈的想反驳的动机，正是你和其他一些人所有的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我将很高兴。

“但是，我毕竟不像你，有那些能让你坚定信念的经历。”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性生活不是什么简单的下流的事，它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关于性，有许多需要了解的新奇的东西，也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待解释。我刚才告诉你说，精神分析必须溯源到儿童早期，因为决定性的压抑发生在那时候，而此时他的自我是很脆弱的。而在童年时期就一定没有性生活吗？性生活只是在青春期才开始的吗？与此相反，我们应该知道性本能的冲动自人出生起，就一直伴随人的一生，童年期的自我实施压抑行为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性本能发作。是巧合吗？小孩子们已经在与性欲望做斗争了，就像是医学会上的发言人后来做的那样，也像我的追随者们再后来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最普遍的解释通常是：我们的文明社会完全建立在对性的损害上。不过，该问题又绝非如此简单。

关于童年期性行为的发现，属于我们有理由感到羞愧的那些发现之一（因为它的明显性）[①]。一些儿科专家似乎已经知道这些，一些保育员也知道。那些自称是儿童心理学家的保育员，聪明地随即就以谴责的口气，称这一发现是对童年期单纯天性的亵渎。情感再次代替了争辩。这种事情在政治机构里是常常发生的。反对党的一名成员站起来，谴责内务部、军队、司法部等等机构的某一弊政。对此，另一位与会成员，比方说政府发言人，会针锋相对地说，这是当众侮辱国家军队、王朝甚至民族荣誉感，因而他说的是不真实的，这种神圣的荣誉感被当众侮辱是不能容忍的。

儿童的性生活当然不同于成人的性生活。性功能从开始到我们所熟悉的定型阶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由众多目标各异的本性构成，经历了几个构建阶段，最后成为生殖功能。并不是所有本能成分都均等地发展成最后的生殖功能，它们必须经过转移、改造，有一小部分还要被压抑。这么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也是有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会出现部分固着。如果后来性功能的作用遇到障碍，性驱力——我们称之为力比多——可能会回归到这些早期固着阶段。儿童性行为的研究和它向成熟的演化，已经启发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性反常。过去人们描述性反常时总是带有厌恶感，却又说不清性反常行为出现的根源。这个话题挺有意思，但是考虑到我们此番谈话

---

① 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中类似的一段话。

的目的，再给你讲太多也没有什么意义。要理解这理论的来龙去脉，需要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很不幸，这些知识在医学院里是学不到的。不过，了解一点人类文明史和神话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谈了那么多话，我仍然想不出儿童性生活是什么样子。”

下面我将进一步探究这一主题。无论如何，让我放弃这一主题是很不容易的。我将告诉你，在我看来，儿童性生活最明显的事就是儿童在他生命的最初五年里要经历其性生活发展的全部历程。从那时开始直到青春期，人的性生活经历一个所谓潜伏期。在潜伏期里，性意识一般没有什么发展，相反，性驱力在强度上有所减弱，一些曾是儿童所做和所知的事被放弃和遗忘。在生命的那个时期，早期的性生活的全盛期已经枯衰，害羞、厌恶、道德之类的自我的态度开始出现。这些态度注定要起来反抗后来青春期的风暴，并铺设刚刚苏醒的性欲之路。这种性生活的“双向发作”现象与神经症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似乎仅在人类范围内出现，而且可能是人类特有的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之一。性生活的前期发展状况被精神分析所忽略，正如在另一知识领域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的背景被忽略一样。你有理由猜测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有关早期性生活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成就①，还有很多东西要讲，这些都是我们未曾料及的。例如，听说小男孩经常害怕被他们的父亲吃了，你肯定会感到意外（你也肯定会惊讶我为什么要把这种害怕包括在性生活的现象中）。但我要提醒你，中学时代你就曾学过关于克罗诺斯神是怎样吞下他的孩子们的故事。你第一次听到它时，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但是，我猜测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去思考过它。今天，我们也能想起来，在许多童话故事中，有像狼一样的贪婪的动物出现时，我们就把它看做是父亲的化身。这会使你确信由于有了婴儿性生活的知识，我们才能理解神话和童话世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件副产品。

听到男孩子们担心被他们的父亲夺去他们的性器官的事，你也会吃惊的，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对他们人格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决定着他们今后性生活所遵循的方向。这里，神话又一次给了你相信精神分析的勇气。上述那个吞下自己孩子的克罗诺斯神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后来他自己也遭到他儿子宙斯的报复，将他阉割了，而宙斯由于他母亲的机智而得救。如果你倾向于认为所有有关儿童早期性生活的精神分析报告，都来源于精神分析家胡乱想的话，至少你必须承认，他们的想像创造出了同原始人想像活动一样的产物。神话及童话就是原始人想像活动的遗产。一个可选择的、更友好的、可能也是更中肯的观点是这样的：

① 在第一版该词是德文的“Äusserungen”。在后来的版本中写成了“Änderungen”（“变化”之意），也可能是印刷有误。

在今天儿童的心理生活中，我们仍能发觉在人类文明早期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古老因素。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儿童将以一种浓缩的形式，重复他所属种族的历史，正如我们久已知晓的胚胎学的特征贯穿机体发展的全过程一样。

幼儿早期性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女性性器官本身对性生活还没有起作用，儿童还没有发现它，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男性性器官上，儿童所有的兴趣指向他们是否有男性性器官的问题上。我们对小女孩的性生活比对男孩的性生活了解要少得多，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惭愧，毕竟成年女性的性生活是心理学未知的大陆。但我们知道女孩们深感她们缺少一个和男性具有共同价值的性器官，因此，她们认为自己是下等的，这种“阴茎妒羡”是女性大量性特征反应的来源。

两种排泄需要都具性兴趣，这也是儿童的特征。然后，教育降低了儿童这方面的兴趣。在玩笑中这种差异又一次被抹煞了。这看来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但是产生厌恶的情感，儿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就连那些在儿童心理的纯洁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也不予争辩。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通常，儿童把他们的性愿望指向他们最亲密的亲属。起初，指向他们的父母，而后是他们的兄弟姊妹。男孩第一个爱的对象是他的母亲，而女孩的第一个对象则是她的父亲（除非先天对两性都感兴趣而接受两种矛盾态度的同时存在）。父母中的一方被视为争宠的竞争者，并经常受到儿童强烈的敌意。你一定要正确地理解我。我想要说的不是儿童想要他们喜欢的父母，仅用我们成人所指的亲子关系的那种本质情感来对待他们，不是的。精神分析使我们确信儿童的性愿望，超出了我们成年人所理解的亲情，达到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各种感官满足，也就是说，极尽儿童想像力所及的范围。很显然，儿童绝猜不出性交是怎么回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情中的其他概念来代替性交。通常，他的愿望以想生孩子的目的而达到顶点，其生育方式是十分离奇的。由于无知，男孩子也有生孩子的欲望。依据熟悉的希腊传说，我们把这个心理结构命名为“伊谛普斯情结”。随着早期性欲望的结束，通常，这种结构将被放弃，从根本上分化且被改变，这种改变对以后的精神生活将起重大作用。但通常这种改变实现得不彻底，致使青春期又将这个情结唤醒，其后果会很严重。

我对你依然保持沉默感到吃惊，这可能意味着你不同意我。由于肯定了儿童第一个选择的性目标（以专业术语的方式表示）是乱伦，无疑，精神分析再一次伤害了人类神圣的情感，并要为此遭受大量的怀疑、反驳和攻击做充分的准备。事实上，精神分析已经受到了太多的反驳和攻击。真正伤害人类感情的，不是今天精神分析对乱伦的善意分析，而是把伊谛普斯情结当成人类命运的普遍结构的假设。顺便说一句，希腊神话肯定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今天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渊博的还是没有文化的人，更愿意相信本性在我们身体里埋下了天生的厌恶，来抵御乱伦的可能性。

为了我们的目的，首让我们回忆一下历史。当卡尤斯·尤里斯·恺撒在埃及登陆时，他发现那里的年轻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很快将变得对他很重要）和她的弟弟托勒密结婚了。在埃及王朝，这种事没有什么奇怪的。有着希腊血统的托勒密姐弟俩只不过履行了被他们的祖先，即古代的法老，实施了几千年的习俗。但是，这仅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即使是现在，这种乱伦也不认为是太严重。那么让我们回到有关原始时代的事件的主要证据— 神话学上。它告诉我们不仅希腊民族而且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都充满着父亲与女儿，甚至母亲与儿子间的爱情故事。宇宙论一如皇室家庭的家谱，是建立在乱伦的基础上的。你能推测出那些传说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创造出来的吗？是为了污辱神和国王把他当做罪犯吗？是为了把人类的羞事归结于他们吗？真正的原因是，乱伦的欲望是原始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当大众不得不放弃它时，乱伦的实现在神及他们的后代身上仍然是许可的。我们发现乱伦的欲望在个体的幼年期仍存在并起着作用，它与历史和神话的说教是完全一致的。

“我不责怪你试图对我隐瞒所有这些有关幼儿性生活的事实。但这反而更加激发我的兴趣，特别是因为它与人类的史前历史有联系。”

我原以为讲这些会离题，不过或许它真的有些作用。

“现在请你告诉我，关于儿童性生活的精神分析的结果有哪些是肯定的事实？你的结论仅仅建立在与历史和神话的一致性上吗？”

噢，绝对不是。它植根于直接的观察。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先对成年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在其儿童期结束 20 至 40 年后，对其进行分析，从中推断他们幼儿期性生活的内容。以后，我们直接对儿童本身进行精神分析。当我们在他们身上证实了我们曾经猜测的每一种情况时，这就是不小的成功，尽管有时有少量的掩盖或曲解。

“什么？你们已经对小孩进行了精神分析？不足六岁的孩子？这可能吗？对那些儿童做这种事是不是太危险了？”

分析进行得很顺利。在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身上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是很难被人们所相信的。儿童在这个年龄心理非常活跃，儿童早期的性欲期同时也是他们智力飞速发展的时期。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在精神上变得压抑，且更愚蠢。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儿童失去了他们自然的魅力。至于早期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危险，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二十年前第一个接受分析实验的孩子，现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康而有能力的年轻人。尽管也有一些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他顺利地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对早期精神分析的其他“牺牲者”，事实将证明是无害的。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未来它们可能更为人们所重视。从理论观点来看，它们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为成人精神分析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资料，因此会使精神分析者

避免了某些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错误。分析者常意外地发现一些导致神经症的因素，且这些因素已经在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准确诊断该病。的确，为儿童的利益着想，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要和教育措施相结合，分析的方法还要继续完善。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即神经症的阶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更精确地观察，我们就想说儿童时期的神经症不是特例而是规律，在婴儿从先天的素质走进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神经症似乎完全可以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幼儿期的神经症被自然地征服了。但是它会不会在普通健康的成人身上留下痕迹呢？另一方面，在那些以后得神经症的患者身上，我们从未发现与幼儿期疾病的联系，虽然在当时它不一定能引起注意。同理，我相信，今天的内科医生也一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幼儿时期都患过结核。当然，在神经症中，免疫因素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只有先天素质因素。

现在我来谈关于结论的肯定性。从直接地对儿意的精神分析的检查中我们已经普遍相信，我们对成年人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在儿童时的情况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大量的病例却证明了另外一种肯定性。一些患者的精神分析材料使我们构建出他们并没有记住的那些发生于其幼儿期的一些外部事件。幸运的事情以及来自父母和护士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所推测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当然，这种巧合并不经常发生，但如果它发生了，就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你一定知道，不管这些事是否允许客观地证实①，对被遗忘的儿童经历的正确地重新建构，总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儿童如此幼小的年龄发生了，在那时，它们还可能对软弱的自我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哪类事件是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发现的？”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那些能够永远地影响儿童朦胧性生活的事件，如对成人性生活的观察，或者儿童自己与成人或与另一个儿童之间的性经历（这不是少见的事情）；或者，无意中听到的在当时或以后回顾时才理解的别人的谈话，儿童认为他可从这些谈话中得出性生活是神秘和不可思议事件的结论；此外还有儿童自己的言行，这些言行表明儿童对别人爱与恨的重要态度。在精神分析中，诱导出病人自己已遗忘的儿童期的性活动及被成人干扰的导致性活动结束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借此机会我要提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儿童性生活的本质？正如你所说，精神分析实施前，这种发生于儿意早期的经历一直是被忽略的。”

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

① 参考弗洛伊德后来论述此题的文章（1937d）。

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淫荡？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做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

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

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像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古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①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

---

① 这句话是德文：“Wär ich besonnen, hiess ich nicht der Tell.”席勒的剧《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三场。

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做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伊谛普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

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伊谛普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做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做“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

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 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面是将其用做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已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

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①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无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 这不

① 这一节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于弗洛伊德早期有关分析技术的论文，有某些段落几乎与原文一模一样。

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么?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爱在一些病例中并不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都十分清楚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们爱的放荡和敌对的情绪显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对它们的对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反抗它们，想把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压抑起来，不被人察觉，这就出现了不适应和神经症。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热恋上分析家的形式重复了过去体验过的经验，经过伪装的心理欲望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与他的神经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患者也在重复着先前的防御性行为，在他与分析家的个人关系中，他最好地重现了他生活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历史，他所显示给我们的正是他过去糜烂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导致他心理疾病的关键：他将过去的经历真实地再现出来，就像正在发生而不是在回想。在这种似乎对分析有威胁的新情境的“帮助”下，分析得以继续，有关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这太令人费解了，患者难道真那么容易就相信他并非在真正地爱，而是在重演过去的经历吗?”

现在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处理“移情”的全部技艺就在于首先要让它发生。你知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分析技艺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在这点上，既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试图以压抑和忽视这种移情来回避问题无疑是种蠢行。治疗中不这么做，就称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现移情时就送走他们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这就像祈求神灵出现，当它真的出现了又被吓跑一样。的确，有时候什么都不灵了。有些病例中正因无法控制移情的发泄，而不得不中断分析，但我们至少应尽全力为患者的恢复做一番斗争。屈服于患者的移情需求，满足他对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仅基于道德因素应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制止，且作为达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无效的。潜意识观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传递给患者，他的神经症将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给患者部分满足，以换取患者的进一步合作，他会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师去劝一个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终未信教，而牧师离开时则保了险。所以，惟一可能解决移情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过去。当他真实地经验到类似的经历，或者通过他想像中希望做的那样去描述类似经验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需要分析者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你假定的神经症患者体验到的移情之爱的原型又在哪儿呢?”

在他的儿童时代，通常在与他的异性父母相处时形成。你该记得我们说过来自早期经验的情感联系有多重要，所以在这里不多谈了。

“你讲完了吗?对你的话我还有点困惑。请告诉我该如何且到哪里去了解分析

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

目前，有两个研究机构专门教授精神分析。第一个由柏林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他是柏林心理协会的会员。第二个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该协会以自费的形式并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使协会维持至今。而目前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为青年研究事业设置困难。另外，还有一个训练机构在伦敦，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受训者们自己也被施与精神分析，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接受对他们的理论指导，在那些富有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他们初次的实验，去分析一些较轻的病例。每位受训者大约要在这里训练两年的时间，即使训练结束，他们仍然只是初学者，而不能成为熟手。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并与精神分析学会的新老会员交流思想。为分析活动做准备并不是一件简单又容易的事，这项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传授，对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学领域中的潜意识理论，熟悉“性”科学，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艺，有释义的技巧，能够克服“抵抗”，控制“移情”——只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担起对神经症的治疗，并将能够达到该领域里这一治疗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标。

六

“你已费了很大气力向我说明到底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及为成功地应用它需要哪类知识。很好！听听你的话对我没什么害处。但我却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释对我的判断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例子就会发现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则是治疗它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医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与其他情况相同，一个选择了特殊医疗分支的医生是不会满足于他文凭所载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他试图在一个大城镇建立起一个能独立维持他生计的事业，且这样做是出于他要以此为生，要过优越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获得文凭。任何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诊所努力工作几年，像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说精神病医生，他也许将永远不能离开像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任何学业期满、想从事这项新兴的医疗工作的人都要在训练中心接受你所说的为期两年的训练，如果果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会逐渐认识到，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他需要与他的同事保持联系，这样，事情将会顺利进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不存在外行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将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我承认我学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么说都应算做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阐明医生与精神分析家

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并将如何继续发展的。医生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就不享有独占权，相反，直到最近，他们还使用诸如恶毒的谣言和严厉的诬蔑等有损于精神分析的手段来对付它。你大概会说那属于过去而不会影响未来，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担心未来将与你预测的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给“庸医”这个词一个它本应有的定义而不是法律赋予它的解释。根据法律条文，“庸医”就是那些想治疗病人却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做保证的人。我倒更偏爱“庸医”的另一定义：“庸医”是想从事医疗工作却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的人。立足于该定义，我大胆断言，不仅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度，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多数医生都是“庸医”。这些人从未学过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却在不断地进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疗。

你不承认那是潜意识，不相信医生能解释潜意识，是没用的。毕竟医生了解一本医疗执照不是特许证①，病人也不是犯人。人们一定要相信：医生总是忠于职守的，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出错误。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像你想的那样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将努力向你解释医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领域中绝无的方式进行精神分析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医学院校，任何一个医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于他成为心理医生的训练。由于医学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正确的诊断和恰如其分的影响，医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客观论证的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野内，生命问题迄今为止是受某种力的作用的，而这种力在无机界同样可以观察得到。他的兴趣不在生命现象的心理方面。医学不是关于高级智能的研究，高级智能属于人物官能的另一领域。只有精神病学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碍的。我们明白精神病学用什么方式处理心理疾病，并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寻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体原因，把它们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

精神病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它的医疗教学也是很优秀的。假如有人说它是片面的，那么，人们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面来指责精神病学的出发点。任何一门学科，若孤立地来看，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观点和方法上了。我不会说这种废话，不想用一门学科去反对另一门。毕竟，物理学丝毫不能削弱化学的价值，也不能代替化学，也未能被化学取代。精神分析——作为研究心理潜意识的科学肯定相当不完善。我们也无权指责医学的片面性。

如我们想把医疗科学变成应用治疗学，我们只要找到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即可。病人是个复杂的机能组织，他提示我们，即使是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也不能从生命现象中抹去。神经症患者确实是不受欢迎的复杂体，对他们的治疗方法就像法规和军事纪律一样多。但他们存在着，并受到医学治疗的特殊关注。然而医

① 即给他的不是私掠船（Privateer）的执照。

学教育对他们的理解和治疗实在是无能为力。以我们区分物理与心理间初始联系的观点，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能理解影响神经症的致病因素和有关知识，并将机体生物学和化学引入神经症领域。那一天似乎还很遥远。就目前而言，用医药治疗，我们仍然无法攻克这些疾病。

假如医疗教育仅仅在神经症领域不能给医生一些指导的话，我还可以忍耐。更糟的是，它给医生一种虚假与有害的指示。对于那些生理因素并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医生来说都轻易地低估他们，嘲笑他们不科学。正由于此，这些医生不能够真正严肃地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义务，因此，他们就堕入了对心理学研究肤浅的外行人行列，使他们自己的任务降低了标准。是的，既然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那么找到了医生，就一定要得到治疗。一个人必须时刻准备去做一些新事情。但为什么要有那么久的准备？我们将努力完善一切，但谁能说他们在精神分析机构教授的知识都是有用的？对精神分析懂得越少，他就越易冒险，只有真正懂得多的人才更谦虚，因为他明白他的知识有多么不足。

你所提出的对精神分析与其他医疗领域的特殊情况的对比，尽管想要安慰我，但却是不合适的。医疗院校对于外科医生、眼科医生等都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则数量少，建的晚，不具权威性。医疗院校不承认它们，也不注意它们。对于那些已取信于老师而没有机会训练其判断力的医生们，他们将乐意抓住任何一个机遇，在这片还没被权威认可的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些事情有助于使一些医生看起来像分析治疗的庸医。如某人想做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眼科手术，那怕只是摘除白内障和虹膜切除的小手术的失败，或缺少病人，都足以使他带有风险的事业走到尽头。而精神分析的实践相对安全多了。公众是被眼科手术的平均成功率所迷惑，所以希望通过眼科手术治愈眼疾。但如果一个神经症专家没能治愈他的病人，那么没人会感到奇怪。人们并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所迷失。确实，神经症专家也遇到不少麻烦，目前我们并不能做得尽如人意，但相信自然与时间都会帮助我们，就像妇女的初潮、结婚、停经、最后死亡会帮助她们解决一切。此外，医疗界的分析者对他们的病人所做的工作十分不显著，以至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指责。分析者没有使用仪器和药品，他们仅仅通过交谈把患者引入或引出某种境地。这样做确实毫无坏处，特别是他避免触及那些悲惨的或令人担忧的话题。那些没受到任何严格训练的精神分析者，无疑将不会放弃任何促进分析的机会来拔掉毒牙使病人愉快。然而懂得机敏地适可而止，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他真的冒险唤起了患者的不满，却又不晓得怎样应付，那他真的是希望自己名声扫地了。

诚实使我承认，一个未经训练的精神分析者对病人的行为确实要比一个技术生疏的外科医生有更小的危害，它带给病人的危害仅仅局限于带给患者——无用

的花销或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减少。这也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名声一直被贬低的原因。它是令人不快的，但危险性还远不如庸医手中的手术刀。在我看来，病情的严重和长期恶化，都不足以使一个无技术的精神分析者惧怕。过不了多久，这些不遂人愿的反应都会消失。跟那些引起疾病的生活中的创伤相比，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犯的一点小错误根本算不了什么。一种不适合的治疗方法只是不会带给病人什么好处罢了。

"我已经倾听了你关于庸医的分析，并没有打断你。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你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敌意所控制着，而你对医生职业刚刚做了历史性的阐述。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如果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话，那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行。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着手进行分析的医生会尽全力去获得培训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医学院校对精神分析机构的态度不转变，医生就会发现敷衍了事的诱惑力是极强的。

"看来你不断在回避对由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我猜想，由于不可能禁止每位想从事分析的人去进行分析，所以出于报复　你建议以剥夺医生在分析界的垄断，通过把分析治疗技术向外行人开放来惩罚他们。"

我说不准你是否已准确地猜到我的动机，或许过会儿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更为公正观点的证据。但我仍强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任何人无权进行精神分析，然而他是不是医生，我都觉得无所谓。

"那你能提出什么明确建议吗?"

迄今为止我还提不出，我也不能说将来是否能提出。我想与你讨论另一个问题，首先来谈一个特殊要点。据说当局在医学界的唆使与煽动下想要禁止一切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种禁令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人员，他们曾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果这一禁令实施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些能让人充分信任并且会做得非常好的人被禁止进行分析，而另一些没有能力做分析的人却被允许做这项工作。这绝不是立法应当带来的后果。然而这个特殊问题既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很难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与之有关，而实际上，他们也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这部分人可以移居德国，那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他们会以自己的熟练技术而被认可。如果人们不希望伤害他们，减轻法律的严肃性，从一些为人所知的先例中，可以发现这也很容易办到。在奥地利的君主制度下，就经常有允许名声很坏的庸医行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某些领域里从事医疗活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真正的能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治愈过农民，而他们的建议似乎通常来自于曾经为数众多的女大公之一。但对城市居民来说，如果医生有了专业保证书，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也是容易办到的。这样的禁令会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分析训练机构将不接受

非专业人员参加培训。由此，我国的这种从事智力研究的行业将再一次被压制，而它在其他国家却可以自由发展。我是最后一个有能力对法律的法规做出判断的人，但我看到重视庸医的法律并不能使我们向今日①的德国迈进一步。另外，把法律运用到精神分析上也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因为法律颁布的时候还没有诸如精神分析这类事情，而且神经症的特殊性在那时也没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一个重要问题：对我而言，对它的讨论更为重要，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受到官方的干预，还是任其自然发展更为有利？现在当然不会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我还是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请你考虑。在我们国家，对禁令的热衷一直是一种惯例。我们也知道，那种对人们指手画脚、乱加干涉、强行禁止的趋势从未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在我们的新奥地利共和国，许多事情似乎没有太大改变。我想，你对于目前大家都关心的精神分析会有重要的话要说。我不了解你是否对反对官僚趋势有期待或影响。无论如何，我不会把我的没有威权性的观点强加给你。我认为规则与禁令太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法规较少的地方，那儿的人们就会认真地遵守；而法规无处不在的地方，人们就不去重视它。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人们认识到，法律规则不能一开始就声称代表神圣，且不能超越；相反，它们常常是不充分的，常有辱我们的正义感。对于当局的迟缓感，人们除了大胆地冒犯这些法规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改变这些不正当的法规。再进一步说，假如有人想维护法律法规，那么应建议他不要在那些无论遵守或超越都没有人监督的地方颁布法律。关于法律正想方设法去压制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的问题，我上述引用的由医生实施的精神分析材料都可以在这里重复使用。分析过程最不明显，既不用药物，也不用器械，只包括谈话和信息的交流。要判断一个外行人是否在进行“分析”并非容易，尽管他说，他正在为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提供一种鼓励和解释，以努力建立一种健康人的影响。正由于医生有时也进行分析，因而禁止它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相当广泛，它是在对基督教的信任与渴望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对生命中的邪恶的辩证否定观。我敢断言，这种过程本身代表了对人类精神的令人遗憾的背叛。但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想过去禁止和惩罚这种活动呢？难道当局真的有某种正确的救助之法以至于竟去阻止个人按自己的方式②拯救自己吗？假如人们陷人危险境地、产生悲伤，当局是否应该仔细圈定出一些区域，告诫人们不要逾越，而对于其余的区域则尽允许人们靠经验和相互影响进行自我教育？精神分析是这个世界的新事物，绝大多数人都没受过此等教育。传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动摇不定，用立法干预它的发展，我看是有些太草率了。我们不妨让病人自己去发现，向不

① 当然这是指魏玛共和国的时代。

② 出自于弗雷德克这位伟人的谚语：“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可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

了解如何给他帮助的人去求助心理治疗是有害的。假如我们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提醒他们防范，那我们就省得去阻止他们了。在意大利的主要街道旁矗立的架有高压电缆的铁塔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标语："触我者死!"这是一种极其简便的警告方式，它告诫不要触碰铁塔上的悬线。像德国的此类告示中却写有这样不必要且冒犯人权的冗长语句："严禁触碰交换线，否则性命难保!"何必如此禁令呢？任何一个珍惜生命的人都将自立这样的禁令，而任何想通过这种方式自杀的人也不会向官方申请许可。

"我在这儿举几个通过法律程序反对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的例子。它们是：反对外行人实施催眠术的禁令和最近刚刚推行的反对实行精神分析疗法或成立精神分析团体的禁令。"

我不能说我赞赏这些举动。第二个例子毫无掩饰地侵犯了警方对限制学术自由事件的管理。我不怀疑人们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神秘现象深信不疑，并有认识它们的渴望。这些禁令不会减小人们对那个假设存在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则会伤害并阻碍人们公正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本该形成能使我们摆脱困扰的判断。但我再次声明这仅仅适用于奥地利。在其他国家，"心灵学"的研究并没遭到法律的阻碍，催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精神分析有些不同。催眠是指唤起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仅被一些外行人用来做哗众取宠的表演。假如催眠疗法一直保持当初的魅力的话，它的地位可能与精神分析并驾齐驱。顺便说一下，催眠的历史从另一角度为分析提供了先例。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症理学讲师的时候，医生们就曾激烈地抨击过催眠术，宣称催眠是一个骗局，是魔王撒旦的诡计，是十分危险的过程。今天，医生们却垄断了当初曾被抨击的催眠，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作为一种检查方法加以利用。对于一些神经症专家来说，催眠仍然是他们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主要手段。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就精神分析是应由法律来控制，还是应任其自然发展的问题提出什么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官方人士个人倾向的影响可能比学术见解大。我已打算谈谈似乎有利于 Laisez faire[①] 政策的观点。如果赞同积极干预的政策的决定被采纳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单是粗暴地禁止非医生实施分析这种站不住脚的和不公正的手段、措施都将是不适当的结果。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要建立这样的氛围——使所有想实施分析的人都能获得允许，必须建立权威机构，人们从那里可以学习什么是精神分析和需做哪些准备工作。要强化分析过程中的指导。所以，我们要么让分析治疗顺其自然，要么就使它有序化和明晰化。我们一定不要使用从不适当的规

---

① "Laissez faire"，自由贸易，不干涉，放任主义。原指 19 世纪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的口号，弗洛伊德在此引申为对精神分析的政策。——中译者

则中机械导出的孤立禁令，去莽撞闯入复杂的境况里。

七

“虽然如此，但各位先生们！医生们！我没能引导你们进入我们谈话的真正主题。你们仍在回避着我，这是一个当医生们满足了相应条件后，我们是否该给予他们对所有我关心的人实施精神分析的专利权的问题。和你们一样，你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医生并不是分析领域里的庸医。你们自己说过，你们绝大多数的学生和追随者也是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医生与你们在关于外行人从事精神分析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可以假定你们的学生会同意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他们却认为制止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是应该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你们该如何解释？”

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是的，确实如此。事实上虽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学同事，在这一点上与我观点不同。他们赞同医生们享有精神分析的专利权。这表明即使在我们的阵营中也允许持有不同见解。我的立场众所周知，而且对于外行人精神分析的对立观点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很好地理解，我该怎样向你们解释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呢？我并不十分知晓。我想一定是职业感的力量。他们成长的过程与我不同，他们与同事分开仍感到不适，他们愿意拥有自己可享有充分权利的“职业”，进而可被人们接受。他们不想做出忍让，而且准备牺牲一些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不明显的东西。也许会有不同情况。要说他们是出于竞争动机，这不仅要谴责他们感情用事，而且要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他们经常准备将其他医生介绍进精神分析领域。从实质性的观点来看，无论他们是与医学同事，还是与外行分析者共同分析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情况不同，作用也有异。我的学生们也许受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即确保一个医生在分析治疗中具有高于外行的优势。

“保证他有某种优势？我们已有那种优势了。看来你终于要承认这种优势了？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对我来说承认这点并不困难，这表明我并不像你想像中的那样带有情感偏见。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情，因为一讨论它们，就又得涉及到理论问题。

“现在你在想什么？”

首先是诊断问题。当分析一个神经错乱的患者时，你希望预先确定——当然在可能确定的范围内——患者适合这种治疗，通过治疗分析可以帮助他。但是，只有当患者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时才可如此确定。

“我想我可以从他诉说的症状上判断。”

这正是一个新的复杂的情况出现的地方。治疗的可行性不是总能完全确定的。病人也许表现出神经症的外部特征，而实际可能是别的什么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的初期或是大脑的破坏作用的初始状态。这种差别——鉴别诊断——便不容易也不能在每一阶段立刻发现。当然，做这类决定的责任只能由医生来承担。正如我所说，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疾病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恶性表现，只是在最后才表现出危害性。的确，神经症患者最普遍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然而，如果一个医生一时误诊了这种病或不能确定它，也不会引起什么危害，任何不必要的事都没有做。在此种情形下，分析治疗也不会引起任何危害，尽管会有人说它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责备分析治疗的意外后果。这种责备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也着实应该避免。

"但似乎希望渺茫。它使我对你所说的关于神经症的起源与性质的理论产生了动摇。"

不是的。它只是再次证明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是件麻烦事，令包括分析者在内的有关人员非常头痛。但如果我更准确地陈述我的新观点的话，也许我可以澄清你的疑惑。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病例来说，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它们容易发展成神经症。但这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即致病因素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你懂吗?

"我懂。但我无法把物质的与心理的协调起来。"

还是可以协调的，假如人们牢记生命物质的复杂性。我们从哪里发现神经症的本质呢?"自我"，这一心理器官的较高级形式（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被抬高的），不能在本我和现实之间实现调和功能。"自我"虚弱时，会从"本我"的某些本能部分退回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以克己、病兆和徒劳的反向形成等方式承担脱离本我的后果。

"自我"的这种虚弱可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中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经历对今后生活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童年时期承受巨大的负荷——在几年里我们身心的发展就要走完从石器时代原始人到现代文明社会参与者之间的遥远距离。同时，我们还得特别避开早期的性本能冲动——在这种重荷下，"自我"在压抑中寻求避难并表现出童年神经症的特征。它还将把这种神经症的后患带入成年期，使我们易受神经疾患之侵扰。一切都取决于成长中的有机体如何受命运的摆布。如果生活变得艰难，如果本能需要与现实要求之间的鸿沟变大，"自我"就不能调和本能与现实的关系。它越努力调和，就越会被从幼儿期遗留下来的神经症倾向所压制。压抑过程不断重复，本能忍痛离开"自我"的控制，沿着退化的道路，寻找自身的替代满足，可怜的"自我"将变成无助的神经症患者。

让我集中谈一下：全部情况的关键点和中心点是"自我"组织的相对强度。我们将发现完成我们关于病因的调查是很容易的。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期"自我"

的虚弱、对付早期性冲动的任务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经历的影响，是神经机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使“自我”的任务更加艰难，或者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发展特别虚弱。这些因素必然显示出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们还是先验因素。我们一直都是认真对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发展过度，治愈的前景将不妙。我们对自我的抑制发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们将发展成具有素质基础的神经症。没有这种素质的先天获得的因素的诱发，神经症几乎肯定不会发生。

但如果“自我”的相对虚弱是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以后的一次躯体疾病也能诱发神经症，假如它能使“自我”变弱的话。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这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会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而且使本能的力量增长到超过“自我”所能控制的极限。在妇女身上，每月的行经与断经的交替出现可能就是这种过程的正常模式。再者，一般的躯体疾病——神经中枢器官的器质性疾病——可以损害心理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心理器官减弱其功能，遏制其更精细的工作，而这精细工作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病例中，症状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正如我们了解的，它们变化多，病因复杂。

“你使我愉快多了！你讲话终于像个医生了。现在我希望你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我担心你离题太远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症状，所关心的是分析中的治疗过程。我允许——不，我坚持——对于每个需要分析的病例都先应由医生来诊断。幸运的是，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神经症病例都属精神发生的性质，与病理原因无关。一旦医生做了诊断，他就可以将这一治疗放心地转交给一个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学会里，常常是这样的。由于医学界与非医学界人员的亲密合作，所担心的失误可以完全避免。如有意外，分析家必须求得医生的帮助。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症状——特别是躯体症状——多半经常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有人怀疑这些症状应属于神经症还是与内部它们独立的器质性疾病相关联。这时，也必须再次由医生来做出判断。

“这就是说在分析过程中，非专业分析家是不能离开医生的。”这又是一个反对非专业人员分析的新鲜见解。

不。这个见解并不是出于上述理由，因为在分析中，专业分析家不会有不同的做法。

“我不太理解这一点。”

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则：在治疗中如出现值得怀疑的症状，那么分析家不能依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要听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医生所提供的报告——或许是一位

门诊内科医生的报告　即使这位分析者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且精通医术。

“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不适宜的规则呢?”

这不是不适宜，有多种原因要这么做。首先，由同样一个人来做躯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一个好办法；其次，由于移情的关系，分析家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并不合适；再次，既然分析家的浓厚兴趣是强烈地指向心理因素的，那他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我现在非常明了你对非专业人员实施精神分析的态度了。你认为必须有非专业分析者，因你不能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你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开脱，使他们更易立足。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非专业分析者不可？他们毕竟只能成为二流的治疗家。就我而言，我已准备好把少数已被训练成分析者的非专业人员做个例外来特殊对待。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培训出的新分析者，因为训练机构没执行义务去训练更多的非专业人员。”

假如可以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互相牵制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想你会同意这些利益主要有三种：病人的利益、医生的利益和最后但并非不是不重要的——科学的利益，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未来病人的利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利益。

首先看病人的利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只要他被误解的疾病危险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被及时的医学报告排除了，那分析者是不是医生对他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则是分析者应该具备让病人信任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知识、悟性和能够使他胜任工作的经验积累。假如病人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医生的帮助都不能工作，这会被认为有损于分析者的权威形象。当然，我们从不忘记告诉病人分析者的资历。我们能使自己坚信职业偏见不会在病人身上产生共鸣，患者乐于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治疗。顺便提一下这种治疗。很久以前是被医学界压制的，现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并非社会残渣的随意组合，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还有一些阅历丰富且具卓越人格的妇女。分析是使分析者形成他的态度以履行他适当职责的最好手段，对于这种分析，分析培训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服从。

其次关于医生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利益不通过精神分析和医学界的合作便不会获得。医学课程长达 5 年，通过最后考试须学 6 年。每几年就给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不达到要求便在将来被证明无法胜任工作。成为专职医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职业既不令人满意，又得不偿失。如果有人认为医生也应该了解心理疾病的知识是十分合理的，那么，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而且还要为学习精神分析做准备。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课程并相应延长学习时间。我不知道医生们对于这些人主张的学习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否感到满意，但这问题几乎不能逃避。这是给医生的课程条件如此严重退化的阶段，也是年轻一代被迫尽早独立的时代。

或许你认为在学习医学课程之外不必为精神分析做准备，而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在学完医学课程之后接受必要的医学训练更有益。你可能认为在这方面消磨太多的时间没有实际价值，因为毕竟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医生决不会赢得患者的信任的，而来自患者的信任正是对患者给予心理帮助的必要条件。我可以这样回敬你，一位初出茅庐的内科医生不能指望患者对自己有什么崇高敬意，但一位年轻的分析者却可在经验丰富的开业医生的指导下在分析诊所工作。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的建议反倒支持了一种能量浪费，而我在这种困境中，实在找不到这种浪费有什么经济价值。确实，分析训练是医学教育领域的捷径，但却是互不相干的。如果——今天听起来这话或许有点奇怪——有人必须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的话，那么在医学院教的东西在这所学院里也必须教。除了深蕴心理学（该学科总是文科）外，还应该有生物学导论、性生活的科学和熟悉精神病学的症状学。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指导还应包括一些与医学关系较远，且医生在其诊疗中遇不到的知识：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一个分析家除非精通这些课程，否则他弄到手的资料将毫无用处，在医学院校所教的这些补充知识对分析家的目的没有用。有关跗骨解剖、碳水化合物的构造、颅内神经通路的知识及医学在杆菌致病原因和抗杆菌、血清反应、肿瘤等领域的成就——所有这些医学知识（毫无疑问，它们自身具有极高价值）对分析家没用，与他无关，既不会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也不会增强他职业所必需的智能。不可否认，分析家学了许多对他没用的知识，就如同一位医生学习了医学的某一特别门类，例如牙医学；他参加考试，但考试内容并不全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他又得学习许多他的学校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的课程。但这两种情况又不能相提并论。病理学的重要原理——发炎、化脓、坏死及身体器官的新陈代谢等理论在牙科学中仍很重要。而分析者的经验却是另一回事，有其不同的情况和法则。不论哲学如何忽视身体与心理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仍存在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更存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试图强迫一个想让别人摆脱恐怖症和强迫症折磨的人去走学院教育的弯路是不公正和不适宜的，这种努力也不会成功，除非彻底压制精神分析学。想像一下，有两条道路通往山顶观看风景，一条短而直接，另一条长且曲折迂回。你竭力用一块禁止通行牌去阻塞那条短路，或许是因为你要保护小路边的几个花圃。但你的禁行牌不会被人理会，除非短路是陡峭艰难而长路坡缓易行。否则，如果迂回的路相反更难走，你的禁牌的作用和你的花圃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担心你迫使外行人学习医学和我劝导医生学习精神分析一样不会成功，因为你和我都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说的没错，不经过特别训练就不能胜任分析治疗，而医学课程又不足以成为从事分析的准备，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分析家没有必要，那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一个理想的医生，使之胜任他的全部职业活动呢?"

对这个难题我无力解决，而且这也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清楚两件事。第一件事，精神分析令你尴尬，它最好是不存在——尽管神经症患者也令你尴尬。第二件事，如果医生决心忍受一批心理疗法人士的存在（ 这些人可以解除医生治疗大批心因性神经症的单调与痛苦，并帮助病人康复而经常与之保持联系），那么目前所涉及到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满足。

"这是你对该话题的结束语吗？或者你还要说点别的吗?"

我还有话要说。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科学的利益。我要讲的言论与你无多大关系，但相对而言它对我却很重要。

我们不愿意看到医学侵吞精神分析的局面，也不愿让精神分析仅仅在精神病学教科书里的"治疗方法"的标题下占有最后一席之地，仅包含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说疗法，同时还不得不由于无知而感激人类的懒惰和懦弱，感激他们这精神分析如此短命。精神分析理应有更好的命运，它也有希望如此。作为一种"深蕴心理学"，一种潜意识心理理论，精神分析可以独立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进化及其主要成分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学科之外。依我看精神分析已经为上述学科在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但这不算大。如果文明史学家、宗教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同意用手头已有的研究仪器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还将更大。治疗神经症仅是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之一。未来会证明这还不是它的最重要的应用。无论如何，为了这一方面的应用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不对的，因为精神分析也关系到医学的利益。

精神分析前景灿烂，不容侵害，否则必遭惩罚。如果各种心理科学的代言人只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够把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么，他们仅满足于从分析中读到的那点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惟一可能的途径——亲自进行精神分析来逐渐学会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从智能动机出发接受的往往是二流医生的分析。他们承认分析，但又希望他们自己偶尔也能加强能力。为了实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们不需掌握太多的医学知识。但这些"教学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需要接受过特别细致的教育。如这一要求能达到，必须给他们从有启发、有受益的病例中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并不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所以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于分析家，进而使"教学分析家"在严格的监督下获得今后的非医学性活动所必需的教育。所有这一切要求有一定

限度的活动自由，来不得一点限制。

或许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纯理论意义，或者你不允许这些理论影响非专业分析问题。那我告诉你精神分析还有另一个应用领域——一个超越庸医以外的、医生很少问津的领域，我指的是培养儿童这一领域。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随人意的发展倾向，假如他变得易怒、倔强和心不在焉，那么，儿科医生，甚至校医都无能为力，即使儿童已明显表现出神经症症状，如紧张不安、厌食、呕吐或失眠。由愿意关心孩子世界并懂得怎样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医生来实施分析与教育措施相结合的治疗，能够立刻产生两种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经症状和改变他们已开始的不良性格。我们认为儿童的这些不明显的神经症是他今后生活中严重疾病的基础，故对儿童进行分析是对其后天疾患的最好的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对者。我不知道他们（反对者）是否有办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动。我认为这种阻止不太可能，但人们也不能太乐观。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对成人神经症进行分析治疗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也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文明把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现状得改变一下。不管有多么困难，精神分析注定要成为人类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想是不是太离奇了呢？也许某个美国人会偶然想到花一点钱让他们的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训，把他们变成同文明神经症做斗争的救护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像是有根据的。到那时涌往欧洲学习的热情的人们都不会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精神分析还没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点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这种事肯定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对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所做的结论一点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一点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受规定与禁令的影响。

跋（1927）

我写这本小册子（它是目前讨论的起点）的直接诱因源于一起在维也纳法庭的对西奥多·赖克博士（Theodor Reik）——一位非医务人员——进行了精神分析的诉讼案。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诉讼程序进行完之后，接纳了众多专家的意见，这起案件终告结束。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本书作用的结果。只是这诉讼案论证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赖的证词，所以取消对赖克博士的起诉，或许并不是维也纳法庭对一般的非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分析问题的深思熟虑后的判决。当我要在我的小册子里描绘出我的对话者——“公证人”的形象时，我想起了一位高级职员。他是一个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我跟他谈起赖克案件，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我知道我没有使他确信我的观点，这就是我与“公证人”的谈话也没最后达成一致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会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上的态度取得一致。在这个讨论中，任何把匈牙利学会与纽约派的观点相比较的人都可能会得出结论：我的书没产生什么效用。每个人仍坚持自己以前的观点。但我也不相信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许多同事已修正了他们的极端偏见。他们大多数已接受了我的观点，那就是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应按照传统办法来处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况，就需求新的判断。

我对于整个讨论的观点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认同。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医学文凭，而是他是否为从事精神分析而进行过必要特殊的训练。非常迫切的、须首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训练最适于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现在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应是医学院校为未来的医生制定的那种训练计划。我认为医学教育对达到专业精神分析是既费力又曲折的办法。确实，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许多所必需的东西，但又使他学了太多对他无用的东西，而这容易转移他的兴趣，并影响他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与思考。应制定一个精神分析专家的训练计划，它必须包括精神科学、心理学、文明史和社会学以及解剖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知识。作为一项智力与观察力的训练，应教的内容实在太多。人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课程还是被忽略了，尽管它们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这个训练计划也很容易遭到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只是我个人的理想而已。确实，这是个理想，但却是个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理想。在我们的训练机构里，尽管有许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开始变为现实。

读者们会注意到，对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议。我曾假设，即精神分

析并非是医学的特殊分支。我不清楚怎么会对此有争议。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不是旧意义上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学的一部分，而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不是心理学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学的结构，或许还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把它应用于医学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这不表明它隶属于医学。电击和辐射也有它们的医学应用，但它们所隶属的学科只是物理学。这并没引起历史性的争议。整个电击理论源于对神经—肌肉反应过程的观察，然而今天无人梦想把它说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人们辩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医生在努力帮助他的患者过程中发现的，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更进一步说，历史性的争论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历史，从一开始，医学界就用一种不友好、其实是敌对的态度对待精神分析。这似乎可以表明，医学界从不承认今天的精神分析，尽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但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看，我仍有些怀疑医生们对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①]——他们是为了破坏还是为了维护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拥有他们反对的职业。

我愿意对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再做思考。既然还有人关注我，那我就为感兴趣的人们简要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在我41年的医学活动之后，我认识到我从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医生。我被逼着背离了初衷而成了一名医生。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我发现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脱人间痛苦的知识。我先天的虐待狂倾向并不很强，所以我不必发展它的派生物。我也从未做过“假扮医生的游戏”，我选择了其他途径满足了我幼儿时的好奇心。在我年轻时，我强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谜团，甚至于想为解开谜团奉献点什么。成功地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上医学院校。但我对动物学和化学实验很不在行，直到最后，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布吕克的影响下，我决定学习生理学。尽管在那时这门课主要限于组织学，那时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考试，但我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个我深深尊敬的老师警告我说，因为我的一些实质性的课程较差，我也许不能从事理论研究。于是，我从神经系统组织学转向了神经症理学。受新影响的驱使，我开始关注神经症。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医生素质，我会对我的患者产生很大危害。假如医生的治疗兴趣随情感而变化，那么对病人不会有多少好处。只有他冷静地行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对病人才最有益处。毫无疑问，我刚才说过要稍微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它可独立应用于医学。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恰在属于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这一点上遭到异议。实际上这是

① 参见阿伯拉罕（1924），英译本，1927年，第450页及下页。

个纯学术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争论的真正要点，据说只有一个，即能否应用精神分析去治疗病人。精神分析如像它声称的那样属于医学的特别分支——像辐射属于物理学的分支一样——使用它的人都服从在治疗方法中所设定的规则，那么它一定会令人满意地让人接受，尽管仍有争议。我就是这样认识并接受了精神分析。我只想确认治疗法不会破坏科学性。不幸的是，治疗与科学还有一段距离，是两回事。我们只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较就好了。精神分析不同于辐射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控制 X 光线的规律时，并不需要一个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惟一主题是人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这道理很容易理解。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导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与应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这些材料，便使他们获取良好训练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当然，我无意探讨神经症患者的利益应不应该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利益而牺牲。我的这本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册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预防措施，二者的利益会很容易地调合起来，并且医学也不是在这种调和中最后获益的学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对此详加叙述没有必要。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以一种不能公平地面对事实的态度去强调这一点。在许多病例中存在着诊断上的困难和不能确定躯体症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知识与干预是必须的——确实如此。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病例容易诊断、且不需要医生确定躯体症状。这些病例或许没有多大的科学上的意义，但它们对于判断有能力处理病例的非专业精神分析家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曾对一个同事做过精神分析，他强烈反对本来不是医生却被允许从事医疗活动的做法。我恳切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合作也 3 个多月了，在我们的分析中，在什么地方我曾使用过我的医学知识?"他承认我没使用过。

再者，我不很重视这样的论点——非专业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没有权威，还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师受人尊敬——因为非专业分析家一定要时时准备向医生咨询。这种类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着他们对权威的认知，拥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不会像医生想的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非专业精神分析家可以和"世俗的牧师工作者"① 一样很容易赢得尊重。确实，用"世俗牧师工作者"一词是对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绘了精神分析家——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执行的功能。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天主教的朋友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加强教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苦恼。而这往往首先是通过给他们提供

① 德文为"Seelsorger"（关心灵魂者）。弗洛伊德在他给普费斯特（1913）的一本书的前言里提到，在新教徒国家，关心灵魂的工作必须是由具备资格的人去做。

一些关于冲突本质的分析信息实现的。我们的反对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家们也在那些变得适应不良及做事效率较低的人身上，通过努力唤起他们对社区的兴趣来产生相似结果。其方法是：先了解他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后向他们表明社区对治疗他们由自我和无信仰的冲动导致的疾病所起的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属于心理疗法；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无论何人只要他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最彻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这并不是通过把他们带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挖掘他的潜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储存的、由于压抑限制在潜意识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费在维系这些压抑的无效任务上的能量，以这种他自己的内在的资源丰富他自己。这样的活动似乎是用最有意义的词汇所描述的牧师的工作。我们的目标设得太高吗？患者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为他们辛劳吗？从外部维持他的病症不比从内部重建他的潜能更经济吗？我不能做出结论，但我却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精神分析从它出现那天起，治疗与研究就密不可分。知识使治疗成功，没学习任何新东西而去治疗一个患者是不可能的。没有体察到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鲜见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分析程序确实存在着这种宝贵的联系。只有执行这种分析牧师的工作，我们才能逐渐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分析工作的科学收益前景是这一工作最令人骄傲、最快乐的特征。我们要为某种实际的考虑而牺牲这种特征吗？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评论产生了怀疑。无论如何，我的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书在一个方面被人误解。有人替医生辩护来驳斥我，好像是我宣称医生们一般都不胜任分析实践，好像是我发出了一道口令：拒绝医学援助。这不是我的意图。对我的这种看法或许是由于我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该观察结果存在争议）曾说过这样的话：未经训练的医学分析家甚至比非专业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许可以用小说《天真的流浪者》① 中有关如何评价女性的讽刺语的问答来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软弱和麻烦的品性。“都一样，”他的同伴回答说，“女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趋向同意这点：只要我渴望的分析训练学校还没诞生，那么已经有了医学初等教育的人就是从事我们未来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选。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他们不该误认为那初等教育是完备的，应该克服接受医疗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只有医学分析专家，即只有研究了所有有关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人才能够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的合作，

① 这是一部德文流浪汉小说，1912年被译成英文。——中译者

我们将一事无成。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确实，顺便提及一下，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医学的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区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中的科学的精神分析与它的应用。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的美国同行表达了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恰当的。假如我说他们的反对是源于现实的因素，那我就不应该受到为争论而滥用精神分析的谴责。他们见到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非专业精神分析家们为了邪恶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结果不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声。因而，他们愤慨地把不审慎的滥用精神分析者的范围定得太大，以致极力阻止任何非专业人员的精神分析，这并不奇怪。而这些事实也降低了美国在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仅仅考虑到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判定非专业精神分析家能否实施精神分析，美国当地的状况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惟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基于美国当地的情况而通过反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决议，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能影响控制情境的任何因素，这样做无异于强行压抑。假如公众不支持反对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运动，如果阻止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么给他们以训练的机会，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岂不更有利？或许这对他们能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另外，如果向他们提供允许他们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怎么会没有兴致提高自身的伦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　于维也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弗洛伊德文集　　七　　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
作者＝
页数＝２０６
ＳＳ号＝１１４２９５３０
出版日期＝